《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

历史的先声

——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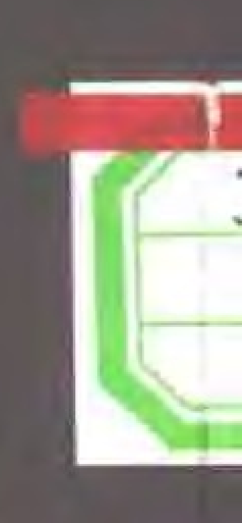
重读50年前的文字，还使我们看出，中国人民不仅能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能将这一改革的成果延伸入更深刻、更为艰巨的管理体制。这是因为早在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作出了庄严的历史承诺，并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资源。这些精神资源将是下一个世纪中国人民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库。

让我们一起走过从前，为的是明天能一起走向未来。

谨以此书纪念50年前民主与独裁的历史性决战；

谨以此书纪念所有为此决战前仆后继的中华英烈！





ISBN 7-81036-345-X/Z·42
定价：20.00元

建　国　五　十　周　年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

历史的先声

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

ISBN7—81036—345—X/Z·42

Ⅰ·历…
Ⅱ·笑…
Ⅲ·论民主—社会评论—选集
Ⅳ·24

历史的先声
——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责任编辑：英子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印　　刷：固安新知识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25
字　　数：250千
版　　次：199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7—81036－345－X/Z·42
定　　价：20.00元

出版者的话

这里收集了将近30万字的文字，是20世纪中国文字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劝君一读。我们愿以此书奉献读者，同时奉献建国50周年的盛大节日。

它们大多选自40年代周恩来在国统区领导的《新华日报》，部分取自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当时发表时多为两报社论和评论，有些直接出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等我党领袖人物笔下，有些则是郭沫若、茅盾、陶行知、夏衍、周谷城、吴晗等著名学者的论文和谈话。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50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国共决战，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之争：中国是走民主的光明之路，还是走独裁的黑暗之路？

重读50年前的文字，使我们看出，当年的决战不仅仅是在两种武装力量之间进行，而且是在人心向背中进行。可以说，没有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国统区的人心不会迅速离散，那里的第二条战线也不会迅速形成。“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沿海呼声，就是这些文字在城市居民和知识阶层所收获的广泛回声。正是这些万众一心的呼声，最终埋葬了国民党蒋家王朝在大陆22年的统治。

重读50年前的文字，使我们看出，当今境外对我党、我国的谩骂、污蔑，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早在西方政要走上

历史舞台前，我党前辈革命家、理论家就已经是卓越的民主、人权战士，在冷战风云初起之际，就已经以他们对世界政治的深刻洞见，在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人权与镇压之间，作出了他们的选择，并为此殊死奋斗！

重读50年前的文字，还使我们看出，中国人民不仅能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能将这一改革的成果延伸人更深刻、更为艰巨的管理体制。这是因为早在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作出了庄严的历史承诺，并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丰厚的精神资源。这些精神资源将是下一世纪中国人民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理论宝库。

让我们一起走过从前，为的是明天能一起走向未来。

谨以此书纪念50年前民主与独裁的历史性决战；

谨以此书纪念所有为此决战前仆后继的中华英烈！

1999年7月于北京

编者的话

本书大多选自40年代周恩来在国统区领导的<<新华日报>>，部分取自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当时发表时多为两报社论和评论，有些直接出自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等我党领袖人物笔下，有些则是郭沫若、茅盾、陶行知、夏衍、周谷城、吴晗等著名学者的论文和谈话。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50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国共决战，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之争：中国是走民主的光明之路，还是走独裁的黑暗之路？

谨　以　此　书　献　给

- 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
- 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 民主主义的利刃
- 让思想冲破牢笼
- 中国需要真正的普选
- 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
- 天赋人权　不可侵犯
-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 谁使中国不能安定？专制政府！

目 录

Ⅳ　让思想冲破牢笼

Ⅴ 中国需要真正的普选

Ⅵ 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

Ⅶ 天赋人权　不可侵犯

Ⅷ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I

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

“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

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政治报告

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

——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演说词

周恩来

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讲到他的遗嘱，真是无限感慨。遗嘱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我们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外独立，对内民主。可是孙先生已经逝世 19 年了，这个目的，还没达到。抗战本是求民族独立的，但时间快近七年，全国离反攻的真正准备还远。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 18 年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我党毛泽东同志老早就说过：“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这个道理，现在全国人民都了解，所以各地人民的宪政运动，都一致嚷出：要实施宪政，就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地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那反攻的准备，才能真正进行。

……

各方面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图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儿子孙科在孙中山灵堂前。灵堂上方悬挂着孙中山遗嘱。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的自由呢？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孙中山：《国民会议足以解决中国内乱》）开放党禁，就是要承认各抗日党派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党派看做"奸党"、"异党"，不要限制与禁止他们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范围的活动，不要时时企图消灭他们。有了前两条的民主，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实行。

……

关于时间问题，我们也一向主张应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照我们的经验，在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尚能进行普选，讨论国事，选举抗日政府，实行地方自治，哪有大后方不能实行民选和自治的道理？因此，一切问题都看执政的国民党有没有决心和诚意实施宪政，如果有，就应该在抗战期中提前实行。因为民主的动员是能最有力的准备反攻，取得抗战胜利，而且从民主中，才能找到彻底解决国共关系的途径。

1944 年 3 月 1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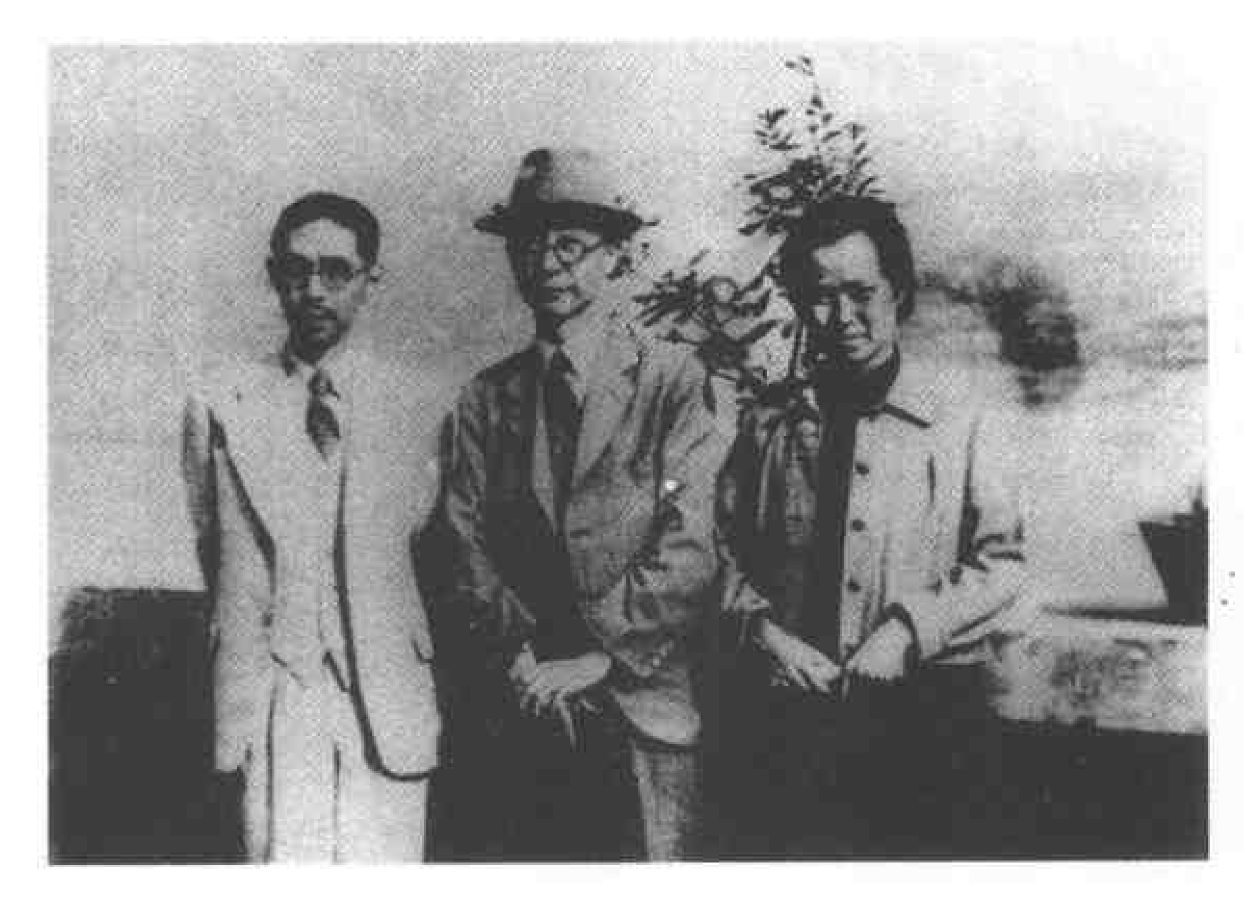
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

茅　盾

对于贵报所提出的问题，我只能这样答复：

20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受尽了欺骗。如果将来其它文献统统失传，只剩下堂皇的官报，则无话可说。如其不然，那末，我们的后代一定会不懂，为什么我们这样容易受欺骗？我们不能再忍受那种欺骗了。现在既然连政府也口口声声说“民主”，那么，我们就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我们不要假民主。真民主如能实现，则贵报所提的那些问题，我觉得都不难解决；否则，半个也解决不了。

20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



1945年冬，茅盾（左）、老舍（中）、于立群（右）在重庆

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注：《新华日报》所提问题，系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向各界知名人士公开征答的。其中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是怎样才能使人民获得自由权利，怎样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推行地方自治，怎样才能实现军队国家化。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的茅盾是应征者之一。

民主的真义

项　轶

翻读《中山全书》，在《中国革命史》中读到这样的话：“中国古昔有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学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主国之制，不可不取资欧美。”

在这段话里很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是有民主思想的成分的。但中国曾有民主思想和中国曾实行民主政治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够得上说是民主制度的，是从来没有的。

中国过去实行的是与民主政治相反的君主政治的。这本是常识，也是中山先生在其著作中明白说明的。在封建专制政治的压迫下面，思想上发生一种反动，因而产生某些接近于民主的思想，但是成系统的民主政治的理论也还是找不出来的。这种民主思想对于当时的现实政治固然也有时会发生一些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根本上改变了专制政治，而只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被公推为临时大总统。

是使专制政治的表现温和一点而已。所以过去的专制政治下，有仁政也有暴政，暴政固然不合民主精神，但仁政也绝对不是民主政治。“爱民如子”是过去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最高要求，但把民众看成了儿子，那还有什么民主的气味！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现在有些人把中国的旧思想都解释成民主思想，甚至以为中国过去早已有了民主制度，要实行民主政治只要向中国历史去学习好了。这实在是违背中山先生的遗训的。对于这些人，我们不妨背诵一下中山先生对于民主政治所下的一个通俗而确切的定义：“民权主义就是要拿本国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有一个平等地位，以民为主，拿民来治国家。”（民国十三年在广州的留声机片演说词）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民主与诚实

李　勃

在任何社会里，诚实总是被看成一种美德；而在民主社会里，尤其是非看重诚实的态度不可。

诚实的内容包含着一致的意思——那就是思想和言语的一致，言语和行为的一致，思想、言语和客观事实的一致等等。

心里怎么想，口里也怎么说；嘴里怎样说，手里也怎样做，这叫做诚实。想什么，做什么，决不瞒人，老老实实说出来，与天下人共见，不另外说一套，以图掩蔽天下人耳目，诚实更是非如此不可。

言语思想都是为了解释和说明客观的现实，行动也是为了应付现实。但对于现实的真象，固然未必个个人都能完全知道，但总不能不以与现实完全一致为其目的，因此也就不能不努力去追求对现实的完全了解，却不能故意掩蔽现实，反乎现实而行。假如指鹿为马，若真以为这是鹿，那还不过是无知；但若明明心知为马，而偏偏说这是鹿，那就是无赖了，

诚实是对人的态度，但也是律己的准则。假如故意说假，而旁人相信，便沾沾自喜，以为得意，其人心不可救药。用不诚实的态度对人，固然是对人的侮辱，其实又是对自己的侮辱。

我们相信，倘大家没有这样诚实的态度，民主就不可能存在。民主讲究讨论商量，但假如开会时大家说了一大套，却不全是心里所想的，会后各人仍旧各做自己的一套，那么民主的世界岂不成欺骗的世界了吗？

要发扬民主精神就得建立诚实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并不是舶来品，而是民族的固有道德。心口如一，言行一致，说一是一，这原是民间向来的要求。

《新华日报》1943 年 7 月 16 日

民主原则

张申府

差不多很像桃乐娣·汤普孙女士新近所说“有一种绝对的逻辑在历史上”，几年之前我曾深深地感到：天下有一定的道理，不为尧存，不为舜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当然在这些道理是什么，有多少。一切学问，自哲学以至科学，所从事的，至少一部分就在把这些道理发掘出来，而且弄个清楚，说个明白。

同样，也像尤里安·赫胥黎博士新近所说的“达尔文拿他不多的几条原理把人与所有别的生物都联络在一个必然与变化的共同之纲中”一样，世界随时都有个大势所趋，谁也不能逃避。

现在整个世界的大势所趋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二字……

这些年来，对于民主虽然有种种看法，种种论调，但现在联合国方面却公认为这次之战争是争自由、与民主之战。所谓法西斯，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都是与自由、与民主整整敌对的，都是与自由与民主势不两立的。而且凡是压迫自

由妨害民主不讲理性的东西，不管有多少样的方式，都可归入法西斯的类型。

法西斯不仅仅是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也同时是极端封建的、落后的、倒退的。这也是今日所有进步的、懂得民主的人士所能公认。

但是现在还是要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平安么?

这也不是的。

现在所求的实乃在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进步，实乃在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发展。

现在许多人都晓得了：要想安全，必须进步；要想稳定，必须向前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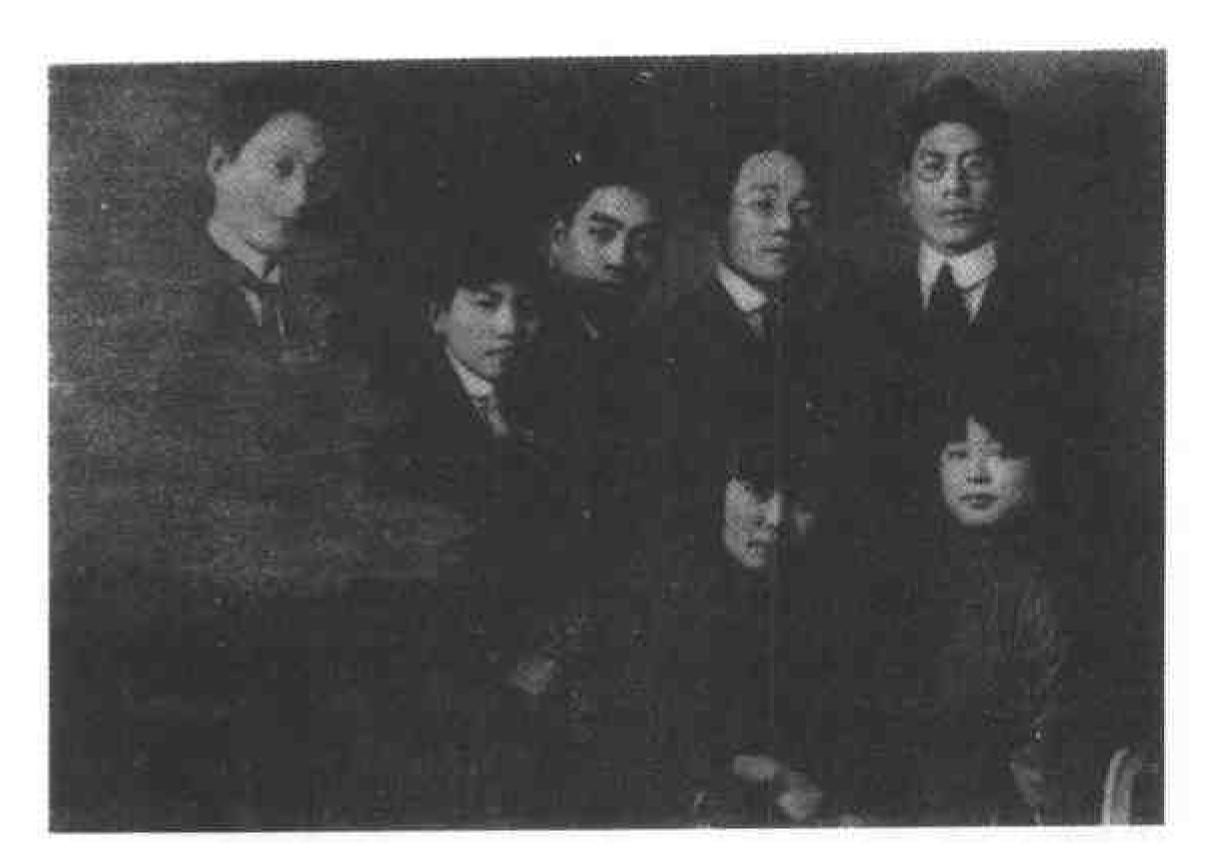
纵观全局，考察世论，很可以看出，有好几点是现在世界许多人都同意了的，或认为无可如何的了：

第一，现在是正处在一个革命的时代，而且是一个人民的革命的时代。或者甚至说，这种革命是人民的，而非一个阶级的。

第二，民主必须扩张，必须由仅仅政治民主扩张到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如经济上、社会上不民主，所谓政治民主也就是假的。假民主一定站不住。也可以说，非整个民主即无民主。民主决不等于代议制或放任主义的经济。

第三，“经济人”要代以“社会人”，经济人的时代要继以社会人的时代。社会必须是有机的；必须不是各自为富，而是共同谋福的。因此有人还说，今日的民主必须是“有机的民主”。如果孔子曾以仁为人类关系的最高理想，那么，道路不管还要怎样曲折辽远崎岖，人类社会究已在向之而趋。这一层是与前层有似相反相成的一种情形。

第四，社会各方面，特别像经济方面、科学方面，设计



1921年春，张申府和天津觉悟社部分成员在法国巴黎合影。左起：张申府、陶尚钊、周恩来、张家俊、刘清扬（女）、赵光宸、李锡智（女）。

或计划化必大流行，必不得不大流行。这也可说是与自由民主相反相成的。设计或计划化其实并不违反自由民主，宁可说是自由民主更进一步的具体表现；或者说，设计或计划化可以使得自由更圆满地具体实现。当然，要圆满做到民主的设计或计划化，也有它少不了的条件。

第五，战后必要有一种国际组织。有的且说，最好即以今日的联合国为基础。关于战后永久和平的计划，近年真是甚嚣尘上。连带地，为从一种根本克服过分民族偏性而作各民族、各文化传统间的精神连锁的国际大学，也正为世人所注意。只是关于那种国际组织的如何构成，如何产生，尚是众说纷纭，难衷一是。与我最同心而非开玩笑的罗素先生今

春在一篇美妙逻辑切实周到的大文《战后世界的若干问题》里曾郑重地说："开始的国际权力机关应由合众国、大英共和国、苏联、与中国而成。它们四国应结成一个随时可以邀请别的国家加人的联盟。"读来最足令人兴奋。总之，仍沿旧日的此疆彼界，国际无政府状态，是不行的了。不能各自为战。各自为治也明白是不行的了。民主必须兼是国际的。

凡此种种都是今日全世界大势所趋的一种意义的根本方而。

本来，纵然今日全世界真觉悟的人还不太多，就是许多觉悟的人觉悟到的程度也很有限。但大多数人都已觉悟到了几千年前已经揭穿的一种情实，那就是：人与人差不多。"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只是有的人身量长的高一些，看得远一点，早一点。有的看得早一点，也就说得早一点，因此常会招出横祸来。有的则有知也有养，虽看到了也不说。

现在许多人都觉悟到了：将相本无种，舜是人，予也是人。在这种情形下你还得限定某些人只得被治，只许"由"不许"知"么？

而且人与人虽有差而不多，不但是中国的古调，尤其具有现代科学的事实根据。在这种情形下谁竟还要我智自雄、唯我独尊？至落得枉费心机，徒劳无补。

法西斯的种族论固久已被世界的人类学者与生物学者驳得体无完肤了。

举一个绝重大的东西，当然是众擎易举。对着一个明非个力所能胜任的东西，也一定不会有人偏偏要独力支撑，而不虞举鼎折膑……

众力成城，众口铄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本

也是流传至今犹可记取的中国古训。

说到中国，民主几乎成了今日的万应方。在这个由世界的大势以致国内的大势所趋之下，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断言，而完全无可怀疑了。

中国今日不但在政治方面，就是抗战反攻上，经济财政上，以及教育文化上，乃至社会别的许多方面，实在无一不需要民主，无一样没有民主能够解决其困难。

国家有困难，当然应有全体国民来担当。但如使其与闻一切有关情形，使其对一切有关事情都有置喙之机遇，都有尽力之机会，纵令担当困难，忍受痛苦，也当可以心甘情愿。

人总是对于自己有权过问的事才最起劲。而况是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事。

民主决不会就妨碍集中领导。反过来说，也一样。

在大多数人的内心中，所以眼前今日就应实施民主者，最主要的缘由，本是为的民族，本是为的解救民族空前的危难；本是为的实现最圆满的民族统一。而具体言之，实在尤在为的动员，尤在为的发动一切人力以及物力。

抗战反攻上，经济财政上，所以都需要民主作对症药，也就是主要因为这个。

实际上，今日国内有些地方试行民主，传说收了不少的效果。抗战上、经济上、以及教育文化上、社会关系、人民生活上，据传都有不少的成绩，至少大部分也当是由于这个。

一言以蔽之，必都是动员了民力；弄机会使大多数人民都自觉了的缘故。

去年11月英伦名流、学算习律出身的经济学家、牛津

大学院长贝维里治·威廉爵士提出轰动全世界的社会安全计划，所谓关于社会保险的报告。他本认为应该祛除或攻击的巨恶共有五项：穷、病、愚、脏、闲。这五恶在中国岂不更要用大力来扫除。

以贝维里治博士特认为根本的末项“闲”而论，试问在中国今日这样需要人力的时候，有多少人力不是都不得其用，或用的不得当，以致许多时间精神，都白费了！

汰太（或汰汰）与废费（或说废废），实在同属人类最最重要的问题。

不要闲置人力，或把人力用的不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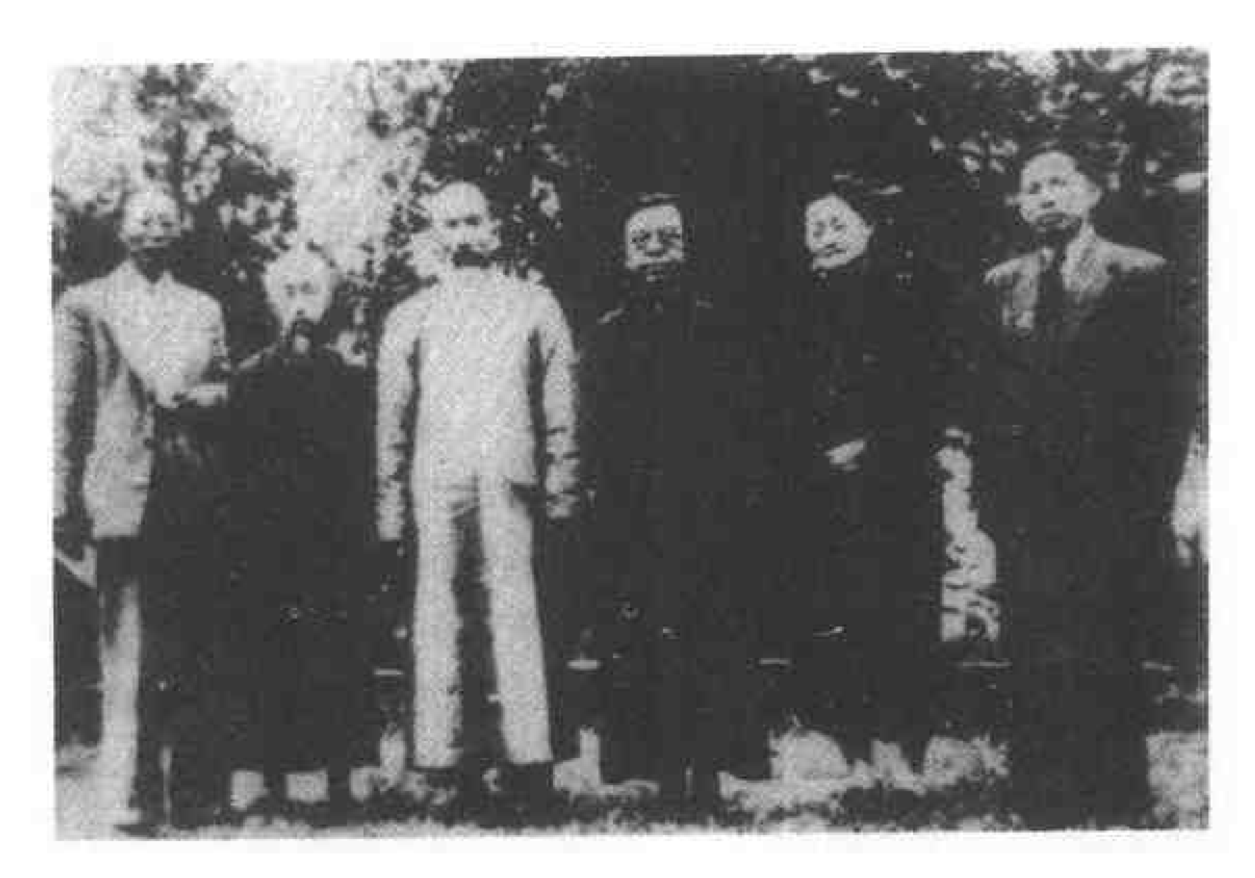
但这决不是一般所谓做官或出仕的问题，且也不仅仅使“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问题。实在更在使一切人力都发展到、施展到可能的最高峰。

使一切人潜藏的才干可能都得到最圆满的发展实现，这就是今日所谓民主的根本精义之所在。

用另一个说法，民主本就是使人人都平等自由（注意人人两字）。假使根本上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以及思想信仰、研究讲习的自由，是必说不上民主的。

但所谓自由并不只是让人人随便，解脱一切要不得的情事，就像贝维里治的五巨恶，以及忧愁、危险，或如罗斯福所说的匮乏与恐惧，等等。而且更要给人人以机会，使得人人都能尽量地发展、发挥、发皇其才、其力、其业——推到极处，两层本也并无二致。

也可以说，民主的出发点就是集体，就是与人为善，也就是认人人都可以为善，也使人人事事物物都得其所。因此，假使有一人不得教养，一夫不得其用，一分力不出于



1944年9月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图为民盟主要领导人（左起）：罗隆基、沈钧儒、张澜、左舜生、史良（女）、章伯钧。

身，一货委弃于地，一贤一能不见选，一事不信不睦，一物不为公，那就都算不得充分的民主。

那么，在今日中国，谁，什么党派，怎样作法，在原则上，最有使中国民主的可能呢？那它至少也要具备三个根本的条件。

第一，必须是中国的。这些年来，许多方面都有“中国化”的呼声。似乎直到今日为止，在这方面并没有很走上轨道。但是如果在中国，对中国事，而不由中国人以中国为第一位；所采取的办法不扎根在中国的本土，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必不免多少隔阂。如此，要想把中国整好，究竟是事实上难以置信的事。文明犹如酿得好的酒，文化则如多年的陈酿。一种文明几千年蕴集下来的气息，本不可能也不能完全

抹杀。不过，中国的优良处究竟是些什么？虽还不无有待于表扬，但关根本总目，倘有虽流行而实不伦不类、不合中国真正传统与时代的，也不容不即行不努力矫而正之。消纳世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利用世界一切利用的利器，自也同属绝对的必要而分当。

第二，必须是独立的。要想国家（民族）独立，要想自力更生，要想与全世界进步的人类携手而作自己应作的独立贡献，那就中国三四百年来先有异族窃国继有帝国主义侵略所强迫铸成一切奴性或依赖性，不管是好的方面、坏的方面的，都须立即廓而清之。中国的民主必须以中国为本位而行之；中国的民主也必须不依赖它国而行之（就令是最好的友邦也罢）。

第三，必须是民主的。这就是说，号召民主的必须在自己可能范围之内自己先民主，有民主的精神，行民主的办法。庶几可收以身作则，以身教者行，以致釜底抽薪之效。否则纵然不是教猱生木，却等于缘木求鱼，等于抱薪救火。

中国今日是处处都需要民主；都需要有法守法；都需要使一切有关人都得过问有关事，人人都有贡献其知识能力的机会，并有看见其贡献被采纳实行的自由；也不得不需要在民主自由之下的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以为一种进行事情的途术。但是，当然，在一个意义上，政治上的民主，在今日的中国，也可以说，尤为根本。必须政治上真正走上了民主的途径，然后一切方面，一切角落，封建落后的情形，才有肃清的希望。

不过，政治上的民主也未尝不需要别的方面配合。如必由别的区处多培养些有益民主的精神习惯，也未尝不可以有助于政治民主化的进行。

这，特别就在哲学与科学上。

哲学是讲可能的学问，是根本原则的学问，本以体与辩为方法，而以通为归宿。因此，哲学对于人生特别可以使人注意根本，使人看到大处远处，使人养成大量的习惯，而不拘于狭隘的小圈，强作物我之别。也就是可以使人能够有理性：能够由前提推到结论，由结论回溯前提；能分别，有分寸，重分明，于异见同，更于同察异；能够作面面观，如实观，平等观，也能容纳多方面，重视种种不同的它方面。这都是充实民主所必需。

至于科学，更是实在的学问，是朴实实验踏实认真的学问，更可以帮着人养成踏实认真、实事求是、正视事实、注重证据的习惯。使人可以感到：民主一定要货真价实，冒充一定不行。尤其形式科学中的算学，常弄乃可以培养人的谨严、精审、周密不苟的作风。有了这种风气，实也大有助于真实民主的实践。

今日要想实践民主，发展民主，是必须变得有了理性，是必须与哲学的大量精神，与科学的踏实习惯，与算学的谨严精审的作风，密切结合的。

是的，实践民主，发展民主，使民主进步，实现社会一切方面的民主设计，以便全人类适应生物进化的一般路向，都走上遂生、大生、美生的平实着实的坦荡大道，这乃是今日整个世界的大势所趋，任何人不能违抗之，任何人、任何党派、任何办法，如是因此大势而利导之，必会成功，不这样子，必都失败。以上所说，不过原则。至那有关今日全世界的、进步的、活的民主的一切更具体的办法，那就尤愿合全世界有心有脑的人共同商讨，分别草定，群策群力，促其实现。

《新华日报》1943年10月8日

强大而民主

郁　敏

以国土和人口来说，中国都是一个大国；然而中国还不是一个强国。在这次抗战中，我们就因为不是一个强国而吃了很大的亏，虽然我们也因为是大国而占了很多的便宜。由于抗战的刺激，使人们深感到中国必须努力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有人主张中国建设的方针是“富国强兵”。有人提倡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是“国防文化”。但这样主张的人常常忘记了另一件很重要的事。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本来都是世界强国，然而结果怎样呢？意大利已经一败涂地了，德国和日本也很快要全部垮台了。这些法西斯国家未尝不是以一切文化力量都集中在国防上，然而富国强兵对于他们，到头来仍只是一个幻梦。

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克利浦斯最近在伦敦援华大会上说：“中国在最短期间内应当成为远东的强大民主国家。”——这话，我们相信，是可以代表一切真正的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企望，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自己的要求。

这就是说，中国不仅要成为强大的国家，而且要成为民



抗战后期重新组建的中国海军

主的国家。这要求是从人民的切身痛苦中生出来的，也是抗战所迫切需要的。只有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阿Q，才会一梦醒来，说中国是一个最民主的国家，想根本淹没人民的要求。

我们再不应该以为，只要船坚炮利就能算是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我们所要的是民主的强大，和那不民主的强大是必须严格地区别开来的。这就因为：不民主是会把抗战弄垮，把国家弄糟的，一个被侵略的国家采用不民主的制度，根本没法强大。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是不是代用品呢?

友　谷

朝鲜义勇军的宣传员用电话向敌人堡垒里做政治宣传，指出日本国内的贫穷的时候，敌兵很神气地说：他身上穿着的正是前天刚发下的新军衣。义勇军同志马上不客气地追问："那么细细看是不是代用品呢?"这一问就把敌兵问得哑口无言（见2月6日本报三版，《朝鲜义勇军》)。

这的确是非常厉害的追问，这样的问题在别的场合，在别的事情上，也是值得提出的。因为在这世界上的确有很多骗子在活动，所以我们必须这样一步紧一步地追问。光是口头说说空话，我们不能相信，必须追问：事实到底如何呢?纵然俨乎其然地拿出事实来，我们也还不能马上相信，必须再追问一下，是不是代用品呢?——这样追问下去，才能揭破骗子的勾当，才能达到货真价实的目的。

假如你遇见假充风雅的市侩，拿出周鼎汉器、唐宋真迹来给你鉴赏，而你存心扫一扫他的兴的话，那么你不妨追问："这些是不是代用品呢?"把假货认成了真的往往不过是受骗上当的人，这些假货是从古董商手里买来的。那些古董商今天躲在房间里偷偷摸摸地伪装假造，明天就拿出来眩示

给人，说这是如何名贵的古物，对于这种骗子，我们应该严词斥责：不要拿代用品来骗人！

但假造古货，不过是骗术中的小焉者而已。一切骗子中最大的骗子是法西斯。要知道法西斯，不只是善于说空话来骗人，而且是善于制造代用品来骗人的！

法西斯国家中也有新衣服，但新衣服是用木屑树皮做的——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是代用品！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 年 1 月 28 日

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李　普

有人说：民主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因为免不了你一嘴我一舌，议论纷纷，所以必然会减低行政效率，甚至毫无效率可言；因此，特别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之中，民主是绝对不适宜的。解放区的经验证明这是胡说。

共产党员对民主作风的学习中，党的领导机关的坚决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但是同时，民主作风本身所发挥的惊人的效率和力量，也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它本身的那种惊人的效率和力量，民主作风的普遍风行便会是不可思议的事。

同时，如果实行民主反而必然减低效率，削弱力量，那末“民主是一件好事情者”，究竟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恰恰暴露了那些衷心反对民主却又不得不伪装民主的人，只是在抄袭一套刀笔吏“欲抑先扬”的恶劣手法吗？

我们还是来谈点实际的事情。首先，让我们介绍河北临城西峪村村长、共产党员郭秋根转变作风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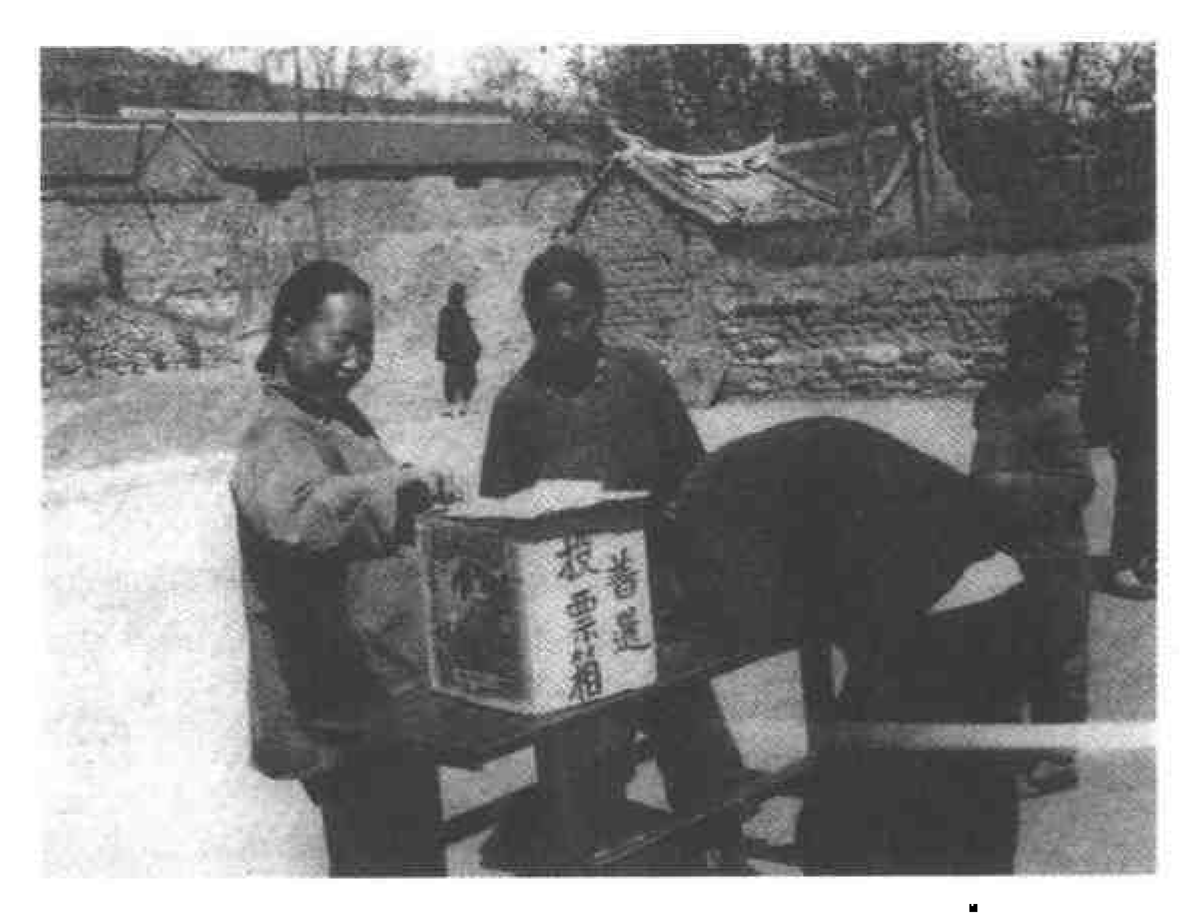
郭秋根转变作风以前，这个村庄事事没有生气，抗敌工



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图为农民在进行选举）

作做不好，生产运动搞不起来，全村仍旧过着贫穷的生活，年年不够吃的。以后，由于他“使唤了民主”，才动员和组织了全村的力量，领导了全村从贫穷走到了富足。县上开劳动英雄大会时，这个村子被选为生产模范村，他自己也被选为模范村长。下面是他在大会上的讲话，让我们看他怎样一点一滴，慢慢地尝到了民主的味道。

“我是抗战以来的老村长，自己过去的作风是‘下马三声炮’，叫别人干什么，不干就不沾。我常常说，西峪村的老百姓都是我的人，一切都在我肚里装着，我啥事情不能够做主？去年麦收前上级调我到县里受训，讲的全是‘树立群



投票的农村妇女

众观念，克服行政命令'，并让我们反省。我当时发言说：'如果和群众商量，啥事也办不成。老百姓是奴隶性，不压迫就不沾'。上级又给我解释三次，我说：'就比如我们村干部吧，区里不硬逼还不干哩。老百姓不逼还能沾?'后来上级又说：'光强迫在群众间树立不下威信。你想想，如果上级对你光强迫，你心里能高兴吗?如果你能好好说服群众，用道理打通他的思想，那样群众一定很满意，你在群众中，就有威信了。"这句话把我提醒了，我发觉就是这样，如果上级光强迫我，我也是不高兴。如果我光强迫群众，同样群众会不信仰我。这样子对上对下都不落好，何苦来?在心里

总有两种想法：一个是和群众商量说服，到底沾不沾还不保险。一个是自己命令劲头已形成了老习惯，还不能一下子克服，必得慢慢来才行。

“受训回来以后，我心里的想法是试试吧，看到底哪样办法沾。后来我就开始试验了，起初我想先和群众商量商量，如打开脑筋就算了，打不开还是强迫。试验了一下没试成功，我就逐渐不信上级所说的话了。

“到冬天，上级布置了扩兵工作，全村干部都忙起来。这个去说服，那个去动员，总是不沾。年青人大家都有意参军，但是谁也怕走后家里没人照管。干部说保证优待，他们不信。我那时候没有学会民主，在群众当中毫没有威信哩，这事情可真是不假哩。后来我们想出个办法，就是让群众大家讨论，大家动员，大家保证优抗。这样一试验，就弄成了。我一想：原来是人多话大，大家保证优抗，就使想参军的人安了心。这就使我感到群众还是沾，动员大家做，比光是干部做有效力。

“今年春上，上级号召打洞备战。干部伙看了一个地方，群众都说：‘干部看的地方打下去准有石头。’打了一下，果然被石头挡住了，群众看的地方一打，就打下去了。这又给我一个经验，就是群众大家的办法比我们的办法沾。”

从此之后，他就遇事采取了和群众商量的办法，比如，“全村割麦时干部会计划的是五天割完（往年是紧七慢八），又派群众讨论了一顿，大家都说四天保险能完，可是干了两天半就收割、打场、藏粮都闹好了，这说明群众自己讨论决定的事自己定是‘肯干’。再如动员群众打蝗、开展秋耕、刨地等都是因为和群众商量讨论，所以闹的很好。”

这给我们说明了一个真理：

民主能发挥无穷的伟力，唯有实行民主，事情才能办好。

当然，这首先必须是那些事情真正符合于人民的利益。这一点十分明白，无用乎多加解释。唯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才利于实行民主，反对人民的人谁敢给人民以民主权利——世界上没有一个统治者愿意让自己压迫之下的人民起来谈话，愿意把自己压迫和剥削人民的企图和设施给人民来讨论，天下没有这样的傻瓜。

山东沂蒙区在几年以前开始推行民主文化运动的时候，个别的干部唧咕说："实行民主就坏了，办公不好办，不大离儿硬一点才行。"有的说："民主，还不是叫咱下台！"因此，比如某庄庄东头的老百姓要向庄长提意见，庄长一口就止住他："你提啥，我还有啥坏处？"

但是现在，诚心为人民服务的人们已经感受到了民主的力量，他们已在普遍地歌颂民主了。

让我们再引一个行政村主任的话：

"这几天的会，开的我脑筋有了些开化，越想越不对。像年冬时，要集军火合作社的款，村公所给我村计划跟老百姓自动一千块，我回去就按户每家摊了50元。款是集起来了，可是下层有了反映，说我主任办事不公道，'枣圪桃一类数'，为什么不论穷富一律50块？我那时心里不舒意，埋怨老百姓意见多。

"所以，过年时，要慰劳部队和抗属，我没有动员，又怕下层反映，就自己订了个数目，都给上层的摊开。好面、菜饭虽然也都起齐了，可是上层又有了反映，借口说为什么我不让人家下层抚军，说我压迫。我心里还是不舒意。

"这一次开会，我可想开了。前天队伍打开方山圪洞，

我想我应该发动劳军，这次我再没用摊派的办法。我民主了一下，让众人们自动，想不到人家都自动的哗哗报上来，你出三斤好面，我出一担萝卜，不论穷富都出的干脆，比上回还慰劳的多。比我心里事先估的也多。你们看，不民主，群众有反映（反感），事情也弄不好。发扬民主，事情就办的比你想象的还好。

“咳，我索性彻底吧。我做工作，老实说，什么都是应付。给老百姓谋利益，我不往那上头想。过去我一点也不积极。”（这时有人发问，以后你是还要应付，还是要积极?）“以后我当然要积极。你看，方山圪洞都打开了，我们要争取更大的胜利。有了民主什事还怕闹不好?”

对于诚心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主带给他以无比的信心！

劳动英雄温象栓说得好：

“我们要把坏思想丢到河滩里，明年开春，解了冻，给水推走，装上好思想、好作风去工作，大家翻身发财……。”

实践证明了一切，谁还能丝毫怀疑吗?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

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解放日报》1945 年 7 月 2 日

实现自由是“不切实际”吗？

李　新

联合国宪章里规定了人民的基本自由。我国人民正在要求政府立即实现蒋主席宣布的四项自由。偏偏在这时候，有人高呼自由万万不可行。这种意见，显然违反民意，志在维护国民党一党政府的现状。

《和平日报》昨天的社论，说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不听中央政府命令的‘非国家军队’与国家军队对立，致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这完全不合事实。这并没有说出人民最大的痛苦在哪里。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政治协商会议正在讨论中，中共及其他党派的代表都已提出了意见，这里不多讨论。要说的是，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在国民党党治党军之下，人民没有民主自由。请以事实来回答！看吧，“衣冠不整”的人，还在天天的抓，抓去打内战；老百姓开会，特务就去捣乱，动不动就要拆草棚子。这类事情数不清。人民“安居”了吗？大学教授逢场就去摆地摊、卖东西，工人时时会失业，失业后又不准要求救济，还要抓代表；官办工厂也拖欠工资，工人不能去要，倒反要被抓去坐牢，人民



1945 年 12 月 1 日，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当局武力镇压。

"乐业"了吗？这是因为军队没有国家化呢，还是因为人民的自由权利被国民党一党政府剥夺得干干净净呢？只要顾事实的人，都将异口同声说一句，不能安居乐业，是因为没有民主自由啊！

他们又说了，英、美、苏都没有实现民主理想，中国来实现，就"不切实际"了，更何况中国是在训政和宪政之间呢？我们再来看看事实吧。英、美、苏等民主国家，都已做到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选举等自由权利，中国不必"开风气之先"。可是，曾否追随"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之后了呢？他们又提到罢工、游行、示威的自由，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所未曾做到；教授治校是理想；就是罗斯福总统说的四大自由的一半，"不虞匮乏"、"不受恐怖"两大自由，都"不能便没有疑问"。反对自由者的话，是够露骨的了。在民主国家，罢工游行示威，几时未曾做到？举美国为例，罢工不仅在发展，政府还根据康纳利法案，承认罢工是合法的。游行示威不但不被禁止，还可以请政府派警察保护。至于教授治校，不受党化，过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现在的西南联大，就是经过教授会议来处理校务，这与其说是理想倒不如说是教育上优良制度的确立。说到四大自由，在今天以前，除了法西斯独裁者外，倒还没有听见有人反对过。现在重庆还是第一次看见公然对"不虞匮乏"和"不受恐怖"的自由提出疑问。如此说来，人民只应有匮乏的自由了，穷人王正兴必须卖儿子，陈望道教授必须摆地摊，倒成了自由的享受；而政府逼人民匮乏，倒成了政府的"合法"自由；至于受恐怖也成人民的自由，所以，"衣冠不整"的老百姓，只有受恐怖被拘捕，失业工人只有坐牢的恐怖，吴金山也只有被押起来了。特务横行，便成了政府执行恐怖自

由了。正告发表这些违背人民利益、维护独裁专政的谬论的人们，也正告反人民、反民主的当局，匮乏和恐怖的自由，是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条路是死路，不好再往前走了。人民要求和争取四大自由，是没有力量压得下挡得住的。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

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也是不可能了。目前再来企图根本否认民主政治对于抗战的重要，似乎也是不可能了。于是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法宝。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说，我国人民素来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训练，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实现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他们好像忘记了中国今天是处在艰苦的抗战中，忘记了中国今天来实现民主政治，不仅是历史发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战特殊的迫不容缓的要求。

至于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要知道，民众参加抗战动员，民众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们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在这种方式

下，群众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他们自身的教育和抗战事业，同时推向前进。

中国正开始向着民主政治的道路前进，这是抗战的需要。在这方面，我们的成绩虽还不大，但在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之下必能更加进步。今后的努力方针在于：第一，加强民意机关的发展，把现在的国民参政会和各省正筹备中的参议会，逐渐变为真正代表人民的机关；第二，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于抗战期间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这是提高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有效方法，也是实现民主政治，加强民众动员争取抗战建国最后胜利的重要任务。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社论《民主政治问题》

团结与民主

“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这是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合并了七个关于巩固团结集中人才增强抗战力量的提案，加以审查后，曾经过相当剧烈的争辩，可见全国忧时之士对这个问题的注意与关切。

谁都应该看清楚全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伟大团结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强盗的有力保证，历史曾证实了这个真理，我们的敌人也对它有深刻的认识。然而团结是和民主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没有民主，人民的权利没有保障，群众团体没有发展的基础，全国的优秀人才不能发挥他们的力量，那么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够震撼敌人营垒的全民的团结。只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团结在民主精神的周围，在法律上得到应有的切实保障，在政治地位上受到同等的待遇，才能够巩固全民的团结，才能够产生真正伟大的力量。这条治标办法的重大意义，也就在这里。

无论什么条文，它的价值要看它的实行程度怎样，否则它的作用将等于废纸。全体参政员是怀着无限的忠忱与热诚，全国人民是那样焦急地渴望着这一个足以转移我们祖国



1938年7月6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开幕。它是由各党派人士及无党派人士参政员组成的国家最高咨询机关，是各阶层、各党派合作抗日的政治象征。图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全体参政员合影。

命运的办法能够快些实现，过去一切足以妨碍团结与民主的设施应早日绝迹。我们的政府不应漠视广大人民的要求与希望，也只有依靠着精诚的团结与广泛的民主，政府本身才能够强大进步，完成解放全民族的伟大任务。

为了实行“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就应该在严重的民族压迫横加在我们身上的今天，消灭内部妨碍团结的现象，因为一个对内不能团结的民族，就不能在对外战争中获得胜利。波兰亡国的惨痛教训，就是摆在眼前的明显的事实，虽然它军事惨败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压迫政策，但我们应该认清在民族自卫的革命战争中，脱离了广大的抗日人民，是十分危险的。而且是对抗战不利的。仅是在消极方面而停止对抗日的人民、团体、党派的各种限制、取缔是不够的，虽然切实做到这一步已经需要很大的决心与努力，政府要更进一步创造全国人民能够在法律上获得政治地位上平等的一切条件，才能真正保证全国人民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

什么是“全国人民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的具体内容呢？

这就是说，全国抗日的人民要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出版抗日刊物的自由，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的自由，召集动员民众来抗日的各种会议的自由，研究各种学术思想的自由，信仰某种政治理想并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的自由。全国抗日人民要有参加抗战工作的权利，保持自己职业独立的权利，督促政府、帮助政府的权利。抗日人民的自由不能受限制，他们的权利不能被剥夺。除了有真实证据证实了是犯了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罪的人以外，以任何借口来限制抗日的人民的自由权利，是违反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意志，也是法律所不

容许的。

这就是说，一切的抗日党派应有合法存在活动的权利，共同发展互相帮助的权利。抗日的各党派可以发表他们关于抗战建国的言论，公布他们的政纲，出版他们的报纸杂志，招收他们的党员。一切抗日党派及它的党员同样可以参加抗战工作和政府工作，可以彼此虚心研究别人所信仰的东西，选举自己的代表到各级的民意机关中去。因此，如果组织对于任何抗日党派的阴谋破坏，暗杀、囚禁、逮捕抗日党派的人员，暗中限制取缔抗日党派的活动，不仅在政治上是决不应有的行为，而且应受到全国人民严厉的制裁。

这就是说，一切的抗日军队和地方政府都是我们整个抗日力量的一部分，它们应该一样的被珍视爱护，享受同样的待遇。不能够因为某些历史的原因，而对一些抗日的军队与地方政府加以歧视，或给予许多困难和牵制。这种情形今后是不应该存在的。

这些只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条件。依靠了民主政治才能够团结一切的抗日力量，准备着在适当时机来到时对敌反攻，争取最后的胜利。团结与民主，这是我们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战胜强大敌人最可靠的武器。

《新华日报》1939年10月5日

民主精神

战时能够实行民主，民主才能团结，团结才能争取胜利，这是若干人士所不相信，而被事实证明了的。单以英美两大民主国家来说，最近就有几件事实可以证明。

说远一点，在美国，罗斯福三度当选总统后，就以政治家的风度，发挥美国的民主传统，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威尔基亲密合作。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更进一步加强民主团结。威尔基曾代表美国访问英国，最近更决定以总统特别代表名义访问近东、苏联及中国。而且，为了动员及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加强反法西斯力量，释放了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同志。在英国，三年前被禁闭的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最近亦已解禁。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执政政党，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的地位，就排斥别人，压制别人，称他人为“异类”，相反的，他们为了战争的胜利、民族的安全，总尽量集思广益，使人人有为国效劳的机会、珍惜别的党派及各个阶层的努力。好

的，有成绩的，就赞扬；坏的，不妥当的，就批评。譬如，英国自由党的《曼哲斯特导报》就赞扬“共产党在争取此次战争之胜利中，起有显著的作用，因该党之宣传方法新颖灵活而有力，并在进行全国之共同事业时，彼等均能获得甚大之效果，实使我等为之惭愧。”同时，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提倡和效法的。

各个政党派别的存在，是有其社会基础的。已经存在了，就各自代表一种力量（省略一段）。大家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之下努力，更应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这样，反法西斯侵略的力量就能不断增强。这是英美当局及一切呼吁民主团结的人士所洞悉和深信不疑的。自然，在共同目标之下，不论党派间，以至于个人间，都会有关于具体问题的不完全相同的主张和办法。但是，这是能够获得一致的。这里，主要的就要靠前所举例的民主精神了。这里，就要靠相互间的经常接触商讨、互忍互让（省略一段）。真能做到这点，就能够互泯猜嫌，和衷共济，而不会手足自残了。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地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社论

科学、民主，继续前进

——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纪念

距今四十几年之前，一个青年的海军学生跑到日本去改习医学。在当时"科学救国"和"富国强兵"正是青年人共同的理想。但是，当他有一次在仙台看见了一部日本人拍的影片，"刽子手是日本军人，上断头台的是中国人，围着看而毫无表情，如醉如梦地在喝采的也是中国人"，他便憬然有感，觉得改革"已经硬化的人民的精神"，是比医学更重要的事了。从此之后，他"常常提笔"，"在寂寞和艰难中"，"喊几声助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他，就是在六年前的今天逝世了的中国新文化奠基者，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战士的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穷毕生的精力，百死不悔地从事着的工作，择要地说，是在为数千年来的专制政治所僵化了的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因为他确信"中国的改革，第一着自然要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的生命能诞生的机运"。他所期求着的新生命是什么？用他毕生的言行来说明，也正是孙中山先生



. 鲁迅、冯雪峰两家合影(1931 年 4 月 20 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上海各界人士为鲁迅举行隆重追悼会。10月22日，鲁迅葬于上海万国公墓。鲁迅夫人许广平（右1）、儿子周海婴（右2）、宋庆龄（右3）、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在鲁迅墓前。

以40年的努力来争取的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国，而要使这样的一个新中国能够诞生，他和中山先生同样热心，同样执拗地主张着：中国要有科学、民主！

科学与民主，已经不是新的口号了，但，半世纪来，赛

先生和德先生在中国，正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先行者一样，“依然在沙漠上走来走去”！巨眼的思想家是早就看清了这种阻碍新中国诞生的主要障碍了，他自己选择了的正是在沙漠为肥田的工作，开荒、疏浚，做“革命的马前卒”。枪毙中国人民心里的阿Q，肃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文明。——也许，中山先生不曾和鲁迅谋面，但是从真实的意义上说，鲁迅才真是中山先生的最忠实的协力者，最有力的发言人。

到今天，这位思想界的巨人已经逝去六年，他不幸而不及目击的民族革命战争，也已经继续了五年以上了。由于全中国的团结，由于千万健儿的英勇抗战，由于国际情势的丕变，中国已经走上了否泰交替的关头；科学与民主，又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了。但，在这黎明将要到来的时机，我们需要更大的戒慎与恐惧！在国际形势日见好转的时候，自高自大、自满自足的“精神胜利法”，不又在我们民族里的少数人心头开始蠢动了吗？用鲁迅的战斗精神来彻底肃清“中国地大物博”、“道德天下第一”、“外国物质文明最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式的阿Q性格，我们在今天更应该迎头赶上，更响亮地提出：中国要的是科学与民主！

《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9日社论

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

——祝第二届联合国日

自美国总统罗斯福去年宣布以6月14日为联合国日以来，到现在已经一年。去年有28个国家庆祝这一个节日。纽约曾有50万人的空前大游行。今年联合国胜利在望，全世界对于这个节日的庆祝，必定更加热烈，更加盛大。

人类的命运，现在处在决定的时机。决定人类的命运的，乃是此次大战的结果，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此次全世界人类反对法西斯野蛮侵略者的神圣战争中，我们中国进行了对日抗战六年之久，尤其是以劣势武器在敌后坚持至今的游击战争，乃是我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伟大奇迹。我国六年的抗战，诚如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老早就指出的那样，一改我国在国际间的地位。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由于卖国贼汪精卫之流把持国柄，勾结轴心，对外屈辱，对内反共，我中华民族曾被人看做卑怯无能的劣等民族，但是经过了六年的团结抗战，我国却已经被列入世界四大强国之林了。这种铁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起就主张的对日抗战乃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了当时主张屈辱投降的卖

国贼汪精卫之流是何等可耻。我们庆祝联合国日，我们庆祝联合国的胜利，庆祝人类正义之胜利，也庆祝中华民族的强盛，庆祝抗战的胜利。

反对法西斯，不仅为了人类的现在，而且也是为着人类的将来。现在所进行着的世界战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民主的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在民主的旗帜之下反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者赞成最广大的民主，这是无庸多说的了。而此次世界战争爆发后美总统与英首相同拟的大西洋宪章，也规定了人类的四大自由，和免除一切穷困与恐怖。联合国日发起人罗斯福总统在去年今日的演说中，再一次强调了维护人类四大自由的必要，他说："信仰人类共有之四大自由，乃吾人与敌人之主要分野。"又说："人类共有之四大自由，乃人类所需要之要素，正如空气、日光、面包与食盐之不可须臾或离，剥夺人类所有此等自由，则彼等必将无法生存，剥夺其一部分自由，则其另一部分必将枯萎。"我们庆祝联合国日，就要维护民主。我们庆祝联合国日，乃是为了拥护民主，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原则，它对外主张"亚利安种族至上"，对内则主张"盲从领袖"、"全民政治"、"全民经济"的独裁，反对共产党，压迫人民大众，一切民主自由被它摧毁无遗。不剿灭法西斯主义，不确立民主主义于全世界上，即使这次战争胜利，还不能奠定人类永久和平。现在与将来不能分离，抗战与民主亦不能分离，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一样，完全赞成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党员所参加的地方政权中，遵循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并把民主政治

的原则具体化，这就是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民主的政治原则应在全国实现，这不仅对于现在的抗战有很大好处，而且对于全人类也有很大好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民族，因为我国有很高的国际地位，我国的一切措施会对全人类发生极大的影响，对于将来的世界和平发生极大的影响。

可是，正在庆祝第二届联合国日的时候，正在全世界高唱民主自由的时候，正在法西斯侵略者快要倒台的时候，在我抗战阵营之内居然有人提倡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怪论，这岂不是奇怪之极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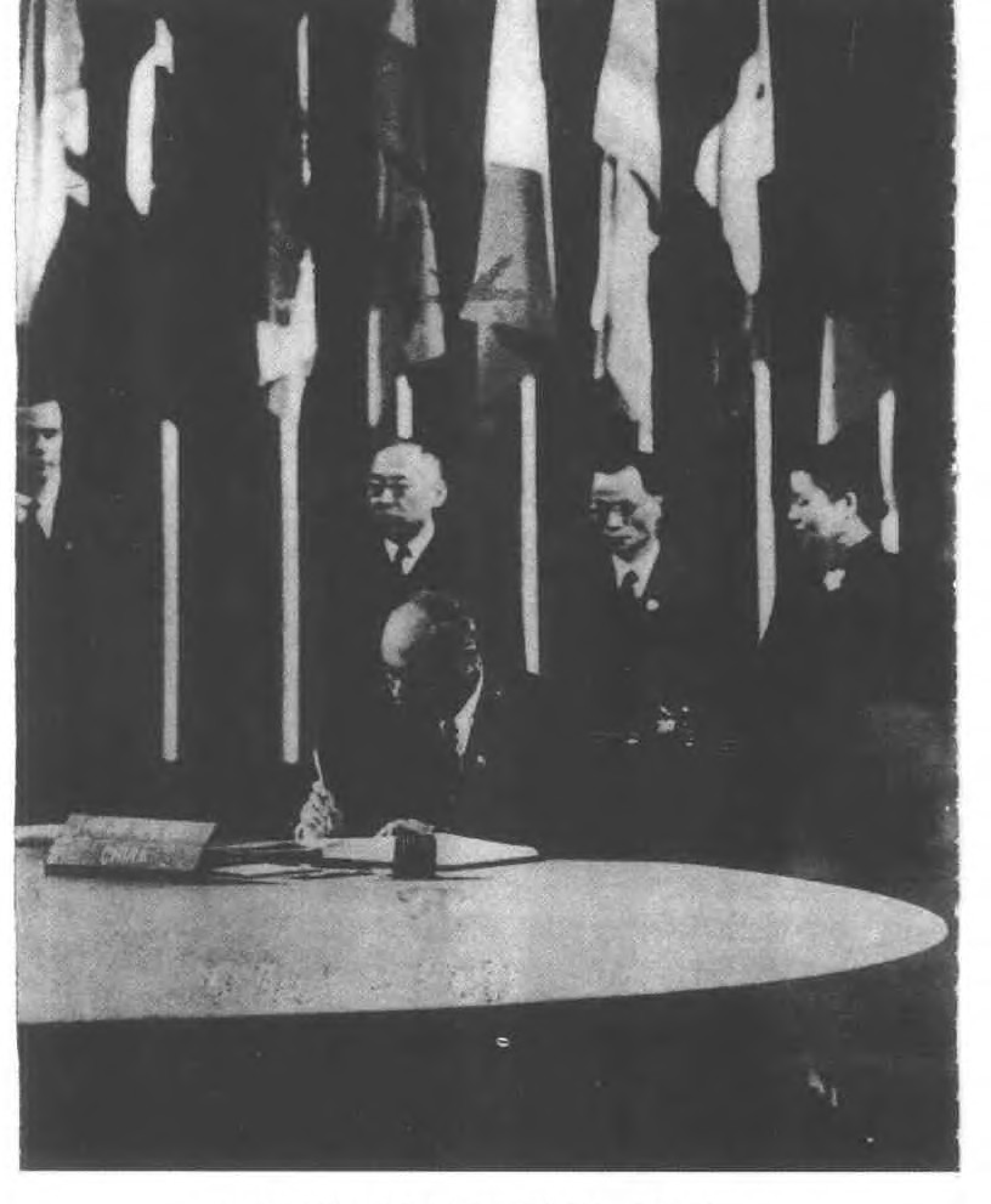
这些人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以“中国文化至上”来代替希特勒的“亚利安种族至上”。对中国以外的民族，重唱汪逆精卫的“以中国文化融化外族”的胡说。对中国国内，重唱希特勒的“全民政治”、“全民经济”、“全民战争”和“盲从领袖”的滥调。这个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完完全全像希特勒主义一样，公开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它也同希特勒主义采用同样的排外手法，自称“继承民族传统，排斥一切外来思想”。在实际上，它对于中国的传统，只继承了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等奸贼之特务政策的传统，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反对太平天国的反革命之传统，继承了一切唯心论的反动学术传统，它所抛弃的，却是民主精神的传统，却是岳武穆、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传统，以及中国五千年来学术史上唯物论的优良传统。对于“外来文化”，它所真正要排斥的乃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等进步的思想。而它在“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面具之下，偷运进来的，乃是大量最丑恶的法西斯主义的私货，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私货。中国法西斯主义者之所谓“继承民族



1945年4月，中国代表团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的制宪会议。图为中国代表顾维钧（左1）与美、苏、英、法代表在旧金山联合国筹备会议上讨论《联合国宪章》草案。

传统，排斥外来思想”，实际上就是继承中外文化中一切丑恶方面的大成，排斥中外文化中一切优良的成分。这就是现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代表们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之内容。这种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居然自称为“三民主义”，实在可笑之至，实在是诬蔑了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学说的民主精神，实在是诬蔑了中华民族。

我们庆祝第二届联合国日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对民主自由的憧憬，对人类光明前途的希望，我们心中也充满了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要在全世界扫清这个毒素，当然也决不容许它在中国猖獗起来，以致将来再陷我民族于万劫不复



1945 年 6 月，联合国在美国旧金山创立。图为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的地步。

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政治代表们企图提倡法西斯主义以毒害我民族的时候，为了使抗战胜利，建国成功，我国文化界就有一个极其严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要加紧进行反法西斯的教育。这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但是如果那样设想，以为当前民主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着反封建，就会走上另一极端，犯另一种错误。当前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乃是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如果有一时一刻忽视或忘却了这个现实，就是不对的。因此，我们所说的民主教育，乃是具体的、适合中国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今后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需要的那种民主教育，不能把它抽象了解为一般的民主教育，一般的反封建教育。这种民主教育，不应成为一般的反封建的教育，而只应为了抗日的目的成为一般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特殊地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否则，我们的教育就脱离现实，脱离当前的战斗任务。其次，应该把这种教育，安放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现实的基础上，而不应把这种教育放在空洞的名词或概念（如平等、自由、博爱、文化与科学的发展等）的基础上。在这里，我们也应紧紧地记着：民主与抗战是不可分离的，将来与现在是不可分离的。

正确的进行抗战与民主的教育，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这就会大大地增强力量，来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这就会促进人类正义的胜利，促进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就会帮助奠定将来的世界和平，和独立的新中国之建成，这才会更加提高我国在国际间的地位，而对全人类的和平幸福作更大的贡献。

《解放日报》1943年3月14日社论

民主第一

美副总统华莱士9月11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员会发表演说，曾强调“民主第一”的口号。他认为不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经济上也需要民主；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需要民主。他说：“‘民主第一’的口号，表示全世界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都应获得自由”。“能巧妙遵循这样的‘民主第一’的口号，并予以有力实施，则必能获得和平。”这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在法西斯侵略阵线秋风落叶般日趋崩溃之途的今天，为了实现和平繁荣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强调这种“民主第一”的口号，实在是必要的。

然而仅仅强调这一正确口号还不够，必须在事实上实现这口号。这首先就必须彻底消灭法西斯机构，根本消灭法西斯主义，完全肃清法西斯分子。华莱士说：“一般人最直接的目标是：尽速消灭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代表的一切；只有盟军进入柏林和东京时，才能提出和平条件；国际垄断专家不许在和平会议中出现；孤立主义必须继续被攻击。”这就是说，不仅要击溃现在的法西斯阵线，而且要消灭一切的

法西斯残余。只要是法西斯病菌还存在，则比会流毒于全世界，而所谓“民主第一”的口号，也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现。

其次，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实现“民主第一”的口号，那就必须反法西斯侵略的各国，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这口号。因为一方面，自己所提出的口号，自己负有首先忠实履行的义务。另一方面，“民主”是击溃法西斯侵略阵线的最有效的武器，抛弃这武器，则在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上，便没有绝对胜利的保障。即使幸而胜利，也将被认为是“以暴易暴”，不能获得全世界人民的拥护，而战败国在不公平的待遇下，也必定会时时作报复的打算。历史上，所以有循环不断的战争，这也是原因之一。

所谓反法西斯侵略各国必须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民主第一”的口号，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必须实行同样的民主政治。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的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法西斯意大利崩溃了，纳粹德国也面临着崩溃的危机，这正是反法西斯侵略阵线各国必须坚定地把握着“民主”这一击溃法西斯侵略阵线的最有效的武器。应该自己认真检

讨，究竟已否实行民主政治？实行得够不够？没有实行，就应该立刻实行；实行得不够，就该力求其够。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这是应该十分戒惧，十分警惕的。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培养起民主的风气

根据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宪政将在抗战胜利一年以后再实施。也就是说，至少今后数年中，还是国民党执政的时期。可是，就是在这个时期，人民还是时时刻刻关切和需要民主的。

蒋夫人前晚在蒋主席招待国民参政员的宴会上，曾把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和美国的民主精神，带给了国民参政员，并且也提到中国需要的民主精神。报纸上登载的虽然很简单，但是，已经很值得注意了。

的确“今日世界有两种政治思想，一种是民主思想，一种是轴心思想”，也就是法西斯思想。这两种制度和思想是对立的，尖锐地斗争着，而且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二者之间是没有中间的道路的。不民主，就是法西斯，或者，就会逐渐走上完全法西斯化的道路。“法西斯共和”，是墨索里尼的把戏，是对法西斯的掩饰，是对民主共和的讽刺，那还是法西斯，同盟国也是一样反对它的。我们中国既然列人民主国家的阵线，就要认真走完全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我们反对轴心，就是反对法西斯主义。



1943年9月13日，蒋介石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图为当年10月10日就职典礼后，蒋介石与宋美龄步出会场。

关于民主精神，要说和可说的话很多。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地讲几点意思。蒋夫人在报告中说到“民主国家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以后，即可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同时，她还提到对政府事务要常加批评，这种批评，要负责任，也就是说，“必须于批评之后附以改正的具体意见”，“使政府接受意见而有所遵循”。这是非常正确，非常重要的。要这样，就须关联到几个问题：首先，人民要有意见。这是不必多加讨论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政府事务的各个方面，因此总是有意见的。好的，它们也会称赞和鼓励，坏的，它们也会批评和指责，而且，也会提出意见来。其次，要使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这点就比较复杂。一方面，要人民能够说出他们的意思来，如果有一肚子意见，没有地方说，或者没有办法说，那就谁要想“知道人民的意思”都无从知道。另一方面，人民有意思，不管他说得出说不出，还要政府中人愿意知道才行，否则虽然人民的意思到处都是，应知道的人却还是不会知道。所以，一定要人民敢于说话，政府鼓励人民说话，热诚地去“知道人民的意思”才行。最后，人民敢说，政府愿听之后，还要政府积极“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才能使人民的意思不落空。要实现蒋夫人提出的很好的意见，这些问题，是应予注意和解决的。总括以上各点，我们再着重提出以前曾经提过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人民和政府，都要有自尊容人、从善如流、过勿惮改的精神。自己看重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对政府事务的批评和具体建议，同时，也要愿意不掺杂丝毫成见地容许别人发表他们的意见，不应该固执错误，应该勇于改过，不能一误再误。而正确与否，又必以“人民的意思”为最高的裁判者和最后的依据。

蒋夫人提倡负责的批评和负责的接受批评，确是切中时弊的意见。我们愿和全国舆论界一道，欢迎和支持这个意见，并尽力协助政府采取具体步骤，使之实现，培养起民主风气。

《新华日报》1943年9月22日社论

国父诞辰纪念

今天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七七诞辰。国父是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他奋斗一生，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他首创的三民主义，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人民能够过自由、平等、幸福的日子。国父是最能顺应世界潮流的伟大政治家。所以，他能够根据实际情形，不断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而这种充实和发展，都有一条明显的线索可寻，那就是一切为了人民，并决定于人民。

国父为了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坚决地反对过陈廉伯的法西斯党和一切叛逆，反对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反对过一切军阀专横，也反对过段祺瑞做了执政后召开的善后会议，因为这个会议不是他所主张的国民代表会议的预备会议，代表是由段祺瑞指派的，而不是由各军队、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民主地选举出来的。

国父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英明果断地采取了很好的政策，从对内到对外，从国民党的改组和与人民特别是劳动大众的结合，以及与革命政党的联合，到确立对外政策，着重中、苏亲密邦交。国父为了他的这些主张曾经以他

的伟大辩才折服那些怀疑的人，也以他的伟大的人格，感召那些认识不清的人，也以他的伟大的斗争精神，责斥了一部分反对的人。国父的主张终于胜利了！事实也证明了国父是完全正确的。

国父是中国民主主义的旗帜，是中国认真走上民主政治大道的明灯。现在，我们应再对国父的遗教，作进一步的研究。

国父对人民在中华民国的地位，曾经不惮烦地说了又说，解释了又解释。他问："中华民国之建设，以何为基础乎？"他的回答是："以人民为基础。""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副其实，必要这个国家是以人民为主。"这就是说，不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不谈建设则已，要谈建设，就一定要"以人民为基础"。尤其是在政治上，国父曾经这样尖锐地提出人民为主的问题："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公仆，受人民供应，又安能自由"（见国父演讲《释自由》）。"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这样的民主思想，是贯彻在国父的每次演讲和手拟的每个文件中的。解释什么是政治时是如此，阐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欧美的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民主不同，而为一切平民所公有时，也是如此。所以，国父对民主政治总说是全民政治或平民政治，而且，总千叮万嘱说："夫主权在民之规定，决非空文而已"，一定要名副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铭记和求其实现的。

国父对民主政治有这样明确的定义，所以他对人民参加中华民国的建设具有莫大的热烈的希望。国父不怕人民，不疏远人民，相反，他接近人民，代表人民，鼓舞和动员人民。而国父在对政党问题上，也有其民主的独到的见解。国

父说："政党之作用在提携国民，求进步也。甲党执政，则甲党所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野时，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焉。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焉。"国父主张多党并存，并确定了在野党的监督地位和纠正的义务、协助的责任。同时，更对什么是"良政治"、"良政党"有这样的指示："能使国家进步国民安乐者乃为良政治；能使国家进步国民安乐之政党乃为良政党。"而国父对政党间的竞争是非常重视的。当然，这里说的竞争又是以谋国家之进步、国民之幸福为唯一中心。国父说："谋以国家进步、国民幸福而生之主张，是谓党见。"其他则为私见，"因此而生之竞争，是谓党争。"其他则为私争。"党争可有，而私争不可有。党见可坚持，而私见不可坚持。"（以上均见国父所撰《国民月刊出世辞》）国父在这里，用极简单的话，把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运用，阐述得很具体而深刻了。在这个原则之下，国父还曾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这样具体的问题，提出了指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体系之不同是很明白的。然而两者对今天中国的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的认识，又是一致的。国父看到了这点，才肯定地说，共产主义对三民主义是"一个好朋友"。这些问题，在今天来重新恭读国父遗教，是更有实际意义了。

我们的抗战，正处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局势中，同时却也还有一段极艰苦的路要走。只有团结，才能渡过这段路程，在纪念国父七七诞辰的日子，全国一致来重读国父关于民主团结的遗教，并努力实行，实为加强团结，克服困难，走上胜利的顶好的办法。

《新华日报》1943年11月12日

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暖室

今年元旦本报的第五版，刊登了一个工业问题的特辑。在这里，谈到钢铁和机器，谈到后方和敌后，谈到了厂家的意见，亦谈到了工界同胞生活的片断。我们的能力是有限，我们的条件很困难，因之，我们所能告诉读者的，真不及真相的万分之一。这是十分抱歉的事情。然而，这一个小小的报道，就足够大家吟味了。

看看国际大势，德国法西斯很快就会倒下去的；中国抗战的胜利亦是一定属于我们的，然而，经济的困难，却沉重地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为什么有这种困难呢？有些人把它解释为“充分就业”的结果。如果从形式去了解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说吧!?就业既然充分，过了充分的一定界限，产业便就会像杯中的清水一般，从边缘溢出来。那末，溢出来的东西是不足惜的。因为杯中所盛的，已经够量了；亦就是说，我们的产业之发展，已是达到饱和的程度了。可惜的是情形并不如此。形式逻辑的结论与事实的真正内容，并不能一致。说一句干脆的话，我们的产业是可怜得很的，我们的工业生产还远远



1944年，资源委员会邀请美国垦务局总设计师萨凡奇来华考察三峡，准备着手设计三峡大坝水利工程。图为萨凡奇（前中）在中国工程师陪同下乘船考察长江。

落在需要之后，更远远的落在我们的盟邦之后，只有不够，哪里谈得到过剩?

然而事实上，却显得我们的生产，在闹过剩的危机了。这是本质上的生产不够与现象上的生产过剩之矛盾。解释这

个问题的途径，应当全面地去寻找矛盾的症结，而不是在现象的面前楞住，把缩小生产作为办法。还有些人，认为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能力不够的产业单位之没落，乃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不可避免的法则。让他们没落，不但没有坏处，而且有促进大生产发展的功用。因此，面对目前这种形势，这些人，是泰然自得的。他们的重点主义将会在中小生产的废墟上长大起来?！其实，这亦是不合事实的想头。阻碍着工业生产的基本原因，如果仍然存在，则伴着中小工业衰落的，将不是大工业的发展，而是囤积居奇的商业资本和充满着寄生性、腐烂性的特种资本之发展。

这是再明白也没有的事。中国的工业必须大大加以发展，它并没有饱和，它并没有满到边缘，目前溢出来的那些水，乃是由于杯中投下一些石块。投下石块，不但水会溢出来，而且有打破杯子的危险。我们很同意一位工业家的谈话：“民主和科学不可分，工业本身就是科学的体现。离开了民主政治，科学成了法西斯的御用工具；离开了民主，工业亦只是为了绝少的人的利益而耗尽了工人的劳力”（见元旦本报第五版）。我们更同意他的另一段话：“工人与生产如果不能以民主的方式结合起来，生产的积极性固然无法提高，工作效率无法改进；如果工业生产者和政府管理机构，不能以民主的方式和衷共济以求进步，工业生产亦无由改善”（同上）。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暖室。经济上的民主是解决当前症结最基本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上述的种种困难，才能使提高生产再不至遇到种种制约，才能逐渐克服这一个本质是生产不足而现象是生产过剩的矛盾。

《新华日报》1944年1月4日社论

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

立法院院长孙哲生先生[①]前天在宪政座谈会演讲三种自由，即民族自由、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他说这就是三民主义的目的。并勖勉大家要为争取这三种自由而奋斗。我们读了孙哲生先生演词，觉得语语切合今天中国的实际需要，因此愿略加申述。

今天全中国广大军民都为争取民族的自由而在对日抗战，大家都认识争取抗战的胜利是最主要的任务，也诚如孙哲生先生所说的："这是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大前提"。人民有这一认识，因之能在七年艰苦抗战中流血流汗，历尽艰辛困苦，总是极尽忍受能事。许多国际盟友，只要一度来华考察过的，莫不为我们军民这种牺牲精神所感动，这是最好的证明，中国人民是以民族自由、民族利害，放在一切之上的。

---

① 孙哲生，即孙科（1891～1925），广东香山人，孙中山之子。时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1949年退居台湾。

但是民族自由与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是分不开的。过去对这一点，见解庞杂得很。孙哲生先生的演讲，特别举出总动员的例子，举出盟邦募债成功的例子来说明："要使人民力量动员起来，必须给人民以政治自由"；"人民有了政治自由就能促进国家民族的自由"。这种见解尽管如孙哲生先生自己所说，被有些人所讨厌，认为是"尾巴主义"，但是真理总是真理，全国大多数人民都会举起双手来赞成。

孙哲生先生还特别告诉我们说：惟有我们的敌人——日本和德国，才是只讲一种自由的，他们的人民没有政治自由，所以他们不会积极作战。"有自由的国家不可侮，没有自由的国家，虽暂时强大，最后还是要失败。"这两句话，更是不移之论，目前盟军胜利的捷报，正在印证着这个真理。

没有问题，三种自由在今天，从其重要性说当然是民族自由为主；可是没有政治经济自由的配合，民族国家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这种血肉相联的作用，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抗战七年的今天，还待孙哲生先生来阐扬其重要，真要不胜感慨系之了。

以上是从三种自由互相的关联和作用，来说明它的不能分割；同时孙哲生先生从时间上分析，也指出政治和经济自由并不能一概推移到战后去处理。他指出：英美过去有政治自由而无经济自由，所以虽在战时，仍不倦地在研究、在草拟战后方案。这是别人的例子，说明虽在战时也不推诿应该做的事情。其次从战后环境说，大战一旦结束，各国纷纷复员，积极振兴；我们国土遭长期大战破坏之余，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太多，尤其不能等到那时再谈这些问题。这样的说法，也正反映了事实的需要。

孙哲生先生这些意见，在这国际民主潮流和国内人民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提出，是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他给每一个民主主义者指出了获取自由目标的方法和道路。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社论
原题：《孙哲生先生论三种自由》

民主与国情

当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务运动，主张学外国人造枪炮、办工厂的时候，曾遭受激烈的反对。反对者并不能否认外国的确靠了枪炮机器而比中国强，但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提倡洋务运动很坚决的薛福成在当时就曾如此说过：

"或曰：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民生之用，中外所同也。"

这个道理。到了现在看来，自然谁也不能发生疑问的了。

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 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科学，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科学。外国的水是氢二氧一，中国的水也还是氢二氧一；外国的大炮是那样造成的，中国的大炮也同样是那样造成的；外国在"声光化电"之学上已经研究出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移到中国来也还是有用。——既然外国已经先发展了这些科学，而中国还没有，那就没有办法，只好"用夷变夏"一下，从头学起

来。

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80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曾听见有一位乡下老先生说：中国人坐汽车会发晕，这就证明汽车只是外国人的玩意。现在却有些已学会了坐汽车的先生们说：中国人民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是适用于外国，不合国情，岂不是同样荒谬么？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所以，卜凯教授说得好："民主方式即为科学方式，科学理论不分国界，对任何人皆可适用。"孙哲生先生也说："中国不能与世界分离，我们要与世界各国图共存，必须适应世界环境与潮流。"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原标题：《民主即科学》

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

罗斯福总统在这一次再度当选后，发表声明说："我们已在战争中举行大选，这是80年来的第一次。"他这样说，是因为恰恰在80年前，美国有过一次在战争中举行大选的先例。

那是在1864年。美国的"南北战争"已经继续了三年多。正在战事十分紧张的时候，举行了总统的改选。大家都知道，那次改选的结果是林肯总统再度当选。林肯在那时是美国人民的民主力量团结的中心，他所领导的战争是为保卫民主制度的一次战争，所以在战时的大选中，他再度受到人民的拥戴。

这相距80年的前后两次大选交相辉映，其意义，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的，"是向举世证明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而这种伟大的活力是经得起战争的考验的。

在80年前，美国的民主主义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林肯总统在那时未尝不可以用战争的名义，凭借他政治上的既成势力来拒绝或者拖延改选。但他不这样做。他知道他不该这样做，因为战争和国家是否还需要他领导，应该由人民公意来决定；而

且他知道他不必这样做，因为他对于民主和进步的事业的忠诚和贡献，已经为大多数人民所公认了。由不拒绝改选这一件事上，也就证明了林肯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和对民主主义的忠诚了。试设想一下，假如那时林肯竟拒绝改选，其结果会如何呢？那么他就成了民主的叛徒，纵然还想恋栈不去，但人民是一定会远远地背离他了。

林肯的先例光辉地照耀着美国民主政治的历史。在80年后的这又一次战时大选中，不仅总统要重新选举，又不仅参众议院中都有许多议席要改选，而且在48个州中间有32个州的州长要改选。像这样的大事大更动发生在战时，似乎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因为这是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以人民的公意为基础的，所以整个改选过程是非常顺利迅速地进行着。四五千万人同时静静地写下了他们的选举票，决定把整个国事交给为他们所信赖的人。

由这样的改选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不仅没有扰乱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活，妨碍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恰恰相反，是更加巩固了国内的民主的团结，使战争的胜利更加有了保障，——正如同80年前林肯的再度当选所发生的作用一样，使民主进步力量在战争中的最后胜利加速地来到了。

那些一口咬定民主制度绝不能适用于战时的先生应该虚心看看这种事实！在这次战争中，各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议会中照常有着公开的辩论和对政府的责问，舆论上照常有着各种对于政府的人事机构政策尖锐的批评，人民照常有集会结社、选举罢免的自由，而像可以影响一国元首的那样的大选也仍照常举行。这一切都说明了，民主制度不仅是在战时完全可以适用，而且在战时运用得更加灵活，范围更加扩大了。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宣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只有忠于民主制度，坚决地依靠着民主主义这“生命的活力”的人，才能够在民主制度下继续存在；反之，害怕民主制度的人就是背离了这伟大的生命的活力，而终于会陷于死亡的绝境！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不是空喊民主

要做任何事情，先说空话是不行的。有人说，空喊民主，不能得到什么结果。这种批评自然是对的。

非但空喊民主不行，空喊打仗也是不行的。

欧洲战争快要到结束的时期了，法西斯的老巢——柏林快要被掘动了，这自然不是空喊打仗的结果，而是认认真真打仗的结果。苏联在战争中本有一句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他们喊了这个口号，也就认认真真照这个口号做了，一切的人力为了前线，一切的生产为了前线，没有一个人把存款放在国外，在后方逍遥享受。现在他们又喊出了“一切为了柏林”的口号，而他们也确是在面向柏林走着到柏林去的最后一段路，而不是背对着柏林空喊。

在我们这里也有“军事第一”的口号，而且似乎也还有人在写着、在喊着“到东京去”的壮烈的口号。既然有着这口号，就该认真想想怎样来实现这些口号。

美军在吕宋登陆作战，准备着在中国登陆，这些是一步步地走向东京去的路。但在我们这里专制贪污因循拖沓，缺乏效率，三万匹的霉布，三万万的美金存款，这些决不是到

东京去的路。

当苏联已经欢欣地走着到柏林去的最后一段路的时候，当美国已经一步步迫近东京的时候，我们还必须从头来扫清引向胜利去的障碍，虽然似乎晚了，然而赶快去做，还不太迟。

因此，民主不能空喊。而真正主张民主的人也的确不是空喊民主的时候。如何实现民主，再切实不过的一步步的办法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见本报25日发表周恩来同志抵渝谈话。及26日发表的民主同盟宣言）。

要使打仗不是空话，胜利不是空话，就要赶快实现民主；要使民主不是空话，就要实现这一步步的办法。反对空喊民主的人，为什么不快快照这套办法做呢？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民主的才是合法的

民主主义是克里米亚会议决定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它解决了民主主义和“合法”主义的矛盾。

本来民主主义和合法主义应当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一切的法都应当是经由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议决的，所谓合法，就是要合乎民主的决定，合乎人民的意志。只有在合法之法不是经由民主所决定、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而是法西斯或准法西斯主义少数独裁者所决定的时候，民主主义与合法主义才会发生矛盾。波兰问题就是一个明白的例子。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拼命诋毁今天真正在国内领导波兰人民抗战、真正由人民选出得到人民拥护的临时政府为不合法，仿佛只有流亡政府自己才是波兰人民及各同盟国应当承认与支持的合法政府。但是波兰人民都很清楚流亡政府所根据的 1935 年的宪法，是取消人民的民主权利，建立少数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法”。是人民大众所坚决不能承认的法。而流亡政府过去一贯的政策是消极抗战，积极反苏、反共、反人民、反民主，它使波兰人民遭受许多不应有的和可以避免的牺牲与损失。它对于波兰国家、民族没有功劳，只有罪

恶，所以它被波兰人民遗弃了，同时也不能不被同盟国家遗弃了。另一方面，它所拼命攻击诋毁的在波兰国内真正由人民民主抗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从事实上证明这是生根在人民中的政府，是不可动摇的政府；所以克里米亚会议上也不能不承认这个民主的政府，才真正是波兰合法的政府了。克里米亚会议对解决这个争论问题的原则，是将“法”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使“法”有民主主义的内容，决不是只问合乎旧法统或不合乎旧法统，而不问这个旧法统是法西斯的或不是法西斯的。因为，战争目的是为了民主主义，战争胜利依靠民主主义，战后和平的建立，必须经过民主主义。这是从战争胜利、从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解决问题。

克里米亚会议《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说：“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欧洲秩序的确立，以及国民经济生活的再建，必须凭借足以使被解放的各国人民能够消灭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形迹，并创造自己抉择的民主制度的程序来达成。”这正是以民主主义来打破准法西斯分子坚持的“合法”主义。而且用民主方式解决问题，也只有民主分子和民主领袖有权利参与解决。和敌人用各种方式或明或暗的妥协合作的反民主的人们，是应该被摒弃的。《宣言》中说：“成立临时政府，当使民众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广泛参加。”关于波兰问题的决定中，也说到现在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在更广大的基础上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的民主领袖””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建议，则说：“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大会应予以扩大，以容纳没有和敌人合作妥协的南斯拉夫最后一届议会的议员。”这正是罗邱斯三巨头对准法西斯分子所叫嚣的“合法”主义的回

答。他们决没有不顾人民的要求和战争的需要，离开人民，脱离战争，而无原则地支持准法西斯分子的“合法”主义，使战争受到损害。他们坚持了以民主力量的团结为基础，用民主方式解决国内问题的最高原则。这的确是贤明的决定。伦敦的南国政府同意了克里米亚会议的建议，伦敦的波兰人士如前总理米洛拉兹柯和农民党、大多数基督教民主党党员和半数社会党党员，都不赞成流亡政府反对克里米亚会议决定的顽固声明。证明了准法西斯分子的顽固的“合法”主义已受到广泛的民主分子和民主领袖的摒弃，只有自趋灭亡的一条路了。

我们完全同意克里米亚会议不支持法西斯分子的“合法”主义而确立民主主义为解决国内问题的原则的决定。今天中国内部的统一问题，如何动员与统一全国人民抗战力量的问题，也只有实行民主主义、只有遵循民主的途径才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比如：有些人极力诋毁敌后解放区人民抗日武装及民选抗日政府为不合法的，他们曾努力想法取消这些抗日力量。然而这是巩固的生根在人民之中、有着广大人民拥护的敌后抗日军队与抗日民主政府，它是符合人民的意志而产生的，它真正合乎民主的大法。反是想取消它或削弱它的，不能不是反民主的、不能不是真正违反人民意志的非法行为。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显示世界民主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中国内部统一问题，也必须循民主途径才能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希望国民政府与全国人民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新华日报》1945年2月17日社论

II

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工程师和民主

韦　华

离开大学我便在黔桂铁路服务，到这一次狼狈逃难止，恰恰三年半。在这三年半中，我测量过路线，监造过桥涵隧道，最后我主管一个军用车站，赤着脚在水田里看经纬机，修了马路，建了站台，造了好几所房子。可是曾几何时，这些都崩塌了，破坏了。

修这条铁路为的什么呢？为的运输物资、军队，为的打日本。但……假如湘桂等地工厂机器运不出来，而只是替特殊阶级运输桌椅沙发，那么又何必修它呢?！假如……

假如有更有效的方法能使这铁路多保存几时，能使桥涵隧道车站多保存几日，为什么不去做呢?！工程师就专为的是修路和破坏路吗？多少人都认为科学技术与政治无关，工程师不必去管政治，现在应该看出关系是如何密切。要是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去保存这铁路，去保护这些铁路上的员工，要是军民关系搞好了，民众组织起来了，军队生活改善了，铁路员工本身就是一个战斗单位，我相信我们的铁路是可以多用几日的，我们的工作意义当更大些，要做到上面这



1945年8月28日，八路军鲁中部队解放山东工业重镇周村

几点，单单局部改革没有用……；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实行并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了吗？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让人民思想！
民主最大的危机就在你的冷淡

[英] 普里斯莱

我们的男人打仗死去了，我们的女人含辛茹苦。所有这些牺牲都是为了民主。可令人困惑的是：在胜利之后，大多数民众能否适应民主？实在有太多的人，既不明了也不关心政治。而这样势必造成一种极危险的情势。

现在我不想打肿脸充胖子，说我们已有了所需要的全部的民主。我们还沿用一种可笑的等级制度；特权占有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仍在操纵人民和政治，人民常常难于了解真相，……这些我都承认。可更明显的事实是，许多民众不会恰当地运用我们已占有的民主机构，而它的力量比他们估计的要大得多。他们正像传说中的傻瓜，抱怨自己被锁在门外，却忘记了他口袋里起码有一把钥匙是他从未用过的。

其中一个麻烦，就是叫作"我们和他们"的思想习惯。对于军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军中他们只能服从命令，走到这儿又到那儿，做了这件又做了那件，因为一个莫测高深的上司要实施其计划。但如果把"我们和他们"的思想习惯带到民众生活中，就大错而特错了。事实上，并非有什么神秘

的“他们”在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而其余的人只能惟命是从、糊里糊涂地“我们”。只要我们有决心、有毅力，就可以有我们所喜欢的政府，并且可以看着这政府做我们大多数人所要它做的事。权力是握在我们手中的，只须我们肯诚心使用它。

我们必须使用它。在这国度中，大多数人，尤其是妇女，把政治看成游戏和嗜好，这真是一种可怕的观念。政治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它使我们卷入或脱离战争，它决定男人能否有固定的职业，女人能否有温暖的家，孩子有没有机会健康成长……。你可以对政治毫无兴趣，可你必须确信：政治对你却太有兴趣，政治绝不会因为你对政治不关心而放过你。所以，假如你不想作戏台上一具可怜的傀儡，给别人随心所欲地推来推去，你就别无选择——必须关心政治。这其实就是关心你自己。

人们在政治上感到迷茫，感到孤立无助的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现代生活太复杂，许多问题只有专门家才能正确地观察和分析。要得到最基本的知识，对常人来说往往是很难的。可这仅仅意味着：如果我们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权柄，那就活该我们倒霉，权柄必定为人所掌握——不是我们大多数民众掌握，就是极少数野心家垄断。德国人民放弃了，希特勒和他的党徒们就把它抢夺过去。要是我们宣称权柄对我们来说太深奥、太麻烦而效法德国人民，那你就乖乖地让希特勒式的野心家来独占吧，而他们必定凭借它变成奴役我们的永久的主人。

我们仍旧听到呼唤领袖的声音。对这种呼唤不以为然，我要算一个。很自然地，在三十六行中，行行都有领袖，而民主的团体当然也有被选举、被信任的代表。但有领袖是一

回事，“领袖们”所做的一切都比其他人英明这种想法，则是另一回事。民主就植根于一句老话之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让人民讨论、合作组织集体行动，不只成群结队地跟着领袖走，这样才会迎向光明。

民主，和别的生存方式一样，也有它独特的技巧。而且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比方说吧，如果我们的正当要求被拒绝了，我们就要去争取。这时我们就需要学习虽然麻烦却决非学不到手的关键性技巧，就是把利害相同、愿望相近的人联合起来，共同讨论，再拟定一个共同步骤。而这就需要妥协——求同存异——以求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最没用的人就是想得到所需的一切的人——若是得不到一切就生气而走开，不顾惜他方的愿望，不尊重他方的意志，因而永远没有巩固的盟友。在我们这个国度，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知识丰富，也不乏精辟见解，可他们自我拯救的种种努力却终归无济于事，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民主的技巧——怎样去与别人联合，也就是怎样达成妥协而实现互助互利。

我们一定要洞察我们的病症所在，调整原有的计划，而去发现一个公理。谈判、辩论，乃至怎样开会、怎样写决议案等细节，所有这些无疑既费时又繁琐。可是虽然如此，它们毕竟是民众自己主宰自己所必不可少的，是民众生活的艺术。有了热诚、坚韧的品性作后盾，它们就不但不会使人讨厌，反而会成为世上最具威力的武器。

我们知道了自己需要哪一种候选人，就必须坚决地推选他，这样才能使国会代表我们的意志。不然你就别抱怨你的政府，因为你从没有费过一点心机，用于挑选你所需要的正当的人。

可是必须牢记：产生效力的意志是群众的意志。仅仅千

把人的团体所发表的共识，要比 100 万个分散的个人的指责、诅咒有力得多。所以加入一个什么团体——或者组织一个新的吧！然后你的意志才能有机会变得更有力，你的活动才能有机会产生更大影响。你才可能移山填海。

我们的政府其实还算是对人民的意志感觉相当敏锐的。有些组织精密的少数人，能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而实现其意图，就因为他们组织精密。

……

我们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要是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因为我们握有这种权利。可这权利一定要运用适当。我们参加战争就为了这权利，若是不运用它或是运用不适当，那末有一天我们会大梦初醒，发觉它已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男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女人为之含辛茹苦的自卫法宝，我们已轻轻放弃。所以我们必须警觉，必须努力，而努力的时间，就是——“现在”！……

《新华日报》1945 年 9 月 11 日

（文字略有改动）

为民主拚命

黄炎培先生[1]在复旦大学关于宪政与民主的一篇泛谈，读来使人击节兴奋。这是黄先生最热烈坦白的一次言论，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足见民主的要求已经达到高潮，激荡着人心。

黄先生说得好："民主是不成问题的，一定要民主，怕的只是假民主。"又说："我们是为民主而战，为自由而战，就一定要民主，要自由。"他更指出，不管别人是不是有诚意实行宪政，"我们自己不动，休想别人把宪政的礼物送上门。"所以他主张"为民主拼命"。最重要的一点，是黄先生痛切地大声疾呼："民族的苦难日益严重，希望我们大家以后做人要改革作风。我以前作事也未免有些地方怕困难、怕阻碍，今后要说就说，要干就干，良心以为该做的便做，认为不当做的便不做，绝对不做。要做民主国家的人民，这是起码的条件。"

---

① 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人。中国民主同盟主要发起人之一。建国后曾任政务院副总理等职。



1946年11月，民盟负责人与中共代表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合影。左起：周恩来、邓颖超、罗隆基、李维汉、张申府、章伯钧、沈钧儒、董必武、黄炎培、张君劢、王炳南。

这是完全正确的。三心二意、口是心非或心非口是，都不是做人的方法，更不是争取民主的作风。要争取民主，就是要从改变这种怕困难、怕阻碍的作风做起，要敢于拼命。

黄先生的话，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新华日报》1944年6月2日短评

关心政治，改良政治

——一位工程师的话

我们机关里新近来了一个同事，是工程师，我们是个文化机关，和他所学的风马牛不相及。再打听一下，他在国内大学毕业，又在日本、德国留学多年，专攻航空工程，因为不善逢迎，先后被几家工厂和某机关赶跑了。有一次，他对我们发感慨道：

“我过去以为切切实实学点有用的技术，就可以报效国家，用不着关心什么政治。但现在我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来影响你。一种不良的政治，它到处会排挤你，压迫你；使你有天大的本领，也无用武之地，不仅报效谈不上，甚至连生活都发生问题。因为人家讲究的是派系、背景、吹拍、迎奉等等，用不着你的本领呵！这种残酷的现实，迫使我觉悟到：无论学什么的，都必须关心政治，进而争取改良政治，所以我以后决心跟随大家多多研究政治。”

没有良好的政治，学什么技术，也还是没有保障。

《新华日报》1945年3月7日

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万里长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经是人民的世纪、民主的时代了，一个国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于是中国必须而且必然要实现民主了。那么我们要问：如何才能实现？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200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一国的民主可以由国际条件来决定。固然民主潮流普遍于全世界，而一个民主的中国将不仅对中国有好处，也对世界有好处。这种国际形势是有利于民主在中国的实现。但是，世界的民主潮流是由于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中的人民卫护自己的权利，并抗击逆流而争取来的。中国人民假如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专一依靠国际条件来促成中国的民主，这也正和依赖外援来获取抗战胜利同样是不可靠的。

此外也有一种看法，是把中国的民主问题当做只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间的问题。固然国共两党间的关系是目前国内政治生活中主要的、甚至是核心的问题。但是实现民主是全国人民所共同要求的事，在国共两党以外还有许多党派和无党无派的个人，还有更广大的人民，他们都反对专制，都要求民主。实现民主是有关广大人民的事，也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人民一定要积极起来，主动地参与国内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反对实现民主的一切障碍，中国才能真正走向民主之路。

由于无数次的实际经验和教训，中国人民已经渐渐摆脱了这种种不正确的看法。他们由等待而失望的经验，使他们懂得了要民主就得用自己积极努力来对中国并对世界负责，这样才能在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实现中国的民主；他们不再袖手旁观站在国共两党之外，他们知道在民主团结问题上，他们并不是旁观的第三者，而是应该发挥主人翁的决定作用的。

人民要发挥这种主人翁的作用，就一定要坚决地依据民主原则，在有关全体人民利益的国事的一切具体问题上，有所判断、有所主张，然后为了自己的所信而行动。

在参加民主斗争的人民中，包含着各个不同的阶层，有最广大的工人和农人，也有小资产者、自由资产者、开明绅士及其他爱国分子。在某些个别的问题上，他们相互间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在有关整个国事的问题上，他们的主张和行动是可以而且应该一致的，只要他们都能坚决地执行民主的原则。这种一致性不是这一部分人服从那一部分人，而是大家共同服从民主的原则；服从民主的共同原则也不是牺牲个别的利益，因为民主的原则也就是整个国家民族所渴求的原



歡送晋京請願代表

1946年6月，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下，50多个群众团体推选代表组成上海人民赴京和平请愿代表团，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图为6月23日上海各界5万余人在北火车站举行欢送和平请愿代表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

则。

人民大众要用民主原则来团结自己，来反对民主的阻碍。没有任何名义可以改变或歪曲人民大众的民主原则。法统主义么？人民大众要根据民主原则来检视这种法统是否还应存在。权威主义么？人民大众也要根据民主原则来检视这种权威是否值得尊重。只有民主原则能够决定人民大众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做什么、要不做什么，也只有民主原则才能解决问题，转变时局。

中国人民已经看出了自己的力量，看清了国际潮流，并且懂得了如何发挥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就要以主动积极的态度，以明确和坚决的精神，根据民主原则来参与国事，来掌握中国的命运；这样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就一定要实现。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III

民主主义的利刃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

——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①]等人的谈话

美国已经干涉了有它的军队和物资运人的每一个国家。这种干涉不一定是有意的，也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是只要有美国的影响存在，干涉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如果美国只把武器给国民党，实际上就是干涉。因为它使国民党有可能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意志。“干涉”（毛泽东指出，他对这个词是有异议的，因为这个词用在下面这种情况下已失去了它的原意），以增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就不是干涉，它将为中国广大群众所欢迎，因为他们需要民主，只有国民党才反对它。

美国现在的地位完全不同于珍珠港事变刚发生的时候，不再有任何需要或任何理由去栽培、哺育或抚慰蒋介石。美

① 谢伟思（1909～）美国人，时任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1944年7月陪同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主张美国政府对国共两党一视同仁，因而在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逆流中遭受迫害而被停职。本文选自谢伟思访问延安后给美国政府写的一篇报告。

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战争计，他应当做些什么。美国只能在蒋介石顺从美国要求的条件下帮助他。美国人发挥美国影响的其他方法是多谈论美国的理想。在中国或在美国，每一个美国官员和任何中国官员谈话时，可以谈论民主。类似华莱士的访问就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这种机会应当更多一些，不要错过孔祥熙在美国的机会。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我提出，把我们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部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我们没有像共产党政治部那样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

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却不是这样，它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们究竟有多少美国观察员在前线？我们乐于让你们的人到处走走。国民党却担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的影响，他们害怕美国人登陆仅次于他们害怕苏联参战。

从相反的另一方面来看，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人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昆明是一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西安的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

美国刊物对国民党提出批评是很好的，它的效果不可能马上就看得出来。甚至看来常常会暂时地产生不良反应。但只要它是光明正大的（如果它是光明正大的话，国民党就会辨别出来），就会引起国民党犹豫考虑，因为国民党需要美国的支持。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
1983年第20～21期

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即使对国民党来说，事实也很清楚，中国的政治潮流是倾向于我们的。我们坚持了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是一个真正伟大而又民主的文献。孙中山不是共产党人，宣言仍然是有效的，它不会很快过时。即使国民党崩溃，我们也会坚持这个宣言，因为它的总政策是好的和适用于中国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纲领的每一项条款，都可以从这个文献中找到。

当然，我们并不假装自己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也面临着官僚主义和腐败的问题。但是，我们正视它们，我们正在克服它们。我们欢迎美国人、国民党或者任何其他人的监督和批评。我们经常自我批评和修订政策，朝着更有效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地区里看到这种不同之处——人民是生气勃



1945年9月16日，毛泽东同在华美军第14航空队士兵杰克·埃尔曼（左）、霍华德·海曼（中）、爱德华·贝尔（右）等在重庆第18集团军办事处合影。

勃、富有兴趣和十分友好的。他们具有人类抒发情感和精力的机会，他们已经从沉重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了。

(我对他强调美国的重要性而忽视苏联，提出了疑问。)

苏联参加远东战争或中国战后的建设，这将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情况。苏联人在战争中已经遭受巨大的牺牲，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

(我开玩笑地说，“共产主义者”的名称可能使某些美国实业家不放心。毛泽东笑起来，他说他们考虑过换一换名称，但是如果人们了解他们，就不会感到害怕。)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全然是没有偏见的。我们的减租是从过去的百分之八十、七十、六十降到法定的（根据未付实施的一项国民党法律）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过想要逐步地加以完成，因为我们不需要赶走地主。我们对利息的限定是年利百分之十，考虑到这比流行的利息低得多，所以它并不是绝对的。

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

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的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我们既没有只吸收西方机械技术的天真想法，也不对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感兴趣。这种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窒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仅使官僚们发财致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建设的和生产的方针上，使国家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请看我们这儿以有限的资源已经做了些什么）。其次，我们才能谈到“国防工业”，像蒋介石在他《中国之命运》中所谈论的。我们将关心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

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合作。我们应该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十分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们美国人的想法和打算。我们不能贸然反对你们——不能贸然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

《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真实的民主战士

罗 洎

虽然美国是全世界最早的一个民主国家，但是要从美国开国史中去找寻关于民主主义的完全的理论，我们不免是要大失所望的吧。已成为民主主义的经典的《独立宣言》，内容是何等单纯，所谓“天赋人权”的说法，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已不免会觉得太幼稚了。

但是我们若真正用历史的眼光，把自己也好像置身于18世纪中叶的时代中间，那么我们一定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的罢？我们可以看到一批真实的民主战士，他们是何等坚决，何等勇敢！他们的信念虽然单纯，但他们是何等顽强地坚守着他们的信念，而且大声地说出他们的信念，毫不含糊，毫无顾忌，而且在行动中贯彻他们的信念，再不掉头回顾一下。他们虽然说不出一套漂亮的理论，但一切学究的理论在他们的伟大作为之前岂不都是苍白可怜的存在了么？

假如历史的运行究竟不是在纸面上，而是在实践中；假如民主主义并不只是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而是在实践中的信念、硬是非这样干不可的生活态度，那么我们不能不景仰这些在160年前从新大陆的“贱民”中站起来的民主战士。

他们建造了新的天地，开创了新的历史；一直到今天，在全世界人类为反对法西斯、保卫民主而战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从他们所言所行中得到无限的鼓舞。

美国的开国英雄共同持有一个信念，就是：人与人是生来平等的。关于这点，他们并没有引经据典，写出有系统的理论，而或许在他们看来也不必要做什么理论的说明，因为他们觉得这本是自明的道理。他们演讲，就讲这个信念；他们写小册子，写论文，就写这个信念；他们行动，就要在行动中贯彻这个信念；他们流血战斗，仍只是为了实现这个信念。脱离这个信念而生活，对于他们，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试摘录点当时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的话来，就可看出他们的信念是何等单纯而又何等执着。像年青的哈密尔顿（A·Hamilton）说："人的神圣权利，绝不是从陈旧的字纸堆里找得出来的，而是用神圣的大手笔，好像用太阳的光辉一样，写录在人类的天性的全部中；那是永远不能被人间的权威所涂抹或者遮蔽掉的。"这是何等的坚信啊！霍布金（S·Hopkings）又说："一个人倘若有服从他人意志的必要，他就真是那人的奴隶！他有个恶劣的主人，他固然是奴隶；他的主人，纵然善良，他也仍旧还是个奴隶。"这又是何等鲜明的昭告啊！美国革命时代的民主战士们就是这样地尊重着他的民主的理想，而又这样地判然划分奴隶与自由人的道路，绝没有徘徊中间的余地。因此，当时还有一个人说："在唯一可憎的出路只是执役作卑贱的奴隶的时候，谁又能不去拿起卜鲁特斯（Brutus）的无情的刀，克林威尔（Cromwell）的鲜红的斧，或者拉瓦雅克（Ravaillac，刺死法王亨利第四者）的血染的刀呢？"于是当时的13州殖民地的人民就毫不迟疑地拿起他们的刀斧，打了七年仗，争得了他们不做奴隶而做

自由人的地位。

这一切看来真是再平易不过的了。但假如不是真心诚意地承认并尊重自己以及旁人做人的权利，那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所以在美国独立战争发动的那一年，有名的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发表了一本宣扬民主观念最有力量、对革命的发生有直接影响的小书，这本书的题目不过是《常识》二字（CommonSence）。欧洲的王公贵族所视为毒蛇猛兽的民主主义，对他们不过是常识，因为那已浸透在他们的全部生命中了。在这小册中有这样一句警句道："在上帝眼光里，一个诚实真挚的人，比古今所有的戴着冠冕的恶汉，对于社会还有价值些。"真正的民主战士，就不过是最诚实、最真挚的人。独立战争的领袖，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小学教科书上的斫樱桃的故事是已经使我们知道的了。

解放黑奴隶固然还是在独立战争后数十年的事，但独立战争中的人物如华盛顿和起草独立宣言的杰斐逊是已反对奴隶制度的了。因为这种制度显然和他们的信念不和。领导反对奴隶制度成功的林肯曾根据了独立宣言的精神而说："方今是一个交换的世界，凡不愿给旁人做奴隶的人，就应当不愿以旁人做奴隶。凡拒绝旁人享用自由的人，自己也不应该享用自由；既然是立身在公平的上帝之下，这样的人纵然有了自由也绝无久享之理。"这正是说，压迫旁人的人自己也不能有自由，这是何等辉煌的真理啊。而林肯自己是出自于木匠的职业，和华盛顿同样是最"真诚恳"不过的人。

就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民主精神和真实的民主的战士。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为 了 人 类

史 纲

为了人类！为了人类！
于是年轻的美国，升起了旗，
吹起了号角，击响了战鼓，
在新的土地上，新的天空下，
结集了世界爱自由的人，
开始实验着新政体，直到今天。
古老的有宿疾的欧洲，
早他六年就说了“自由、平等、博爱”，
年轻的美国却从出世婴儿
那时就实行了“民治、民有、民享”，
她没有高高的巴斯蒂尔要攻打，
她建立了高高的自由女神。
只有一种历史——人类的历史，
人类的结合——不是分离——的历史，
年轻的美国一章又一章的写
乔治·华盛顿写，杰弗逊写，

林肯写，而惠特曼歌唱，
如今是罗斯福在炉旁著述。
我们该如何羡慕年轻的美国，
像一个圆球的民主国家，
能平滑地滚动，富于弹性的蹦跳，
不像多边多角的法西斯统治。
年轻的美国没有对人类失望，
将来人要知道世界本是个圆球。

《新华日报》1943 年 7 月 4 日

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

钟　颖

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那使人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辉。

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了在别的国度里时常成为战争的导因，在这儿却能够整然不紊的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莫洛亚

300年以前，当英国的历史还充满着迷妄的各式宗教和君主威权的时候，一群一群的叛逆者，带着忧郁的心情，怀着自己的信念，渡过大西洋，流徙到这块没有开垦过的荒地上来了，幸福的阳光和暖地照射着他们，他们在这里坦开胸怀，尽情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他们把自己的全部努力，投向了大自然。忠贞的垦荒者啊，你们的数不尽的血汗辛劳，已给自由民主的理想开辟了一条广袤的道路来了。

他们为了完全摆脱加在他们身上的铁枷，1776年的独

立战争爆发了，独立宣言淋漓地发挥了他们对自由民主的信念，“一切人类生而平等”的誓言，永远地镌刻在每一个美国人的心上，他们坚决地认为创造者给了他们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了每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及幸福的追求。为了自己获得这些权利，他们才牺牲无数人的生命来进行独立战争；为了别人也能获得这些权利，他们才从血泊中解放了那南方被人当作牛马的黑奴，这就是美国追求人类自由、人类幸福的可佩的精神。

在这次反法西斯战争中，美国全国人民又挺身进到战争中来了，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许多火线上，都已有了美国健儿的身影，当你向他们发问对于战争的感想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一句：“该死的战争！”但他们为什么又是那么急切地争着降低年龄而参加战争呢？这正是美国人的自由理想和罗斯福总统所宣示的四大自由鼓舞着他们，正如杰弗逊总统所说的一样：“一百年或数百年之间，丧失几条生命，又有什么关系呢？自由的树常常要用志士和暴君的血去培植的啊。”战争的黑手已暂时地掩隐了纽约港口自由神手中火炬的光芒，民主世界不正遭到法西斯暴烈的摧残吗？

美国人民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它的行为均不能超出保障人民的天赋权益的范围，他们认为：“政府皆由人民组织而成，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他们的公正的权利，任何形式的政府如一旦变成破坏了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弃它。”杰弗逊告诉美国人，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就在于制止政府的压迫，林肯更告诉美国人：“若不得他人的同意，没有一个人善良得足以统治另一个人。”

因此，统治美国人的政府必须是由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政府或政党要想存在就不能不依靠人民，不能不保障

人民的权益。

美国人民当然更有对于（政府）进行批评的权利。假如一旦有了如社会救济、劳工关系及国家防御等问题的发生，全国各地选出来的代表就都在国会中发表他们正面或反面的意见甚至于对政府提出严厉的批评。没有一个人能够不让别人发表意见："看上帝份上，请让我们听到问题的两方面吧。"（杰斐逊语）但就因了这样，许多法西斯分子又把这件作为民主国家行动迟缓来反对民主国家了，罗斯福前年3月的一段话对于这些法西斯分子是一个很好的回答："是的，我们民主国家的决定，也许产生很迟，但当决定产生时，它就不是以任何个人的声音来宣告而是以1.3亿人的声音来宣告。"请记住美国是1.3亿人，不是一个人。

这样，美国人当然更要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来表达他们的意见的权利，首先宪法上就规定了他们的这种权利，并且还规定了国会不得剥夺人民的这种权利（遵检）。

这正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尺度，社会舆论虽然并不就等于行政措施，但政府对于社会舆论的重视，在他们采取行动的时候是有着决定的意义的。即使是一个很小的外交问题，国务院也要听取报纸评论及新闻、杂志记事及无线电广播等的个人意见或团体意见。国务院听取这些意见以后，就以缜密的整理方法对这些加以检讨或采纳。

为了使人民能够经常明了政府的措施，罗斯福总统从1933年又恢复了招待新闻记者会议的办法。记者招待会和普通会议不同，总统出席的目的是在尽可能详细地回答记者们所提出来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总统，随时出席和记者们谈论并准备答复记者们所提出来的问题，不能不说是民主国家的特有的风格。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政党的作用是在为人

民谋福利，和表达他们的意见与实行他们的主张，任何政党要想获得胜利只有用自己的足以代表人民的行动来争取。

美国还是充沛着青春力的国家，青年人正在毫无阻拦掘发着对于民主的将来，实验着自己将来的民主生活。这些青年政治家们还在 1934 年集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蒙脱查马学校举行了一次“美国理想青年会议”，随即“青年州政府”就宣告成立了。1936 年 4 月，他们更联合教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开过一次宪法会议，此后曾一年举行两次立法会议。

在大学校园里的美国青年，他们对于民主的理想，自然也受着同样的训练。一个社会观察家，某次随意地选择了几个学生，问他们美国的民主主义已有了什么成就和具有怎样的潜在力，一个学生回答这一个问题说：“美国的民主主义已在世界历史中把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大无畏精神给与他的人民了。”另一个学生说：“学校的训导使我们开了眼界，使我们知道民主制度是怎样具有不可数计的价值，使我们对这种制度发生了最深的信念。并鼓励了我们在探讨怎样才是保持和扩充这种制度的最好方法。”这些回答，不过是许多答案中的两个例子罢了。

美国还是一个朝气勃勃的国家，他们不怕困难，他们更不怕新的事物，需要和平的时候，他们会在和平中努力于开拓幸福的生活；需要战争的时候，他们也会谈笑自若地从30层的高楼，从千百的小城镇上夹在丁香丛里的大街，从草原上的褐色砖房中走出来，回头向自己的家门说声“再会”，走上千万里以外的炮火连天的战场，献身于保卫民主的战争。他们相互间有着最纯洁的友爱，他们见面时互相亲切地招呼着“老兄”，他们的友爱不仅及于所有的美国人，而是如林肯所说的“一切的人”。

他自己活着，他自己死去，
他爱，他恨，他传宗接代，
无庸一个政府计划的监察，
这就是一个美国人！

（英）P. BENTMEY

爱好自由，在今日的国内依旧汹涌而稳定。

（罗斯福1940年6月演说）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2日

延安印象记：共产党对美国的友谊是真诚的

[美] 白修德

共产党的基本的外交政策是倾向美国的，因为他们认识了我们（美国）将为太平洋上最大的力量，认识了我们是反抗那可恨的日本的大盟邦。在实行这个政策中，他们一切的宣言现在是向美国说明三种意见。第一是说明他的党在抗日战争中拥有庞大的力量，一个可以直接配合美国作战的力量。第二是说他们党的本身，它的政府以及军队，是以有作为的、民主的制度为根据的。第三是说该党愿永远和美国作朋友。

关于共产党所能调遣的军事力量，那是没有问题的，其范围，可以从日军及其附庸军队在那些地区的配置上反映出来。

关于民主的办法，现在也没有问题。共产党现在实行民主，是因为民主有利。你可以请一个曾经被赐打、被欺负、而其父亲传给他过去受压迫的记忆的农民来，然后，你拿他当人看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选举当地的政府和治安机关，让他自己去表决减租，让他自己去选举军队和民军，假



1946年周恩来与访问延安的美国女记者、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合影。

如你做了这些，你就给了他以社会的权利；这样，他就愿意为社会和给予他们权利的党二者而战。附和或者选举另外任何人与另外任何党，对于他将视为可笑的了。

这种共产党的民主领导，是否可能在战后，在那政治可能腐败的大城市里以及有着完整组织的、富裕的、善辩的反

对党派的地方实现，还得等将来决定。共产党觉得，如果一切阶级里的成人都能有选举权，那么，党就能够掌握群众；因此，民主便确实地成为中国本身、共产党和群众三者同时发展的最好的媒介了。

共产党所宣布的对美国的友谊，现在是真诚的，而如果他们的友谊能够得到相同的友谊的话，可能成为一种长久的友谊。抗日战争是如此的艰苦，使共产主义者成了民族主义者；而同时，日本的任何敌人，都变成了他们的知心好友。作为日本主要敌人的美国，是他们的朋友，他们更觉得美国能够在产生和平与将来中国有秩序的发展中有最大的帮助。他们说中国经历战争太多了，这是真的，自 1911 年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在流血、破坏和死亡之中。人民是够受了。

中国共产党由经验中获得理论，从其早年的斗争时起，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程了。现在，为将来的中国，它需要美国的友谊，比需要其他单独的、有条件的、强国的友谊更多。虽然，它需要这种友谊，却不像一个乞丐求乞，而是如一个朋友在进行一个共同的事业中求援。无论有没有这种友谊，他们的抗日战争必将继续胜利而后已。……

《新华日报》1945 年 5 月 14 日

论英美的民主精神

昨前两天有两件新闻一定会引起我们中国人民的兴趣和重视，也值得我们借鉴和研究。一件是昨天见报的王云五先生[①]访英回国后关于《实施宪政先决条件》的演讲中对英国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加以阐扬；一件是读见报的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关于言论自由的声明，他反驳了纽约州长杜威百分之百的误解之后，郑重表示“有生以来，不仅倡导言论自由，而且为着这个目标而斗争。”

王云五先生说，英国宪政基础的巩固，原因有三，一是地方有自治权力，“英国的城市自治远在实施宪政前，在撒克逊时代，伦敦已具有一种独立的地位，迄于今日”。这说明了民主国家的民主基础是自下而上的，是由人民有权参与政事然后巩固起来的。因此可知，离开人民的民权，不从下做起，是不能造出巩固的宪政基础的；若反其道而行之，至多也不过是造些空中楼阁而已。

① 王云五（1888～1979）生于上海。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1949年赴台湾。编著有《万有文库》、《四角号码检字法》、《王云五大辞典》等。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他讲的第二第三两点。这两点把民主政治的两大基本要素——自由与平等的含义说得很明白。关于"平等"，他说："一则武断的权力绝对不允许存在。换言之，即人民非依法定手续、经普通法院的审判后，不得受罚。二则……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政府官吏，无论以私人资格或执行公务之资格，苟有违法越权的行为，将一律与人民受同样的普通法院之管辖，与同样的普通法律所制裁。"

关于"自由"，王云五先生说："人民的基本自由极受尊重。英国人的普遍见解，以为民治的宪政能否达到目的，在乎人民之是否有权选举其欲选举之人以组织政府，并得以和平手段变更其所反对的政府。然欲达上述之目的，则人民须能自由批评其政府，自由集会讨论政治，并能避免政府的非法逮捕与拘禁。因此他们视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为宪政上人民必要的基本自由。没有这些自由，民治的宪政是不能成功的。"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如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演讲）

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我们从国

父孙中山先生的话中可以更清楚了解，如果英美人人在法律之前没有平等，若是与王云五先生所说英国人民的见解相反，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的人民缺乏了平等和自由权利，所以永远不能成为民主国家。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

除掉德日等法西斯国家的反民主的侵略者之外，我们想今天整个世界的人们对英美民主政治这两大精华——人民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是不会仇视的，是要赞扬的！这是人类共同的宝贝。若从世界正义人类的地位来说，我们所求的只有希望这些平等自由更加充实些，更加宽广些，应该决没有一个人会把这些精华连根毁損而加以唾弃的。

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华莱士先生的伟论：中国人民早就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准备

华莱士副总统到重庆，今天是第五天。这去几天里，他发表了三次演说，一次和中外记者谈话。他的言论，有其一贯的精神：坚决消灭法西斯，国际国内的民主主义，对中国人民尤其有莫大的信心，并寄予莫大的希望。

他对中国人民吃苦耐劳，英勇刚毅，坚持抗战，真是赞扬不止的。他也曾叫学生是未来的主人翁，他又说学生“都是对国家有贡献能力的人……这伟大的力量，用去打击和消灭法西斯……法西斯是人类的祸根！法西斯不能铲草除根，人类是没有和平幸福的”。他认为胜利和平，安定幸福，决定于科学和民主。这又“实以教育理工方面之专门训练，及民主主义之自治为最善方法”。有人说中国人民还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准备，他却认为中国人民早就有了这个准备了。他更强调地说，自由和容忍的精神的教育，对民主政治是很重要的。

华莱士副总统说这些话，我们确信决不是“捧场”，这正是既赋有美国传统的民主精神，又深刻了解“人民的世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达重庆访问，白崇禧等国民党军政要人前往机场迎接。在与华莱士的会谈中蒋介石婉拒了美国政府关于政治改革的建议。

纪”的意义和中国人民实际情况的政治家的衷心话。

这是“人民的世纪”，这是人民的战争，看到并信任人民的人们，都会得出同一的结论。听到了华莱士副总统的话，能使人更深刻地懂得罗斯福总统年初致国会咨文中所说的扩大民主的含义，和华莱士副总统常常说到的新民主政治的意义。

中国人民处在“人民的世纪”和人民的战争中，听到了华莱士副总统对中国人民和前途富有信心的话，我们应该怎样更提高自信心和责任心，应该怎样加倍努力呢？

华莱士副总统说，美国援华物资已有增加；而且，在滇缅路打通之后，会增加得更多。这是值得兴奋的事。我们希望这些援助能够达到前线敌后的一切抗战部队。同时，我们也完全同意他说的一句直率话，不管美国运多少物资来，也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危机。我们相信这句话只有像华莱士副总统这样了解中国、对中国人民有信心的政治家，才能这样坦白地说出来。这句话决不是表示美国不愿意帮助中国解决经济困难，更不表示中国经济困难没法解决，而只是说中国有力量解决这种问题，这种力量在中国国内，在中国人民。其实，对经济问题如此，对所有的一切问题也莫不如此。

我们听到华莱士副总统的一番话，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美国全国团结得那样好，为什么艾森豪威尔将军统率的盟军能在法北胜利；为什么尼米兹海军上将统率的海军，最近又能在塞班、在马里亚纳和菲岛之间，获得海陆空三方面的大胜；为什么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能够在西南太平洋一天天进展；为什么史迪威将军在缅北，陈纳德将军在中国上空能够发挥这样大的陆空威力；为什么美国成了民主国的兵工厂。我们得到的唯一回答，就是民主，扩大民主。华莱士副总统此行固然是为了收集情报，供给罗斯福总统，我们却不能放过机会，从他那里获取可供借镜的东西。中美两国人民同在“人民的世纪”，同在反法西斯的人民战争中并肩作战，应该像兄弟姐妹般的相互勉励，相互规劝，相互学习，携手向着民主、更民主的胜利大道走去！

《新华日报》社论 1944 年 6 月 24 日

美国国庆日

——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

今天是美国国庆日。1776年7月4日，美国人民在华盛顿、杰斐逊等民主主义伟大先驱的领导下，宣布了民族的独立。美国的独立是处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它不但代表美国的民族利益，而且代表美国的民主利益，代表美国要求自由的多数人民而与美国当时的保皇党——大地主、大商人、职业宗教家的集团相对立。这样，领导独立战争的华盛顿就不但完成了民族的任务，同时还完成了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任务，而被选举为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个大总统了。同样，杰斐逊总统，不但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时也是消灭大地主法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输人奴隶和限制奴隶法案的起草者。这个事实，就说明了美国独立运动的丰富历史内容，也就说明了美国为什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而且直到今天，也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

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的。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美国的独立不是唾手而得，是在8年的对外战争与更长期的对内斗争中完成的。列宁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民主派领袖杰斐逊和杰克逊，美国民主党的这两个创造者，在他们斗争中甚至被他们的政敌指为“共产主义者”和“赤化分子”。美国穷木工的儿子林肯，他所领导的黑奴解放战争被马克思称为“开始了劳动阶级兴起的新时期”。而在实际上，他与马克思所领导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也是合作的，他曾委任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担任他的军官。这样，他就更有理由被当时的反动派指为“共产主义”和“赤化分子”了，以至最后这些顽固分子竟然暗杀了他。

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不但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独立战争和黑奴解放战争中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在20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也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毫无疑问的，今天美国以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为首的进步政治家和将领，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尽人皆知，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在国际关系上是竭力主张迅速开辟第二战场，坚决打击希特勒和日本军阀，联合苏联、援助中国，要求中国团结民主，把大西洋宪章的自由民主原则推行于全世界的；在国内关系上是竭力主张改善工人生活、保障工人与士兵权利、反对大资本家的垄断的。因些，和他们的先驱者一样，他们也受到国内的反动派、孤立派、顽固派及其国际应声虫所攻击。但是也因此，他们却得到了美国从开明资产阶级直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合作，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



1943年春节，毛泽东与延安秧歌队员在一起。

当然，今天的时代异于华盛顿、林肯的时代，但是恰是这一点，格外加重了美国民主主义的意义和使命。如果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的主要事业是确立民主的美国，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国内；那么，今天的美国虽然在国内仍然需要进行极严重的斗争，这些斗争却是和国际的斗争不可须臾分离的——美国已经成了世界的美国。在这一次全人类的英勇战斗中，美国在作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上，在作为第二战场的主要担负者和太平洋战争的最大担负者上，已经建立了不朽的伟绩。而在战后，为了确保世界的和平和民主化，美国显然也将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是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政策，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在庆祝美国国庆日的今天，深望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的这个外交路线，能够成为美国长期的领导路线。

今天中国为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斗争，正和1776年的美国一样，中国的战斗民主派的已故领袖，就是美国人民所熟悉的孙中山先生，他的著名的口号就是林肯的口号：民有、民治、民享。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国民党今天的一部分统治人士竟十分厌恶这个口号，如同他们在抗日战争的事业上怠工一样，他们直到美国民主共和国出现的168年后，还拒绝实行民主制度，并且学着希特勒的腔调，指斥这是已经落伍了的“18世纪的学说”。他们的民族理论也是希特勒式的，他们否认中国各民族的存在，按照他们的

术语，美国不但是英国的一个“宗族”，简直也可以是德国的一个“宗族”。这些都使中国各阶层、各民族的团结受到严重的妨害。这种情况，使中国的“独立战争”，遇到远过于美国的困难。美国的独立战争在第八年上胜利了，而今天的中国，虽然得到了美国宝贵的援助，却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反对民主，在抗战第八年的前夜还失去了几乎整个河南和大半个湖南，并且更大的危机还在前面，但是我们决不悲观。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与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过去的工作一样，与罗斯福、华莱士现在的工作一样，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我们一定能团结中国一切抗日与民主的力量，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社论

东西不同论（二则）

渥太华杂志说："英国人民对于反对党的讨论、辩论和评论，非常重视，所以由国库拨款成立反对党，使之评论政府。"

看了这消息不免使人大吃了一惊。理由不辨自明：让人民来评论，这种办法是不合于我们东方人的文化习惯的。东西文化的不同之点，恐怕这倒是一例。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25日短评

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闻：据说美国在马绍尔战场协助土人实行民主，让他们自己选举行政官。

这是很平凡的事：从民主的美国来说，正应当如此。

这也是不平凡的事：从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国家来看，觉得新奇，觉得刺耳，觉得不平凡。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3日短评

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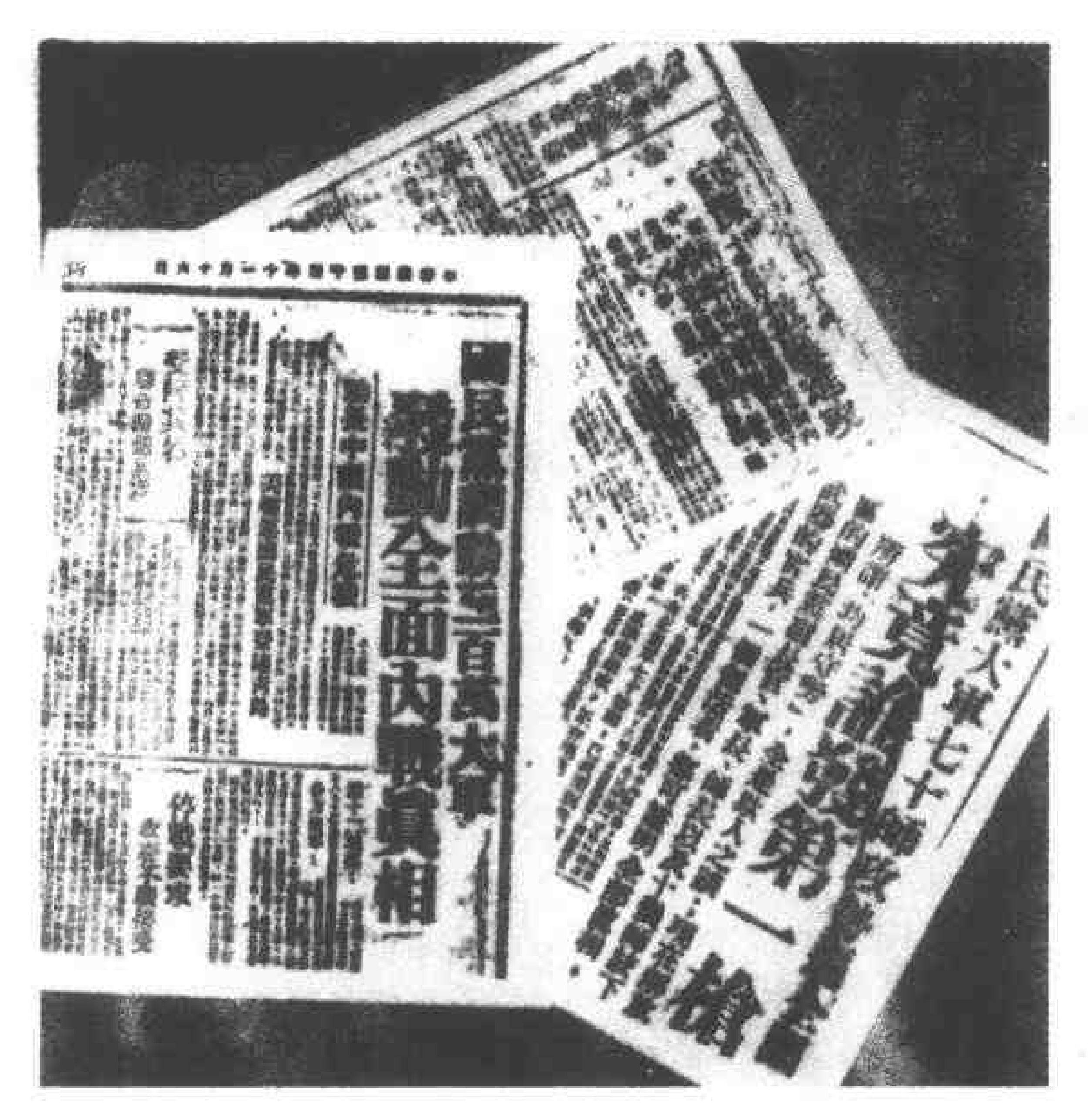
让思想冲破牢笼

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陆定一

一位新民报记者问我："有人以为，中国记者不如英美记者，你的意见如何?"我回答说："我不以为然。中国记者是并不逊于别国记者的。英美记者固然有他们的长处，但是中国记者，能在重重压迫之下把人民所要知道的真实消息透露给人民，这种经验，这种本领，则远非英美记者所能及。比如一棵树，生在平坦的地上，长得很高很直，是容易的，如果在石头缝里弯弯曲曲生长起来，虽然样子矮小，却确是不容易。"我这里所说的中国记者，是指大后方的大多数记者而言的。

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


发动全面内战真相

《新华日报》抨击国民党的文章

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湖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

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



重庆市儿童在街头义卖《新华日报》，向前线将士献金。

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

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叫他们“小心！小心！”就是这种手段的举例。

记者是应该“小心”的。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服务，当然应该自觉的“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

在抗日战争中，人民是谁？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开明士绅，以及一切爱国分子。他们就是国家民族的真正主人。专制主义者，则压迫人民、剥削人民，使人民求生无路。

《新华日报》八年的历史，是一篇辛酸苦辣的历史。这些说不尽道不完的辛酸苦辣，是有代价的，是有重大代价的。《新华日报》是人民的报纸的典型，他所受的压迫因而是一切压迫形式的最集中的形式。但是，他也受到人民的爱戴，而且是最大的爱戴。

八年过去了。今后怎样办？

这样办：（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力求真实，丝毫不苟。

我希望《新华日报》这样做，希望大后方一切为民主而奋斗的记者这样做，并且希望给《新华日报》以经常的指教批评，使它日益完善。我希望慢慢地在新闻界里创造出一种

新的作风，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力求真实的作风。以此作风，来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创刊八周年纪念文章

沙漠化的愿望

田家英[①]

法兰西灭亡以后，我们曾读到I·爱伦堡的几篇通讯。去年《文摘》译载过《法国怎样灭亡的》，其中有一段记述着战后法国文化统制的情形：国际作家协会会刊《和平与自由》被禁止了；龚古尔文学奖金、法兰西学院奖金由于作品缺乏而停止审评；报章文艺副刊均明令取消；书店多停了业，剩下的只能出几册《历史》之类的东西；“法国统治者正在努力把喧嚣化为喑哑，把文化的原野化为沙漠……”。这末后两句，真说着了历来统治者在文化上的“能”“干”。圣君之治“非以明民，将以愚民”的信条，看来中外的英雄都是恪守着的了。最适于被牵着鼻子，任人指定谁是他的友敌，导引该走去的方向，是必须使下民们存在于愚顽无知、浑浑沌沌之中，而这也就必须消灭一切新的声音，统制，文化上的沙漠化。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几年来努力实现着的“沙漠化”的

① 田家英（1922～1966）成都人，时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员。从1948年起任毛泽东秘书。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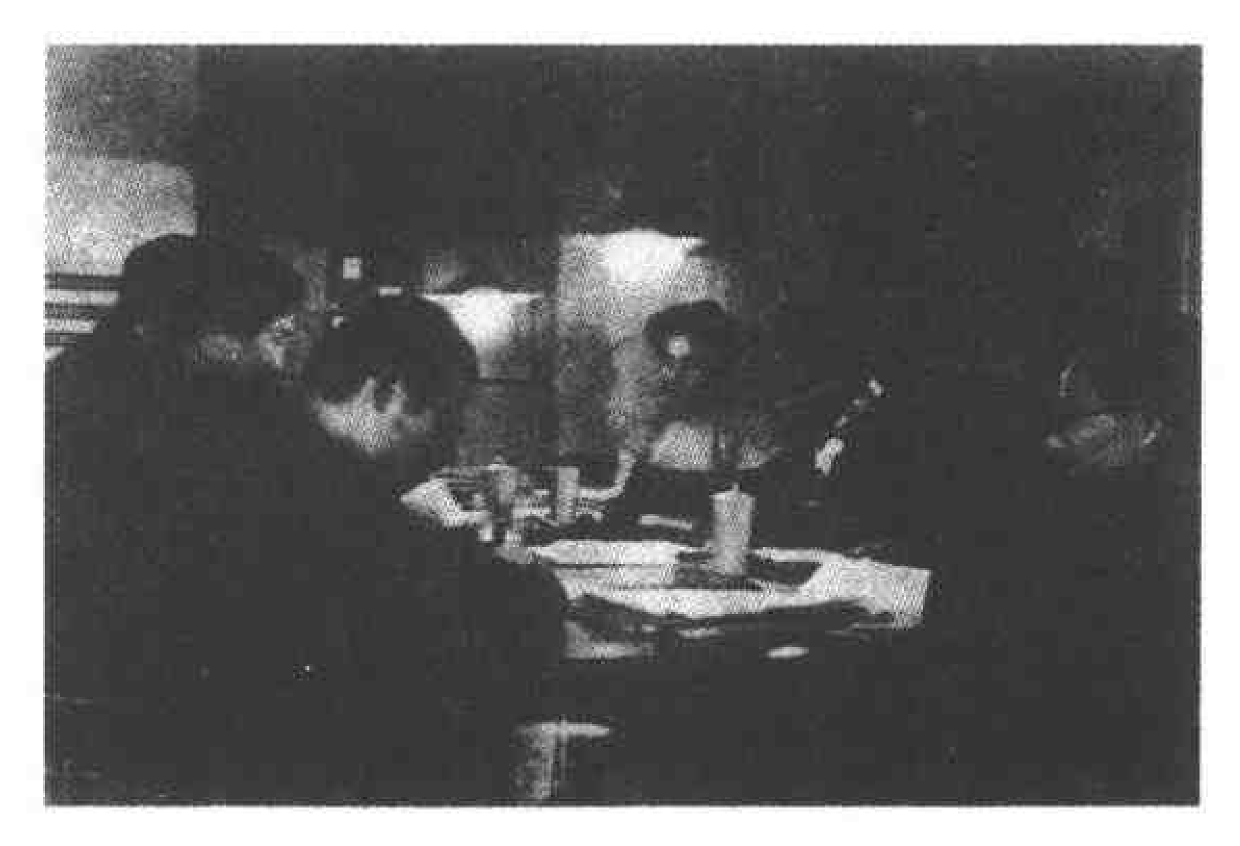
愿望，也已经有了它的政绩。今年1月8号的《新蜀报》，记载着重庆书业的情形：

> ……新书店除了二三家仍保持着原来的形象之外，其余的都改变了面目，原是充满了有关于抗战的读物的书架，而今却都是《家》、《春》、《恋爱三部曲》、《胡适文存》等战前的文学作品，除此以外，次多的要数侦探小说、恐怖小说了，明显地含着抗战意义的刊物或成本的书籍，则寥寥无几……
>
> 至于旧书店……主要的生意是在租书，出租的旧书……百分之九十是《天雨花》、《施公案》、《七侠五义》等等旧小说……（志渊：《文化的堕落性》）

陪都如此，其他地方可以想见的了。荒凉，冷落，这说明大后方的文化界还剩了些什么。

不过，中国的官家比之法国，却也有些不同，不那样直率，讲方式，多奇谋，所以同样是沙漠化的愿望，同一是焚图书，禁刊物，封书店，逼作者，但我们这里就还有许多排场，言行也极其堂皇而且公正。去年叫过“建设文化”，宣布要改善作家生活。虽然提高了稿费，而被圈定的作者的文字，则根本没有写处；加给小学教员几元津贴，偏要说得和人类文化前进如何有关。拆穿看来，这终于不免是一场笑话。

也还有移尸诈骗的方法。对于文化荒凉，我们还不时能够听到一点“愤愤不平”的声音。譬如去年《中央日报副刊》上，就有一位青年出来，据说：“国家养‘士’，而‘士’何曾对得住国家？……战前作家们叫过‘国防文学’，民族战争，抗战后那里去了……唉，哀莫大于心死！”这真令人拍案叫绝的。仇头落地而手套不污，绞杀了文化，还做



1942年，中共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整风学习。

稳扶持文化的正人君子。而那些被迫放下笔杆的文人，则在一顿奚落、几声感叹里，注定成了“心死”的候补者。

但奚落的对象，仍然是有畛域的，被嘲者只是虫沙的小人，一般如猿鹤的君子，还做定可以飞也可以走的高士。到今天我们就还有不少指定必读的刊物，还出现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的名字。这些人之成为名流，并非有文，大多是因为开会。文协有他，文化界动员大会有他，一切文化活动莫不有他。人们也就不能不公认此文人也，实则多是挂了招牌，并无货色，不过出卖人头的探子而已。当然也有几个能文的贵人，更有些成名作家，也不时发一点匡时之论。这是一种偷进花园和小姐相会的，化为小生的丑角儿，往往令人看不清楚，但明明咬人，偏装接吻，看久了，不过使人连真接吻也厌恶罢了。此外，那些说今天是“战国时代”，写着艺术崇

高的“永生作品的雅士”们，也都还是自由的，因为他们的作品是谈“梦的现象”，既不包藏政治阴谋，也无关于世道人心。偏左偏右，也有不偏不倚，都是穿起袈裟，俨然教主，其实是连毛孔里都满藏毒箭，正在向凌迟之际而尚未气绝的人放射过去。

自然不易射死，于是还需要哗啦一番。种种专事造谣的小报期刊，去年出得不少，或曰“崇苏”；或曰奴化；或算死人鲁迅的陈年老帐；或骂今人逃避群集香港。其中最坦白的，要推去年八月《文化新闻》的一篇《周末闲谈》。作者说：“提起那些自命为‘前进’的文人，就使我们咬定牙根。”从这些中间真使我们听到了切齿的声音。

然而，咬牙并非解决问题。“自命为‘前进’的文人”还拥有大量读者，压迫到不能用笔，也还是留着一张空白，所以用更多的文章，以代被禁止的刊物，这是最急迫的事情。去年10月16日的《商务日报》上就发表过《筹设中国文化银行计划书》，说是要“放款”了，只要来是不愁丰衣足食的，但以后就不再听到了下落。这是很自然的，箪食壶浆弗得即死，而“嗟来”与之犹且不受，何况恩威并济，盛气凌人，去领受的倒多是希求不劳而获的寒士。证据是：去年“文化奖助金”据称已经发了，但我们至今没有读到受奖者的文字。

更糟糕的是猎犬的狺狺，并不为看客欢迎。书刊已经不少，指定派订也已经用尽方法。有教授作文，党部推销，照理可以风行天下了吧，但事实并不如此。人语是被抑杀了，而魍魉的嗥嚎也不见得就能够传播开去。

一方面没有了，一方面填不上，文坛的凋萎这就成了必然。有骨气的出版家多停了业，存在的则无书可出，大多是

一再翻印战前的作品。官办的书店挂出招牌要“建立三民主义文学体系”，但就连这一类作品也没有写出来。这使得一种以介绍新书为主的《读书通讯》，到今年就不能不变为谈英语、论诗词的刊物。因为文坛干净到几乎一本新书都没有了，无从评起。

这真是沉重的沙……

但却绝不是打平了天下。不幸的是，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去年《民意》上就有人以秦始皇自居，然而即使始皇再世又有什么办法呢？坑不尽焚不绝的是大众的愿望。曾经被“战国”派教授们赞赏过的“下之所以刺上”的“诗”，不就是“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可以焚毁士大夫之作，人民的创造却无法格杀，这是连秦始皇也头痛的事，何况以之自居的人。至今，中国就还有用结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抗战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为大量青年所爱戴，这些作品在迫禁下面，从吞吐含蓄中而传达着中国人民正如何受难、如何挣扎、又如何成长——这就是反沙漠化的愿望。

尽管迫害，尽管凌虐，新文化仍在走向远大的去路。我们还有热爱，则热爱就付予反沙漠化的愿望的实现，而疾视屠杀文化的政策，以及躲藏在屠伯刀斧之下，啃着人骨的明枪暗箭的奴子。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

潘梓年[1]

关于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近来各方人士颇多论列。一般的讲，大家认为学术思想应当自由，大都认为这种自由是民主国家重要表征之一。间或也有提出不同的论调的，但已甚少从正面来加以反对，他们只能从侧面来反对，说这种自由不能是绝对的，总或多或少地应当加以某些限制。这也可以说是时代潮流所趋，没有人能够过分违逆它。

我们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须弄清楚一点，就是这个问题要从政治上来提出，来讨论；要把它当做具体问题来处理，不能把它当做抽象的东西看。就是说，主张学术思想应有自由，是说学术思想不应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应当让它循着自身的规律去展开，去发展，不是说学术思想应像野马行云那样，漫无规律地乱闯乱撞。例如有些反对思想自由的人说：若思想绝无规矩准绳的限制，就是思想的自杀，

① 潘梓年（1893－1972），江苏宜兴人，时任《新华日报》社社长。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

说，某一种限制也可以促进思想的发展。他问：思想若不受逻辑的限制，则不合逻辑的思想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若不受道德的限制，则不道德的思想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若不受国家民族利益的限制，则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是我们所需要的吗？等等。这种反对论就是有意把问题弄混乱了，好来混水摸鱼，就是先把别人所提的具体问题拖到玄虚之中去，再对它鞭打一阵的办法。目前主张思想自由的人，谁也不会认为不合逻辑的思想也是好的，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也是好的，不道德的思想也是好的。他们只是认为，某一思想的合不合逻辑，是不是不道德，是否危害到国家民族的利益，学术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规律，应让学术思想自己来解决，不应由外力来干涉，由政治力量从外面来加以干涉。就拿逻辑来讲吧，没有了逻辑或不合逻辑的思想，它自身就站立不住，如果有人硬要提出这种思想来，也不能为思想界容忍而要受到唾弃，更不要说这种思想能否算是一种学术了。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更要引起思想界的愤怒，一经发现，大家就要起来加以猛烈的攻击。试问目前有人敢把汪逆精卫之流妥协投降的思想，破坏团结的思想，主张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思想推荐到大后方来吗？果然有人这样来推荐的话，思想界有不立刻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的吗？道德不道德的问题更是如此。在抗战建国时期，妥协投降的思想就是最不道德的思想，破坏团结的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一心想着发点国难财的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这些思想，尽管会在有些人的脑子内萦回奔腾，却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提到论坛上来；尽管会有些人不声不响地，遮遮掩掩地在那样做，却没有人敢于公然提出那样的主张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思想界断然不会容许这种思想出头露面的缘故。所以我们

说，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规律。主张思想自由的人，是认为思想的是非曲直，应让它在自由发展中自己来解决，不要用政治力量从外面来加以干涉，而不是抽象地来主张思想自由，把思想当做漫无规律的东西。这一点，是谈思想自由问题时，首先就要弄清楚的。

进一步来讨论，所以要主张思想自由，正是为的要来加强思想自身的规律，要让这个规律在思想的自由开展、自由发展之中壮健起来，坚强起来。思想愈能自由，它的是非曲直，愈能明晰而周密。譬如，上述那种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不道德的思想，敢于公然提到论坛上来的固然不会有，但很可能穿着伪装来出现，或弯弯曲曲来偷运，或强词夺理地来武断，或甚至凭借某种优越的势位来欺凌。遇有这样的情形时，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就自然会有人出来加以剖析、揭露、勾微、发隐，使它须眉毕现，无所形遁；或群起而攻，使它恃强难逞。否则赵高指鹿为马，也无人敢加指斥，那就连是非曲直也不会有，还讲什么道德，讲什么国家民族的利益呢？至于逻辑，更要明显，真理因愈辩面愈明，逻辑也就是思想愈自由面愈臻完密。思想的规律是蕴藏于思想自身，正如身体的康强蕴藏于身体自身一样。要求得身体的康强，必须首先解除有碍于身体的自由生长的一切束缚如束胸、裹足等等。要求得思想规律的壮健与坚强，必须首先解脱障碍思想自由发展的一切束缚如政治力量的干涉等等。

从这一点上来看，目前民主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这个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可以说就是要来把人类的思想自由从法西斯的瘟疫中拯救出来，民主国家所以不惜抛掷这样巨大的生命财产来扑灭法西斯恶魔，因为它是人类思想自由最凶狠的死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关于这一层，蒙巴顿将军就

曾指点得异常明确，他说："我们的敌人法西斯，当它走上政治舞台时，首先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所以照他说来，我们再也不能做这样的蠢事，一方面在用战争来反对法西斯，另一方面却又以为不能让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他这样说话的确是非常明智的，却也是非常平凡的。我们所以对法西斯誓不两立，所以对于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生死以之，对这战争看做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是因为法西斯侵略者要侵占我领土，掠夺我财产，奴役我人民，荼毒我生灵，而且也是因为它还要剥夺我自由，窒息我思想，破灭我文化，毁坏我文明。那么，一方面在用战争来反对法西斯，另一方面却以为不能让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那不是再愚蠢也没有的事吗？

也有人这样说，思想自由是要有的，但在战时又当别论，因为战争须要力量集中，从而须要意志集中，从而须要思想集中，从而思想就不能讲自由。这种说法，真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在这一问题上，美副总统华莱士曾提供我们一个很贤明的意见。他在上月 22 日中美文化协会成立五周年时向中国广播，其中有一段说："中国和美国在战时必须努力保存每一公民尽力贡献于时代学术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权利。实现法律下的个人自由、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诸大原则。中美人民以独裁者的行为为殷鉴，都知道我们如果在战斗过程中失去个人自由，那么，决没有战胜法西斯主义可言；如果富于创造才能的人士，没有提供其批评的思想以及谋我共同福利的良法，那么，也没有建设新世界的可能。"华莱士这话还说得不明白吗？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不但没有战后建设新世界的可能，而且就连目前的反法西斯战争也没有胜利可言。

华莱士这一段话，在有些人听来，也许要以为不过是那么说说而已，事实上并不见得是如此．那么就请看看事实吧。试问我们到底凭什么来和法西斯强盗作战呢？我们凭什么能够确信自己的反法西斯战争一定能够胜利呢？靠武器精良，兵力雄厚，军事工业发达吗？是的，这一些自然在必要条件之中的。但是，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初，这些条件远比敌人差，为什么我们竟敢接受敌人的挑战，而且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呢？就是到了现在，我们在这些条件上仍然还是劣势，为什么我们的胜利信心仍然还是屹立不摇？苏联在这些条件上，至少在对德抗战之初并不见得比德国为优，为什么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人士一致相信苏联必胜，而且现在苏联确已大捷频传，快把敌人完全逐出国境了呢？没有别的，这里有一个关健，就是民主，苏联的人民向来保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等的民主权利。民主国家所以要用战争来反对法西斯统治的理由在此。法西斯国家必败，民主国家必胜的根据也就在此。

国家的战斗力是要从人民身上获得的。只有广大的人民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时，国家才算是真正有了力量。否则就算你侥幸取得了大量的机械化部队，高度现代化的军事工业，也终于是枉然。前者的典型例子是苏联，后者的典型例子是希特勒德国。苏联就因为他每一个公民都已有了尽力贡献于时代学术和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权利，都已有了提供其批评的思想以谋共同福利的自由，所以富于创造才能的人士能够泉涌而出，所以能在短短廿余年之中，把贫穷愚昧的帝俄一变而为文化甲天下，富庶近英美的苏联，所以能在抗德战争之中生产突飞猛进，战术精进，兵源泉涌，战士的英勇和牺牲精神与人民的爱国热诚，使全世界都为之惊叹不置。

因此，我们可以明了，华莱士那种说法，确乎完全是从事实中探究出来的真理，丝毫也不是随便说说的。

华莱士所指出的这个真理，对于我们中国，特别值得珍视。我们所需要解决的政治社会问题正多，需要人民尽力贡献于时代学术，需要人民提供其批评的思想正殷，需要富于创造才能的人士正切。不但为了要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亟需要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就是为了要能战胜法西斯日寇，为了要能和同盟诸民主国家并驾齐驱，也同样亟需要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就是为了要在武装、战术、军事工业等等条件上，使我们的对敌劣势有所改进，更是亟需要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思想的自由，决不是和作战不相容，恰恰相反，是大有助于作战能力的提高的。

还有一层，学术思想的自由，不能只是指自然科学来讲，是要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至哲学等一切学术思想来说的。目前一般人士，对自然科学可说已开始重视。不过实际上的重视的还是偏在自然科学的技术方面，对于自然科学理论、科学思想、科学态度等等，还未免重视得很不够，还是让少数自然科学家在四向呼吁。至于社会科学，那就更是有人把它看做不急之需。这实在是莫大的缺陷。这两种科学实是同样的重要，不宜有所偏倚。如果一定要说对目前中国不能不有个轻重缓急的话，那么，社会科学暂时有比自然科学更值得被人重视的理由。因为要求得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为要求得自然科学的发展不致误入歧途，必须首先在各种社会问题上能够找到解决的途径——正确的解决途径，作为基础才行。同样的自然科学，在有些先进国家就发展得迟慢以至于停滞，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就发展得非常之快；同样的自然科学，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发展起来就真正成为国利

民福，在法西斯国家发展起来就适足以祸国殃民；这里的差别，正就在于一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都能正确地解决了，另一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则还没有能够解决，或没有能够正确地解决。社会问题的解决有需乎社会科学做武器。所以，如政治、经济、历史等社会科学，对于目前的中国是迫切需要的。学术思想的自由对社会科学也比对自然科学更为重要。在目前，尤其在中国，在社会科学方面可能引起的争论，要比在自然科学方面可能引起的繁复得多。争论愈多，愈复杂，它所需要的自由发展也就愈大，愈迫切。因为是非是愈争愈分明，真理是愈辩愈深透，这个道理是谁都知道的。

学术思想需要自由，一般的讲，是指一切学术来说的，特殊一点来讲，尤其要指社会科学来说的。

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是把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区别开来的重要特征，也是战胜法西斯日寇建立新中国的必要条件。我们迫切需要有学术思想的自由。

《新华日报》1944 年 3 月 26 日

论学术自由

庄沙音

……

学术自由就是自由研究，自由讨论，不受非法干涉。反对学术自由的人，常把学术自由看做是“随便”说话，是有害民族利益的，是洪水猛兽。这还了得？然而这是最俗流的看法，不值一驳。学术自由是有益国家民族的，特别是对于现在的中国。欧美民主国家的学者也一向是维护学术自由的，他们的这种斗争是和反法西斯的战争相互联系着的。

只有在法西斯的国家才会把学术自由当做是洪水猛兽！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攫得政权以后，首先便焚毁了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图书。仅在柏林一地，就消灭了一万担科学书籍和古典文艺书籍。一切知名的学者，非遭放逐，即遭屠杀。过去的德国在科学上曾经有过很大的贡献，现在却只剩下了一辈假借“遗传学”、“优生学”、“人种改良学”的伪科学家。从此，德国便陷人反科学的黑暗时代。

我们反法西斯战争，在文化的意义上，就是要维护学术自由，反对摧残人类的精神遗产——文化。

中国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国家，中国需要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奠基石之一。民主政治有极丰富的内容，如选举，如黜官，如结社，如演讲。而学术自由就是民主精神与民主习惯中的最要紧的东西。我已经读过张申府先生的《友声与民主》，他说："我很相信，民主至少有两方面，一是民主政治或民主制度，一是民主习惯或民主精神。一狭一广。二者当然相关，是互相制约、互为因果的。没有民主政治，民主习惯大概不能普遍；没有民主精神，民主制度更恐不易实现。因此，才特别需要今日要求民主者，最好先就自身或自己团体尽可能地培养些民主精神，养成些民主习惯，以开创风气，以为天下先，以为后世训"（《新华日报》1942 年 9 月 27 日）。这话我完全同意。我还要说：在大学里提倡学术自由，就是为了培养民主精神或民主习惯，而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民主政治或民主精神。

干涉学术自由是不当的。自古以来，凡能提倡自由的时代，其学术必能昌盛。周秦时代学术最发达；到宋朝，私人讲学之风甚盛，天下学子，闻风景从。到了清初，乾嘉诸老不闻政治，于是脱离现实，专门从事古代经典之训释与考证；自由讲学风气，不复得见。

民初的北京大学，是由蔡孑民先生主持的。其时提倡学术自由，蔚为风气，影响全国，收效后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而近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发育在此了"。有这种精神，文化才能发展、国家才能进步。

我们再说说外国的情形。譬如英国的牛津大学，一向以

古老著称，学生教授还穿着中世纪僧侣式的黑袍，并且还保持了许多过时的习俗与环境。然而牛津当局对于学生的求学，却是采取极端放任主义的。几年前曾来中国的世界学联代表之一，英人傅路德先生，是牛津的毕业生。他曾对我说："牛津的风气已经变了，什么思想都有，什么政派都有，大家可以自由竞争，但绝不超越一定的范围。"这是很好的。牛津绝没有一道一道的政府法令，政府也不把学生当做政争的工具，教授更不问学生的党派。提倡教育独立，这才是真正的学术自由。

欧美民主国家尚且如此，我们中国是要超越欧美的民主政治的。国父考察了欧美民主政治以后，认为还有很多缺点，所以才创造了国父的民权主义。那么，在中国，要有更大限度的学术自由，是绝对应该的。

……

《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1日

论“天真无邪”

李 普

有人这样说：“据说苍颉造字之日，‘天雨粟，鬼夜哭’。这就是有了文字，人民生活有保障了，一切罪恶都战栗了。”苍颉的情形究竟如何，我们暂且不去管它。单说现在吧。中国人最相信语言文字的力量，这倒是确确实实的；否则，不会有人这样害怕。

但是，据说“仍有理由相信中国是最自由国家之一”。这句话却很费解，幸而随即就发现了有一位先生的一篇大文，给了一个具体的例证

据说，有一个军营，“他们的言论是很自由的”。何以见得呢？“在壁报上，他们和军官开玩笑，互相开玩笑，也批评政府。然都是天真无邪的”。——好了，秘密就在这里。

“天真无邪”是好字眼，年纪大的人常用这几个字来称赞无知的青年男女，但如果用于朋友之间，或同事之间，就带了开玩笑的意思，很不敬。年轻人对于长者，下属对于上司，那就更不能用。有哪一个奴才敢对他的主子说“你的言论是天真无邪的”吗？没有，没有这样大胆的奴才。由此可

见，这四个字和“言论自由”或“批评政府”之类连在一起，那意思就是：“天真”者幼稚也，“无邪”者于我无损也。惟其幼稚，所以于我无碍，那么你说吧，我给你这个自由。

这位先生恐怕我们不相信，特地从那些壁报上引述了一段小文章，以资证明。文曰：

“某排士兵夜晚睡觉，其脚臭气熏天。连床者问曰：为何老不洗脚？答道：上面命令三月一洗，现在不到三月，如何可以洗脚？”

事实上上面并没有这种命令，用这位先生的话来说，“这是对军营命令服从之类的轻微嘲讽，并非真正三月一洗脚。”于是某先生赞曰：“然而这也是标准的幽默，因为这是天真的、健康而有人情味的笑，不是阴森的冷嘲。”——批评政府要轻微嘲讽，要标准的幽默，标准幽默要天真无邪，天真无邪者何？曰，我的一毫一发都不准碰；要谈，就轻微谈谈我的某排士兵的臭脚丫！

呜呼，这真是“最自由国家之一”！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

何思敬

有两种出版法：一、保障以及发扬文明之出版法；二、摧残以及毁灭文明之出版法。我们中国需要哪一种？我们中国要不要走上文明国之大道，与其他文明国一起，在世界舞台上并驾齐驱？

文明国之道路就在于使人民的才智有发展之可能和自由的机会。出版是文明的指标，但文明国决不以其政府出版物而自豪。文明国常以民间出版事业之兴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物的品质之优良、种数与数量之众多而自豪。英国如此，美国如此，法国如此，苏联——真正人民的国家——尤其是人民自由出版之最高型。文明国在宪法中不仅保证人民思想、信仰、言论、出版之自由，而且明文宣告放弃检查制度或禁止采用检查制度……

出版法——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书，其任务在保障民间的出版事业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间的出版事业成为自由的事业，成为人民的自由的机关之一，成为文明的[illegible]



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是抗战时期国统区著名的进步书店，在各地设有50余处分支店，出版、经销各类进步期刊。

人类有了文字、纸张、书籍、印刷机、照相术、电报、电影以及各种电传技术等文化财产以来，全靠大多数人民能够自由使用，这批文化财产或印刷文明才算得到了最正当的使用，有了正当发展的机会。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近代文明的道路就是要建设一个进步的、民主的、幸福的、丰富的、持久和平的世界；因此，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文明的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起文明的批评之理——而文明批判与自由研究就需要不仅在一个民族内，而且在诸民族间自由的精神交通，人民的自由出版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文明创造的交通机关。

近代文明的创造需要每一个民族都能贡献其精英；所以近代文明的道路必然是民族自由、民族解放的道路，使各国人民的个性才智得到启蒙与解放，得到自由发展，使各国人民都睁开理智的眼睛去注意古今中外，注意外界与内心，注意自然与精神，注意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其他一切。文明的自由出版就是近代文明的这样一条道路。

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反射镜。我们能希望一个出版法站在近代文明之外不保障其发展吗？

《新华日报》1946 年 2 月 18 日专论
原题《出版法之修正》

读书与自由

几天之前我曾接到一封不相识者的来信，无须说明这是一个纯洁的热血青年，他对现在的某些不大开明的学校，很发了一阵感慨（我不敢名之为牢骚），原因是他们的生活越过越难了。青年的路子越过越窄了，吃不饱，穿不暖，居不安、行不便，这且不说，青年人吃点苦原算不得什么。但最苦恼的是：住在学校里没有读书的自由，怀着一腔热血，满心想爱国，希望替国家民族真正做点事情，然而却又无行动的自由，到这里青年们似乎实在失去了最后的忍耐力了。可是现在正是抗战呀，不忍一口气又能怎么样呢？于是乎苦闷，苦闷之余，便觉感慨横生了。

说到这里，似乎应该发点议论了。我很奇怪有些“教育家”们，素以“读书救国”论者自居的，竟不准学生有读书的自由，某某报看不得呀，某某书包含着“危险思想”呀，学生应该坐在教室里老老实实呀，真罗嗦得够呛。试问学生在学校里不能够自由读书，他还来进学校干吗？难道单是晓得了课本上的那点知识就够了吗？学生进学校不是为了来求知的么？不特此也。尤甚于此者，社会科学一类的书籍，固

然不能读；即使连看文艺小说也觉有些“不稳”了。真是白昼见鬼，岂不令人笑掉牙齿！

读书固可贵，自由尤为可贵。我们要自由，更要求青年在学校里有自由读书的自由。难道这是不合理的要求吗（所谓读书，当然要把汉奸书报除外，凡系抗战书报均有自由阅读的权利）？噫欤！今之世，难矣哉！

《新华日报》1940年4月7日

驳“灌输”理论

今天我们都很重视青年，把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前途，都寄托在青年身上。这是不错的。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青年常起着前进运动号手的作用。历史上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充分表现了青年在社会上、政治上的伟大作用。三年来的抗战中，在前线，在后方，在游击区里，青年们更提供了无数舍身为国、英勇奋斗的光荣模范。因此，社会各方面都关心着青年的训练问题，尤其是思想训练问题。就是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把青年们训练成有用之材，使他们将来能担负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责任。

关于这个问题，各方面的意见归纳起来，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信仰往往为求其稳固起见，而不容怀疑，不许批评；又为求其普遍起见，而不容选择，不容规避（《学生之友》)。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这就是说，“我们应给青年的是一个呼吸自由的氛围，不是含有窒息性的氛围；应给他们各种各式的

滋养，使能各按本性去消化吸收；不应拿着某种定型去一孔出气地陶铸”（《大公报》）。前一种主张认为如果没有统制，则青年知识不丰，阅历不够，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后一种主张则以为，思想是活的，不是死的，要启发，要引导，使被训练者自觉地自愿地走上正确道路，否则便不能发生作用。

要正确解决青年思想训练的方法问题，让我们来看一下，对于一种思想从无信仰进到信仰经过怎样的过程，怎样的道路，关于这个问题，近代国际革命运动史以及中国革命运动史，都提出了非常丰富的材料和例证。

一种思想要在民众中取得信仰，一般说来，应当有下列的条件。第一，这思想本身不是死去的公式，而是能够解释各种现象的完整思想系统，青年人面前遇到的难题，有了这种思想，就可迎刃而解。这样青年才会感觉这种思想之可贵。第二，只有抽象的理解还不够，必须让青年参加这种思想所领导的活动。获得自己实践的经验，以从经验中证明这种思想的正确。实践是考验一切真理最重要的尺度。一种思想是不是真理，不凭人口中的话，而要看实践中所表现的客观事实。人们决定对于一种思想相信与否，总是依靠事实和自己的经验的。第三，由不信仰走到信仰，只能经过说服、引导，只能是自觉的、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命令的。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

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略）。青年们如果在思想方面寻不到出路，就要在别的地方来使用青春的热和力了。于是颓废派的诱惑来了。饮食征逐、声色

狗苟，占住了一部分青年的纯洁身心。于是读死书的风气盛行了，“今日埋头读书，明日努力建国”。结果一部分青年和抗日脱了节。于是苦闷了，徘徊了，悲观了，失望了。一部分青年葬埋在愁眉苦眼的低气压之中，这样青年失去了应有的团结和统一，失去了必要的锻炼和修养，一任大好的韶光，空空溜去。这是青年的莫大损失，这是国家民族的莫大损失。

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在现在，在三民主义和团结抗战的思想总方针下，应当让青年们把学习与抗战工作联系起来，使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出革命思想的正确，产生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固不移的信心，锻炼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艰苦耐劳的作风。和民族解放事业不相容的，是汪逆精卫的破坏抗战、妥协投降的思想，帝国主义输入的奴化思想等等。对于这些反动的思想，要实行思想的斗争，使青年们自觉自愿地反对它们，厌弃它们。民族的战士，不是在学校里面，关起大门用一种“定型法”的思想喂养得出来的，而是在复杂的民族解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这正像栋梁之材不是在暖室里长成，而是在风霜雨露之中长成一样。

《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社论

原题：《青年思想训练问题》

奖励自由研究

人类历史上的前进运动，常常和思想自由的开展是分不开的。因为如果思想运动不能自由开展，如果让陈腐的、不合理的独断教义支配着人们的意识，如果不容许人们摆脱既成的、死的、教条的束缚，而依据社会发展之新的要求，来从事自由的研究，那就是等于在现实前面把人们的眼睛蒙上一层黑幕，使他们不可能看清当前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可能辨别什么是应该追求的目的，不可能揭露什么是应该打倒的黑暗势力，因此也就不可能对黑暗势力进行有力的斗争，不可能正确地推动革命运动。不论中外古今，每当革命转变的伟大时代，常常伴随着一个文化上的启蒙运动，开展自由研究的风气，打倒不合时代的因袭权威，剥斥现实中的黑暗事物，启发新的时代所要求的思想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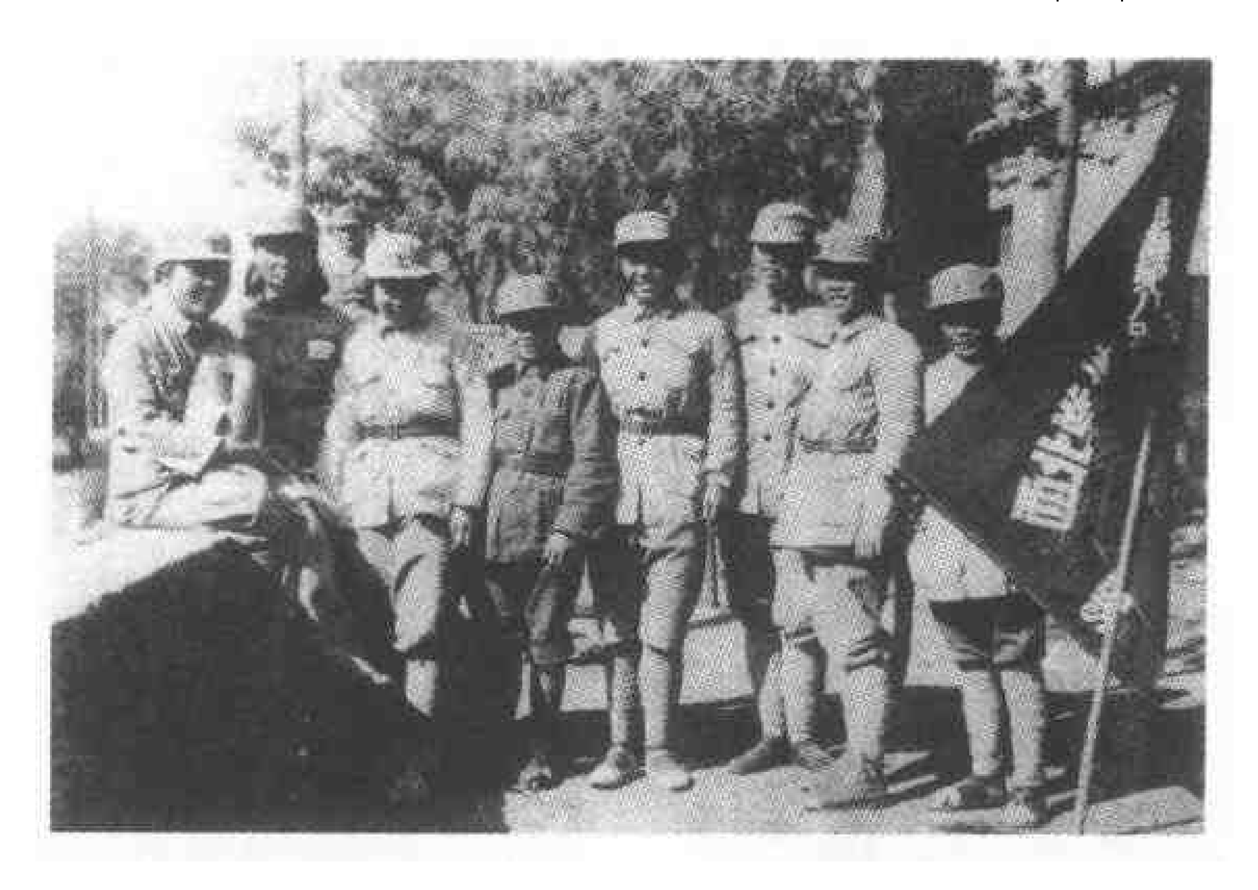
在今天的抗日战争过程里，我们要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革命运动。在这伟大的斗争洪流中，我们需要对于客观现实的各方面的正确知识，作为前进的引路明灯。我们需要关于自己本国的社会历史的知识，也需要关于日本帝国主义

以及世界各国的社会历史知识。在我们决定斗争策略的时候，这一切社会历史方面的知识对我们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也需要关于自然界的各种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在我们进行经济建设以克服长期战争中的物质困难时，也是不可少的。我们还需要各种各样的学术上、理论上的知识，以便从各方面来提高我们的民族意识。但要能掌握这些知识，就必须一方面积极地号召各种专家及知识分子，帮助和鼓励他们从事深刻精密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必须提倡勇于追求真理而不顾忌一切因袭教条的作风，就必须提倡自由独立的研究作风。

抗战初期，全国的文化界曾表现出一时的蓬勃高涨的气象。随着政治的进步，研究、出版、思想、言论的自由，得到了开展的机会。然而不久以后，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策动了投降反共的阴谋，而文化上的倒退反动也就伴随着投降分裂危机的发展，在大后方许多地区抬起头来。一切合理的思想言论遭受禁止，而读经诵古的运动却强迫推行……。

但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在的各抗日根据地区，却一直沿着抗战、团结、进步的路线向前迈进。在政治经济方面，固然有了飞跃的发展。而在文化方面，也同时在不断进步。当着大后方在倒退的情形下，使文化界人士不但不能安于工作，甚至于不能工作的今天，在边区，特别是延安，却聚集了很多的全国有名的艺术家、理论家、科学家，以及大批的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的空气，一天比一天高涨。

中共边区中央局5月1日的施政纲领里，特别明白规定“奖励自由研究”一项。这一项规定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思想言论之自由发展是非常重视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



女作家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是抗战时期的宣传工作主力之一。图为丁玲（左1）和女团员。

思主义的党，共产党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指南；但同时也不否认，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只要他们能认真地进行自己的研究，本着学术的良心来正视现实的问题，他们就能够对于真理的发现有所贡献。中国共产党不但不能轻视，而且非常尊重这些贡献，承认这些贡献对于中国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因此，在边区，不但要大大地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还要团结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工作，帮助和奖励这一切自由研究的活动。

必须把自由研究的风气大大地开展起来，不但在陕甘宁边区要这样，而且在一切抗日民主根据地也要这样，这是新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抗战期间，"鲁艺"师生创作了大批抗战文艺作品，如《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白毛女》等。图为"鲁艺"音乐系部分人员。前排左2为冼星海抱着女儿妮妮。

民主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必须号召全国人士，特别是文化界以及知识分子，起来反对大后方束缚言论思想自由的倒退现象。这是与反对妥协投降分不开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解放日报》1941年6月7日社论

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

——为纪念第十届“九一”记者节而作

今天是第十届记者节。回溯这个节日诞生的历史，这个节日是和全国人民与舆论界争取抗日自由、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分离不开的。“九一八”事变发生，继之以“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激起了汹涌澎湃的全国救亡怒潮；当时各地新闻记者亦都争先恐后，卷人这一怒潮，并纷纷向国民当局要求开放言论自由、停止压制舆论、保障记者抗日权利。至1933年9月1日，国民党当局乃发布了《保护新闻工作人员及维护舆论机关》的命令。在群情迫切要求之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有此表示（虽然在这一命令发布后，国民党当局仍继续压迫和摧残抗日的记者和舆论机关，如史量才的被暗杀、杜重远的被判处徒刑、大众生活等14个抗日刊物的横遭封闭等），这乃是全国抗日人民和舆论界艰苦斗争的初步结果。嗣后“九一”这个日子，便由全国新闻界定为记者节。每年此日，全国新闻记者都要检阅一下自己为抗战服务的战斗力量，以及和全国人民一起，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发扬抗战的和民主的舆论的途径。因此，“九一”不仅

是记者的节日，而且也是全国人民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节日。

在抗战初期，政治比较进步，国民党当局对于舆论界的压制曾一时减轻；各地新闻事业，特别是在武汉，曾呈现了一番蓬勃的气象，对于发扬民意、动员民众，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曾几何时，在武汉失守以后，反共倒退的逆流即随之而来。几年来国民党内反动派钳制舆论、摧残民意的行为，日甚一日。到了现在，大后方舆论界已经奄奄一息，形成了正气消沉、邪气高涨的可痛现象。在今年纪念九一节的时候，我国的新闻事业正经历着空前未有的严重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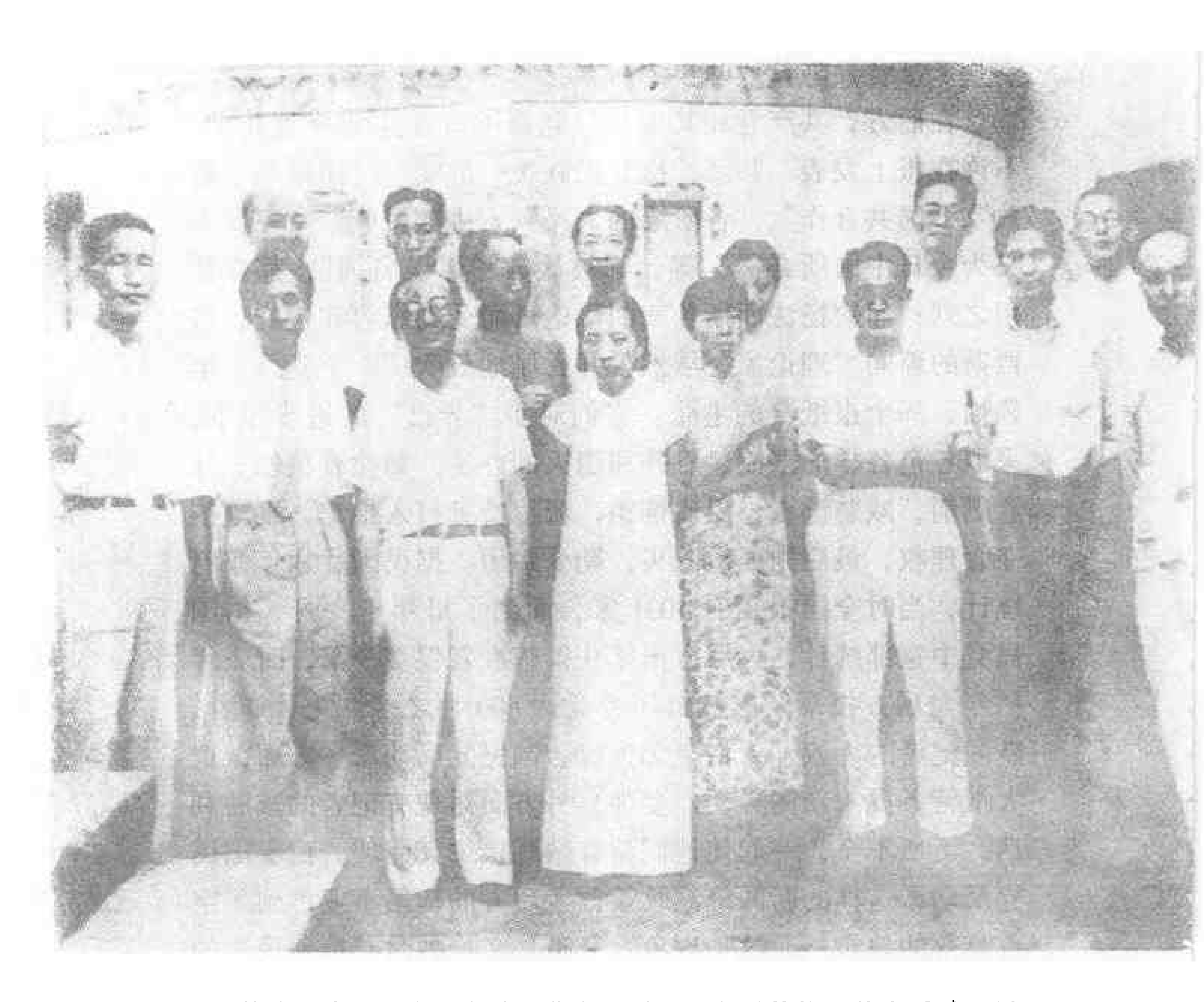
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统制政策，口口声声强调“战时统制”之必要，又把这种统制描写成为“三民主义的新闻政策”。谁都知道，今天的中国是在“战时”，是在抗战的进程中，而抗战正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照国民党的说法，它的新闻统制，似乎应当符合于抗战的利益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然而事实上怎样呢？

孙庞等逆率部投敌，吴逆开先奉日寇之命回渝进行诱降活动，逆迹昭彰，铁证如山，国民党宣传机关却不特隐匿其卖国罪行，反而曲加辩护，称之为“刚强坚贞”、“矢忠矢勇”。第五纵队托匪张涤非等九个人开会十分钟，假借名义，狂吠反共，挑拨内战，破坏抗战，为全国正义人士所不齿，国民党官方通讯社竟将张逆通电广为传播，勒令各报照样登载。八路军、新四军转战敌后，抗击在华日军百分之五十八，抗击伪军百分之九十以上，它们的战报是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所引领乐闻的，然而国民党当局竟千方百计加以封锁，严禁各报登载。显而易见的，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没

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这种新闻统制的方针，倒很像是为了准备投降日寇哩！

在后方，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政治主张横遭压抑，不许在报上发表，甚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解放"、"国共合作"、"各阶层的人民"、"少数民族"、"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等，都被认为"谬误名词"，都在禁用之列；而颂扬法西斯独裁的谬论反而受到纵容和包庇，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人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据民国廿六年政府统计，当时全国报馆有1031家，而到了卅年十一月，据国民党中宣部统计，大后方报纸获得核准者仅273家，而去年一年大后方报章杂志被封闭者竟达500种之多。尤可痛者，新闻记者的人权、人格毫无保障，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派遣大批特务混人新闻界胡作妄为，另方而对现有记者的威胁利诱，无所不至，一起使他们俯首帖耳，供其驱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大后方的新闻事业已到了空前衰落的地步，而这种现象，又正是实行独裁、摧残民主的标志。这样的新闻政策，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权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这倒很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的法西斯新闻政策呢。

就民生问题而言，让我们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河南灾荒，来再次说明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是怎样执行的。河南灾况的严重为近百年来所未有；凡有人心，闻之莫不同情。衡



抗战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来到大后方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图为1939年9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联谊会在重庆成立时合影。左起，前排：端木蕻良、方白、王洁之、陈子展、陈璧如、萧红、靳以、魏猛克、胡风；后排：马宗融、杨仁甫、老向、胡绍轩、方令孺、伍蠡甫、何容。

以常情，当局正应督促各报据实披露，向海内外大声呼吁，庶几可以筹集巨款，救济三千万灾黎的生命，为国家民族保存一些元气。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粉饰太平和掩盖其救灾不力的责任，竟令国民党报之拒绝登载客观的消息，同时却大吹大擂，发表宋美龄、宋子文等在美国和英伦不负责任的言论，说“中国没有灾荒”，一直欲盖弥彰，腾笑中外。而国内报纸竟有因发表为豫省难胞呼吁的文字而遭处罚者（今年2月2日大公报发表这样的社论而被处罚停刊三天）。这样的蔑视难胞痛苦，损伤民族元气的行为，诚不知国民党反动派用心何在？此外，如囤积居奇的头子不准揭发，贪赃枉法的大官不准批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生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这倒很像唯恐我民族还有抗战力量，所以亟亟于恶化民生、摧残民力呢！

今天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政策，戴上三民主义的帽子，但实际上和革命的三民主义并无任何相同之点，这种反动的新闻统制政策，是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对敌准备妥协、对内厉行独裁的整个政治方针分离不开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推行这整个反动的政治方针，就必须统制舆论，垄断舆论，使舆论界法西斯化、特务化。希特勒说：“利用报纸，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希魔这种愚民的办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统制政策的蓝本。

和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完全相反的，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正确新闻政策。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各界人民都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而汉奸和法西斯第五纵队则不但没有发言权，而且遭受严厉的镇压。各种报章杂志及其他宣传品，只登载有利于抗

战、有利于民主、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消息言论，而破坏抗战、破坏民主、拥护法西斯的文字则绝对不准发表。报纸和人民大众维持着密切的联系；除了职业的新闻记者深人民间采访以外，还有大批的工农兵通讯员经常向报纸投稿；记者们在前线一面工作，一面战斗（如何云同志即为其中英勇牺牲者之一），在后方则于业务之暇，积极参加生产。这样的新闻政策，才是抗日的和民主的新闻政策。在大后方，亦应当实行这样的新闻政策，但是这有什么希望呢？

今天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统制政策，其手段之毒，为害之烈，有过于袁世凯、张作霖等北洋军阀。袁张等屠杀少数异己记者，已经闹得全国骚动，而国民党反动派则更进一步，企图窒死整个舆论界，拔去全国人民的喉舌，使整个舆论界法西斯化、特务化，失去灵魂，成为独裁政治的驯服工具。此种政策，若让其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则不特全国新闻事业有毁灭之危险，而且民族正气将损伤无余，抗战大业亦将遭受不堪设想的损失。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无怪大后方舆论界，对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纷纷提出抗议！在今年纪念九一记者节的时候，全国热心抗日、爱好民主、仇恨法西斯的记者们和同胞们，应当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族的危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并向国民党当局要求立即开放言论出版自由，停止对任何抗日报纸的无理压迫，取消强迫登载中央社造谣电讯的办法，根绝破坏抗战和宣传法西斯的言论，严格取缔混入新闻界的特务棍徒，保障记者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权！

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临了！墨索里尼已经倒台，希特勒岌岌可危，日本法西斯的失败亦在不远。我国以希、墨为师

的人们，如仍一意孤行，必难逃避身败名裂的悲惨命运。让我们加倍努力，为抗战和民主而奋斗吧！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社论

记者风格：威武不屈，秉笔直书！

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董狐直笔，赵盾胆寒。这是天地的正气，也可以说就是代表了舆论的力量。如果我们要为中国记者从自己历史中找寻优良的传统，怕首先就应举出这样的风格，作为我们记者的圭臬。

古之史官，固然不能就等于今日的新闻记者，其间有着很大的距离。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原也不只是垂诸竹帛，留诸后代作为殷鉴，对当时的行政当局亦发生了很大制裁作用；说古时的史官和今日的新闻记者，在精神上自也有其一脉相承之处，并不为过。因此，我们觉得，在今天纪念记者节的时候，提出董狐那样大义凛然、威武不能屈的风格，来作为我们中国史上新闻记者的优良传统，是颇为适当的。

“为人民喉舌”，这是每一个新闻记者所用以自负的。然而，要真能负得起这样一个光荣的称号，就得像董狐那样，紧握住自己这一管直笔，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仆。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们说、要求我们写的，就决不放弃、决不迟疑地说出来；写出来。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实和违反民

意的东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强力在后面紧追着或在前面诱惑着，我们也必须有勇气、有毅力把它抛弃，决不轻着一字。直者，直道而行也；有是有，无是无，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丝毫的假借，也不容有丝毫的含糊。今天，是我们自己的节日，应当是我们的机会来作一次清夜扪心，检讨一下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曾否对董狐那枝直笔松过乃至放弃过？是否对得起真理，对得起人民？

过去的一年是六年抗战中最艰苦的一年，也是我们为抗战服务的新闻工作者最艰苦的一年。反躬自问，一年来我们对抗战确也尽了不少的力量，对于抗战事业既忠既勇的言行，不问其出自前线或后方，都曾为之报道消息，发扬光辉；对于抗战不利的事实和言论，也曾予以揭发，予以斥责。然而，讲到直笔，讲到忠于真理，忠于人民，就未免有些汗颜。这种风气的形成，固然在客观方面有其重大的原因，不能把这责任全部推到记者肩上，诚如同月29日《新民报》“先得纠正空气”一文所指出，“在一切问题之先，是‘说话’这一件人民的基本权利，要有确定界限以内的把握”。故要纠正这种风气，就“还有一种‘空气’，似乎先须纠正。”但是，显然的，不能说记者本身对这种风气就没有责任。我们觉得，应当纠正的，怕不只是重外轻内的风气，怕还有较此更甚而更为新闻记者自己引以内疚的。间尝省察，养成此种于记者风格尚多未合之处的，除客观“空气”外，在记者本身，要有一种应予纠正的观念，即对于宣传一词的了解是也。

新闻记者应当为抗战建国的国策努力宣传，向国外宣传，向民众宣传，这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但今天宣传一词已在广大的读者之间造成一种不良的印象，常常可以听到

像“这是宣传，尽可不去理它”这一类对报章杂志的批评。而记者自身，对这种批评也竟习以为常，毫不怪异。这是说明一般社会都已把宣传一词，当作说话不真、记事不实来了解，而记者本身呢，也常常会明知此话不真，此事不实，但为宣传计，就觉得不妨姑妄言之、姑妄记之似的。这是记者风格的一个绝大污点，新闻事业的一个绝大危机。

宣传工作是一种教育事业，宣传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是一种最广泛、最灵活的教育方式。在教育中不能容许妄诞不真，在宣传上又何能容许虚夸不实。要知道，“墨写的诳语，敌不过血写的事实。”宣传而稍流于虚妄，断然不能幸致社会人民对你的信心，徒然辱没了董狐的那枝直笔，污损了记者应有的风格。以为人或可欺者，只表现自己的其愚不可及而已！

因此，我们愿意在今天纪念自己节日的时候，提出董狐那样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风格，来和从事新闻事业的同仁共勉而互励。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日社论
原题：《记者节谈记者风格》

言论自由与民主

澳洲雪梨（即澳大利亚首都悉尼市——编者注）的报纸，因为政治新闻被检扣和出版发行被干涉，引起轩然大波。事实的详情虽然还不知道，可是我们从那些报纸抗争的强烈，以及市民拥护报馆，列队游行，高呼“我们需要言论自由”、“民主政治必须长存”的口号看来，可以看到澳洲的人民拥护民主要求言论自由的强烈，也可以看到压制言论，是要遭到人民的反对的。

雪梨市民所喊出来的两个口号，正是相连一贯的两件事：有民主就有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是民主。我们拿英国来作例，英国是一个民主国，所以英国即使在战时，对言论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报纸送检是出于自动，而且只限有关国防的稿件；刊载了有害国防的消息，至多也不过事后由政府提出公诉，没有其他任何直接干涉言论的行为。——这些事实，是一民主国对言论态度的标本。就拿现在发生纠纷的澳洲来说，报纸和人民也还有对言论限制作抗争的权利，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创作自由

（中大通讯）4月14日晚上，中大中国文学系请杨晦教授演讲，题目是《文艺与民主》。来听讲的同学相当多。杨先生先解释了这个题目的意义和讲的动机后接着说："文艺本来便是民主的，在人类的童年原始时代，没有个别的艺术家，大家都可以参加艺术活动，人人都有表现艺术才能的机会，这段时间的艺术作品极丰富，和近代的艺术水准比起来，毫无逊色，这为什么？因为这时的艺术是完全在民主的条件下产生的。"杨先生从中国文学的事实证明不把人当人的专制时代绝不能有伟大的文艺作品；纵然有，也是病态的东西。"一般认为唐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文艺活动特别高涨；但其实，以中国面积这样大，人口这样多，这点文学成果和俄国、法国短期间比较起来，真是太微渺不足道了。如果那时唐朝是个开明的时代，情形就会更好些了。"文艺不只是民主的产物，并且应该民主。这里杨先生从表现方法中加以扼要的说明："文艺注重形象、注重表现的本领，然而，不民主的社会环境偏偏处处破坏人的表现才干，不要人衷心地哭和笑、流露真正的情感。""文艺应该争取民主，争取人

人有创作的权利”。杨先生肯定地指出：“文艺像一面镜子，照出生活的真相，因此文艺也是争取民主中最有效的工具。”不民主的社会，提供给文艺许多悲惨的题材，文艺揭露了压迫者的世界如何歪曲了人类善良的天性，“最近报纸上载着救济院内虐杀幼童的事实，这是想像不到的残酷；如果这些黑暗的现象，用文艺写出来，或者到舞台上表演，效果一定比新闻消息要深刻得多！俄国文学能够这样普及的原因就由于它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谈，紧紧地接连着生活中的悲惨事件，所以文艺应该争取美好的生活环境，也就是要争取民主。”最后杨先生更特别强调人人都必须知道和了解民主的关系，他引述了希腊盗火者普罗米修士的故事，他提高了声调说：“普罗米修士的意义就是‘预先知道’，这位英雄预先知道了必然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敢于做盗火的举动。第一，他知道最高的神宙斯想毁灭人类，其次他知道人类有了光明就一定可以得救。他也晓得了偷了火之后一定要遭受残酷的惩罚。然而单是这三点还不够，他敢于这样做，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知道这位大神一定要倒塌！”“大神一定要倒塌”，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杨晦教授的讲演，就在这里结束。同学们踱出了黑暗的教室，大家感觉兴奋。星光从天空洒下来，沙坪坝的沉闷环境是不会再长久地维持下去了。

《新华日报》1944 年 6 月 12 日

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

考察新闻自由的三位使者28日到了重庆。但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29种特别法规。……此外，尚另有内政部公布的两种。除明令公布的种种法规外，还有各种临时指示电文。……三十三年六月（即1944年6月——编者注），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战时出版品书刊审查办法》，内容无所不包，例如其中规定的禁载标准十二条中第一项：“违背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者”就笼统抽象，可以任意解释；而照现行情况，所谓“立国的最高原则”，就是党治。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下面我们收集了一些在各种困难下的中国舆论界对于新闻自由的痛切呼吁，和对民主主义政策和殷切向往的部分材料，以供参考。

时令摘要：

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所以我们的认识是……要想在战后不愧为四强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须先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国日报》）。

"言论自由是人类一致要求的权利，……从社会文化的观点上看，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必具的条件。新闻记者和其他人类一样，要求他们必有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他的任务和职责更需要他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因为他要言人之所未言、论人之所当论。""通常说新闻记者是站在时代的前面，报纸是指导社会的，这不是对于记者的恭维，而是加重了记者的责任。……新闻记者要执行他的任务，便需要充分的言论自由"（同报，九月一日）。

"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仅在平时需要言论自由，在战时更需要言论自由。罗斯福总统把它列为四大自由之首，邱吉尔首相也把它定为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因为他们能这样地重视它而且好好地名符其实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现在连打胜仗，并且要在将来建立和平。这一切摆在眼前的事实，正清楚地指出了我们今天应有的要求"（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云南日报》）。

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

"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而在反映民意这一点，遗憾尤多，近年以来，……言论出版的限制加强，结果出版界的凋零、实为多年所未见：而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应该加以改良的，……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业兴盛。我们对于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过事'谨慎'，势将使出版事业趋于萎缩，而人民的精神食粮也感缺乏；终极的结果，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以无识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战，更不足以谈建国"（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义报》）。

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

"通讯与言论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没有这种自由，则失去说话自由权的个人，必同时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丧失，那就与奴隶无异，不能算是国民。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所以争取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正就是争取民主的先着"。"人类的命运支配于少数独裁者之手，则必产生暴力专制、武力侵犯、残酷战争，结果是像这次世界大战那样使人类与其文化淹在血海之中。所以要保障永久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战，唯一要紧的是把世界的支配权放在人类绝大多数的手中，因此，必须使人类绝大多数一律享有民主自由。凡少数支配多数，少数专制、多数失其自由的现象，应该不再存

于今后的世界。”“全世界、全人类既须悉数进人民主的范围以内而享受民主的支配之权，那么，取径于通讯与言论自由使人人能够说真话，能够得真消息，能够随时得知世界的真象，绝对必要。所以任何束缚此种自由、不许以真相公告人类世界的现象。都须在取缔之列，乃是自然的结论”（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华西日报》）。

作恶扣压新闻必造成自由的衰落

“最近国际间，因为战争关系，新闻自由曾受相当的限制，因而引起新闻界的反对，致产生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一月四日美助理国务卿麦克利希在联合国情报委员会的聚会上发表演说，主张全世界新闻自由流通，俾有助于维持未来世界之和平。法驻美大使庞纳谓：‘法报除军事理由外，并不受其他限制。’廿五日美国《纽约时报》社论说：‘一个国家的公民，有权知道一切新闻报道。一个国家里面，若不许人民有知道的权利，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政治自由；如作恶扣压新闻，必直接造成自由的衰落。”此社论作者美联社社长肯特古柏斯主张‘全球新闻自由、交通自由，新闻记者行动不受干涉。’由此可见新闻自由，关系于政治之民主与世界之和平，至为重大，欧洲朝野无不一致主张绝对尊重，不容侵犯。”“在本来享有颇大的自由之欧美新闻界，且在大声疾呼，争取新闻自由之保障，若以中国新闻界所有的情况而论，不知对此应当作何努力才对。因为中国的新闻界所有的自由实在太稀微，太没有保障。……新闻记者以报道忠实受到虐待的事件，不一而足。记事立言，即本诸天良，发于忠诚；若触犯个人私利，往往引起报馆生存与人身自由的危害。新闻自由与新闻记者的人身自由，同样需要迫切的保

障。所以争取新闻自由，在中国更有他特殊的重要性”（卅四年二月二日同报）。

要以坚毅精神争取实现民主政治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中国新闻界不能以空洞拥护和附和欧洲新闻自由运动为满足，为了忠实于自己的天职，必须对本身解除不合理的、不必要的种种束缚，取得真实的自由。因此必须以坚毅的精神，努力实现新闻自由的政治前提，给新闻自由奠定巩固的基础”（三十四年二月二日《华西日报》）。

“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就报纸而论，国内外消息由一个机构发出，凡是对某一方面感觉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远不会让人民知道。……于是所有的报纸图书杂志，尽管种类不同、名目不同、地点不同，内容都举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这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其结果也会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硬化。有计划的桎梏，这国度内的人民将会重返自然，成为木石，成为猿鹿，为葛天氏之民，为无怀氏之民，为羲皇上人！”（吴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论坛》）

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

“目前的事实，是报纸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

一个人民的胸坎中，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是懦夫的行为；受辱不争，受害不争，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径；我们是懦夫，还是奴才？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国家，应该先以铲除这不争的恶性开始。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报纸与舆论的合一，应该是当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吴晗，昆明《自由论坛》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以出版自由繁荣出版业：解除精神匮乏的不二法门

凡是常到各书店的门市部去看看、常常留意报纸上的书业广告的人，都能发现，目前出版业中表现着极不正常的现象。无数的读者正渴望着读到能够帮助人认识现实、解决问题的出版物，可是新书、新杂志都显著地减少。许多曾经每日出版若干本书的书店，现在只能日出一本乃至几日出一本乃至完全不出新书了。在这出版业衰颓的情形下，大量地继续不断地印出来的只是“色情”作品和“公报”式的书刊。前者以迎合低级趣味和麻痹读者为目的而到处泛滥；后者的出版对他们自己是“报销”，对读者是蒙蔽欺骗，虽然并没有人欢迎，也源源不断地向市场倾销。于是出现了很多卖弄风情、搔首弄姿的所谓“作品”，甚至《玉梨魂》、《情书一束》也翻印重版；于是甚至有些官方的杂志书籍大量印出来后，却堆在栈房里，任其霉烂。这些书本来只是糟蹋纸张油墨，并无什么人阅读。——透过这种种反常的现象，我们可以听到读者的叹气、民营出版的诉苦和作家的呻吟。一般读者在艰难生活中本已对书价摇头，但纵然出高价，也有无书

可购之苦。正当的民营出版业已奄奄一息，陷于绝境。许多作家能够也愿意供给为多数读者所欢迎的新作，然而终于只能搁笔或写些不关痛痒的东西。

看了这种种现象，怎能不使人忧怨，使人愤慨？一个国家的出版业情况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情况、民主程度的最直接的测验器。目前出版业中的反常现象实在是严重的危机。中国人民在精神食粮上也如在物质食粮上同样有匮乏的恐慌，而且是被迫着接受腐烂不堪的精神食粮，或甚至以砒霜来代替。要走向民主，要走向胜利，要使中国不再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这种现象绝不能继续存在。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人民一定能够自由地得到合于他们需要的读物，也就是一定有一个自由的、繁荣发展的出版业。或者说，以繁荣的出版业来供养人民的、充分的精神食粮是自由的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帜。——由这里我们就可以解释目前民营出版业困窘、出版物在质与量上都显着衰颓现象产生的原因。

抗战打开了人民的头脑。人民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各种书籍。抗战开始的一年内出版业繁荣的现象即由此而来。假如出版家能够不受任何障碍，继续自由地供应合于需要的书籍，广大读者自然会全力支持他们。纵然物价高涨，百业艰难，但只要出版物销数多，定价仍可不致狂涨过甚，自由的出版业也决不至于不能维持。

同时，在自由的市场上，不合现实需要、不受读者欢迎的出版物自然会淘汰，出版物在质上也就一定能不断提高。固然一般市民中仍有一部分人倾向于低级趣味，喜欢无聊色情作品，这其实是在过去任何时期都有的，不过当正当的出版业繁荣之时，投机出版物究竟只是少数，它们的读者也有可能被引导向正当读物。只是因为现实的苦恼既助长了人们

的不正常的心理，而正当的出版业又萎缩不堪，才使色情书籍能够泛滥一时，几乎成为出版业的主流了。有心人固然为此扼腕叹息，但未始没有人在暗中窃笑，以为得计。正本清源，要克服这种危机，也非使正当出版业自由发展、正当出版品得到保障不可。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还必须在纸张、印刷、交通运输各方面都有充分自由的保障。在目前大后方纸的恐慌下，第一件要紧的事是如何发展纸业生产，而不是统制纸张。在纸的统制下，平价纸的不均等的供应更加速了民营出版业的末运。再加上多数印刷所被控制、邮寄运输上的重重限制，书刊未出之前先要经过严格的检查，既出后仍有被停止发卖的危险，把民营出版业逼得一筹莫展。这许多实际情况不改变，出版业衰颓的现象是绝对无法挽回的。

最近有30家出版业联名发表紧急呼吁，他们沉痛地说，他们将“被迫从出版岗位上总撤退”，要求当局给以纸张、印刷、邮寄、资金周转上的便利。我们以为他们的要求是极端正当的。这些出版业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岗位至今，是值得赞扬的。我们希望他们继续坚持，全国作家和广大读者，一定都会支持他们的主张，来要求解除对于出版业的一切束缚，要求给出版业以自由和繁荣发展的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原题：《出版业的危机》

为笔的解放而斗争

——“九一”记者节所感

在抗战胜利中纪念“记者节”，每个新闻从业员都感到一点光荣，但是在光荣背后，对于戴着重重枷锁而奋斗过来的新闻记者，每个人也都有一份悲愤和羞惭。悲愤的是我们“文章报国”的志愿和力量，在这长期的神圣抗战中因为这种不合理制度而打了一个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铸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甚至有人由新闻记者摇身一变而为检查官，用剪刀和红墨水来强奸人民的公意。在前方讳败为胜，要直到兵临城下的时候才让老百姓从空气中传来的枪炮声音知道战事的真相；在后方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政治外交的大事可不必说，指责

一点兵役粮政上的缺点，也就是“暴露黑暗”、“沮丧信心”、“妨碍抗战”，结果是“别有用心”，罪名层出不已。在争自由民主的神圣抗战中，检稿、扣报、罚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务殴伤报童，阴谋放火，这算是“合法”行为；而在中小城市，那么逮捕记者、封闭报馆，更是家常便饭。欧美报章报道抨击中国检查制度的文章，不绝于书，而我们却受之坦然，怡然自称我们是争自由的“民主”强国！

战争结束了，英美可不必说，连法西斯的阿根廷、战败了的日本都已经取消检查制度了，大家说阿根廷和日本在伪装民主，而我们呢，好像连这一点伪装的勇气也没有，“即将”取消、“决定”取消，话也听得很久了，实施何日？好像这个“国情不同”的地方，对于这把扣紧人民咽喉的枷锁还不胜其眷恋之情，惋惜之念。今天是什么日子？不是束缚人民言论自由的法西斯虐政业已打倒、四大自由列为宪草？不是戈培尔已经在播音机前而死掉了？

今天，应该是中国新闻记者起来洗刷羞辱的时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记者节还要写《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的文章，应该已经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了。

《新华日报》1945年9月1日时评

V

中国需要真正的普选



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

力　民

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借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并从而诬蔑解放区的民主选举。如像去年12月26日的《和平日报》社论就可作为代表，那社论里面说："……共产党拿'普选'和'不记名投票'来欺骗人民。谁不知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术'就是'民主'，简直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种说法，不仅是诬蔑解放区的人民，而且推论下去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还无法运用民主选举，还应当由他们继续"训政"下去。居心何在，不问可知。

假若将来中国人民个个都能识字了，实行选举时一定便利得多，这是很明白的。现在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



黑龙江省绥化县农民土改后以“投豆子”的方式选举政府委员

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解放区实行民主选举的经验便是明证。我们略举几个例子，看看解放区是怎样选举的吧：

首先要说明，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联合提出一个候选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这是很久以来就采用了的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又曾有过不断的改进和新的创造。过去的办法是由候选人坐在晒场上，每人背后摆一个罐或碗，因事不能到会的候选人仍然给他们空出位子，位子后摆上碗，每只碗上都贴着候选人的名字，选民每人按应选出的人数发豆子数粒，于是各人便把豆子投人自己所要选的那个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监选人向大家说明每一只碗所代表的候选人，一般说起来，不识字的老百姓总是特别留意于记忆的，在这件他们看来很郑重的事情上，更是不致于弄错。这种方法还有缺点，那就是当每个选民投豆子时，到会的人都可以看得见，实际上成了记名投票。后来就改变方法，把碗统统放到另外一个房子里，除监选人在选民万一记不清楚时从旁帮助说明外，其余的一概不准在场。但这种方法仍有缺点，因为碗是仰着放的，那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多，那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这样就可能使后来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响，因而不自觉地失去了自主性。补救这个缺点的方法，就是用纸把每一个碗都盖起来，而让投票者从碗边上把

豆子投进去。最近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中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在候选人数不多（乡的选举中候选人一般是不会太多的）的时候，依候选人的多少，发给选民几颗颜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一颗代表张××；黄豆一颗，代表李××；玉米一颗，代表赵××等，另外每个选民再发给小纸一张，如果想选谁，就把代表谁的豆子用纸包上，放在碗里，同时包几颗者作废。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农村文盲的无记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实行结果很好。

以上只是略略举几种方法作为例证而已，此外也还有其他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创造证明了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那些信口诬蔑解放区选举，并企图以此来拖延民主选举之施行的谎言，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才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哩。

《新华日报》1946年1月24日

竞选

街头的议论热闹起来了，大选在村民们的心里，好像坡里黄黄的麦穗一样，一天一天成熟了。

6月1日妇女会召开了会员大会，讨论后提出妇女的候选人。“咱妇女会员要当选村长，张大妈做公事认真、负责任，真正挡上挡下的人才。保证每月开个检讨会，拉一回清单，保证减租交息……”。会员都喊道：“对呀！咱去宣传，公民小组开会，咱一定要提出来对大伙说说。”

各种团体开会完毕之后，竞赛开始了！大会严肃、紧张。上任村长报告一年村政工作并检讨了自己，当他报告检讨完了征求大家意见的时候，人丛中几个人自言自语：“你都检讨出来了，咱没的说了。”

接着讨论通过候选人，会场顿时寂静了。青年李××说：“××前年大扫荡，他欢迎了鬼子，不够候选人资格。”张大嫂也说：“我也看见他欢迎鬼子来着，俺娘儿躲在小沟里，看见他打小白旗，迎着大路走去……”会场立刻应和起来：“对呀！没有资格。”举手表决后，选委会从黑板上擦去了××的名字！墙脚两个老大娘在议论：“活这么大年纪还才看到村长是自己选呢！”“是呀！这21个人是从大伙中用筛子筛出来的，像箩面似的，越箩越细，你看张大妈多能干

呀！咱们的代表。”这时，又有人站起来发言：“我介绍李大嫂做候选人，今年春荒，人家满锅清水，还是一天到晚东跑西奔的办公事。”

21个候选人通过了。马上就要投票，张大娘嚷着：“慢点，你再多念几遍，我记不得。”大家挑选着对象，一边挑一边批评。会场热闹极了。监票人李××，最后把票包起来，很重的用指头蘸上封了包。他对人说：“咱活了这么一把年纪，第一次尝尝民主的味道。”

在开票前，村民们在坡里互相询问着：“你投了谁的票啊？”“又不大离儿，还是张大妈干吧！”

晚饭后，公民们急忙走向会场去，当票开完，被选人各阶层人数相等，会场异常静肃了。

第二天，公民们都说：“一碗水都端的平平的，这些才是当家人呢！”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6日

论选举权

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好象是监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了。本来，人民只享有一个选举权，还不能够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像中山先生所说："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要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所谓四个民权，就是在选举权之外，更加上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三个权。人民同时享有这四个权，才能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但是，假使人民连选举权都不能享有，那就根本谈不到民主、民治，而和中山先生的理想，更不知相去几千万里了。所以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只要是这个国家的人民，那就除却"精神缺陷"或"被法院

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外，一达到成年，都应享有选举权，不能加以任何性别、种族、信仰、资产、教育程度、社会出身乃至居住年限等限制条件，另一方面，每一个人民也只应享有一个选举权，不能依据任何性别、种族、信仰、资产、教育程度、社会出身及至居住条件等优越条件，而取得一个以上的选举权。这就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而实行的“普通”、“平等”的“普选制”。固然，在过去，甚至现在，有些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并不是普选制，而是限制选举制。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潮流所趋，很明显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选制了。特别在我们中国，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张普选制。在理论上，一切人民都将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然而问题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事实上。如果，事实上人民不能够享有同等的选举权：有的人有选举权，有的人没有选举权；少数人享有的选举权多，多数人享有的选举权少，则普选制虽在理论上被承认，在法律上被规定，结果，还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所要问的，是人民现在是不是已经都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将来，是不是真都能享有这种选举权，如果现在还没有，将来也未必能，那我们就必须努力促使它有，争取它能。

自然，这里所谓“人民”，决不包括汉奸在内。因为这些东西，是全国人民的敌人，它本身已经不是“人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曾说：“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国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

由和权利"。很明显，能否享有民权，只看他是反对敌人、还是效忠敌人，而不是问他属于哪个党派、哪个集团。那么，现在，应该被剥夺选举权的，也就只是汉奸，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民。另一方面，只要是汉奸，便应该剥夺他的选举权，使他不能潜伏在"民国"之内，公开或秘密做"反对民国"、"破坏民国"的勾当。假使我们对汉奸给予选举权，而对人民，则剥夺选举权，那就犯了天大的错误！

人民有了选举权，不仅是可以选举代议士，而且是可以选举政府官吏；不仅是可以选举地方官吏，而且是可以选举中央官吏。像中山先生所说："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免之权；而对于一国之政治，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以行之。"这就是说，人民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愈直接。但选举权则虽对于中央，也是可以无限制地运用的。特别是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举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

选举权是不是能够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运用，与被选举权有无不合理的限制与剥夺，具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本来，广义地说，选举权就包括被选举权在内。有选举权的运用，就必有被选举的对象。因而有选举权存在，就同时有被选举权存在。如果被选举权受了限制，则选举权的运用，也就受了限制。具体地说，假使某些人民被剥夺了被选举权，则有选举权的人就不能去选举他们，因而选举权的运用，也就受着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通"、"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

选举权。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以及汉奸外，任何人的被选举权都不应该被限制、被剥夺。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最后，应该说及的，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社论

Ⅵ

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

青年教育与思想问题

（节录）

编者按：我们访问了好几位青年的前辈，提出几个关于青年教育的问题，请他们发表一点意见。但因为时间和交通的困难，有许多受我国青年敬爱的前辈，还未来得及去访问。现在就我们所采访到手的，发表出来作青年读者和国际青年友人的参考（本期文章编者以收到先后为序）。

一、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教育政策，起码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二、有人要求青年的思想统一，因而决定实行严厉的思想统制（如像法西斯国家那样的），他们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吗？

三、领导青年的思想，最好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郭沫若：

对于国家的教育政策，郭先生认为至少必须具备这几个特点：

1．人民本位。为最大多数谋最大的幸福。它的反面是

一切变相的帝王本位，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以谋少数人的安全。前者是扶植主人，后者是训练奴隶。

2. 国民教育普及。作为一个健全的人的普通常识，即初中以下的教育，应使全民享受。

3. 高级教育保护。高级教育应因材施教，杜绝一切特权，不使贫苦者被拒，而富者滥竽。

4. 学术研究自由。凡人民本位的思想有尽量阐发的自由，帝王本位的思想有尽力打击的自由。以真、善、美为目标，不能受任何有意的虚伪、歪曲、变态的箝束。

5. 尊重学者，保卫师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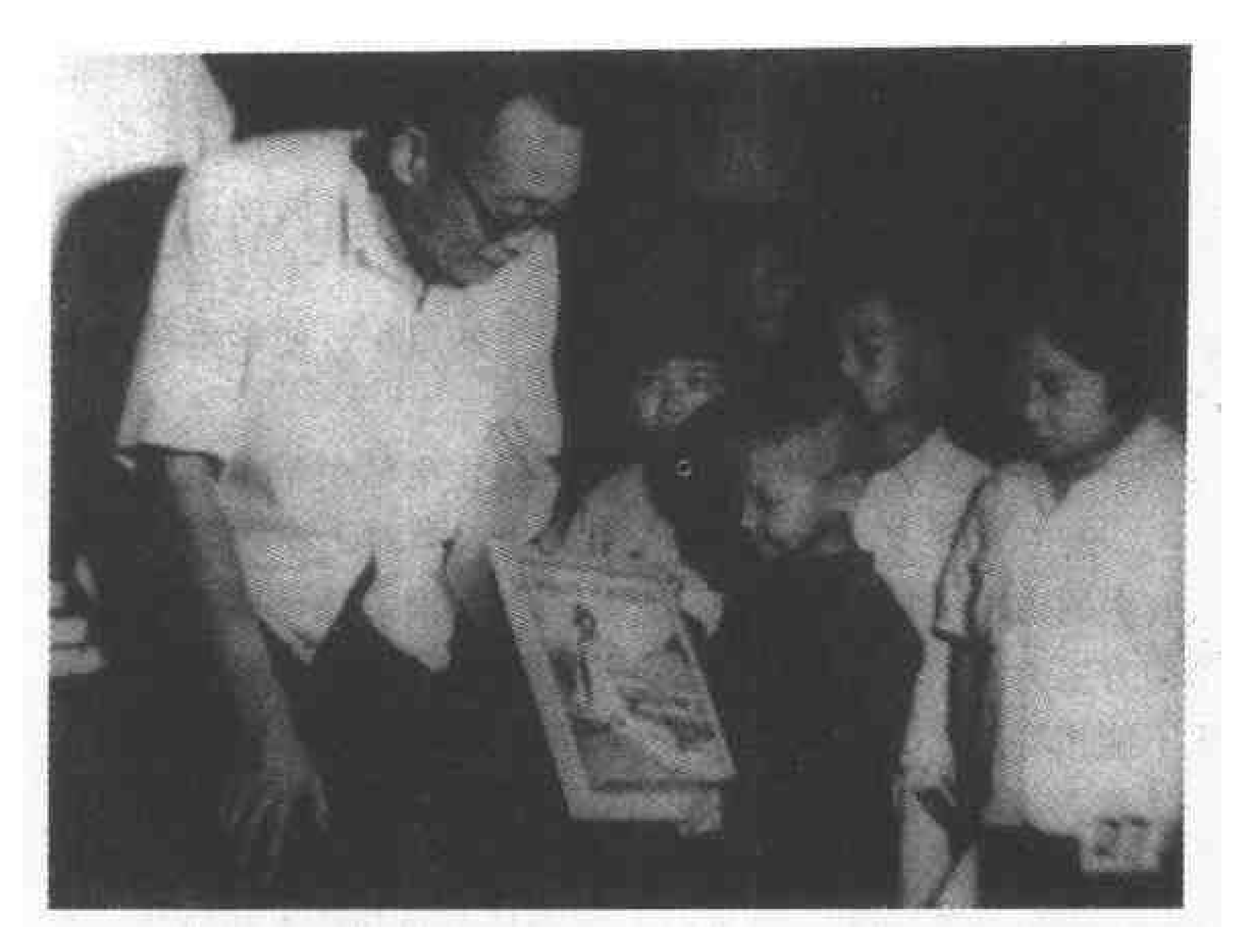
6. 国际协调。与进步的民主国家保持协调的步骤，肃清法西斯思想，共策人类的和平。

郭先生更认为法西斯的思想统制政策是可以达到其预期的效果的，德国和日本便是绝好的证明。但这并不是“统一思想”，而是“消灭思想”。“它使一切人民化为工具，化为猛兽。这是人类文化的叛逆，为害于人民，更为害于世界”。“使这一次的世界大战，为争取解放不知道流了几千万人的血，而且在战争结束后，德、日法西斯的思想的肃清，还要费很长远的岁月的”。郭先生更很沉痛地指出：“满清入关后统制思想，使中国退化了 300 年，现在却还在受着它的余痛。”

谈到青年思想的领导问题，郭先生说：“青年思想的领导，最好是启发式的、感应式的、培养式的。

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要顾到。有健全的身体，便容易有健全的思想、健全的品德。

目的在使每一个青年熟悉自由思想的法则，养成自由研究的习惯，发挥自由创造的精神。



陶行知与他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的小学生在一起。

给以丰富的养料、美好的环境、高尚的师资。
废除剪削绳束的盆栽主义。
废除脚带腰缠的畸形主义。
废除篝首阉割的奴才主义。
一句话归宗，让青年自由自在地发展便是最好的领导。”

陶行知：

1. 民主政治下的教育，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甲：天下为公，教育为公，不以教育为一党一派及任何小集团谋利益。

乙：尊师重道，不以侦探作教员，不使教员兼侦探。

丙：使师生之间，没有隔阂。

丁：使学生打开眼睛看事实。

戊：关于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学生有阅读自由、讨论自由、批评自由。

己：学校内团体生活，要有民主的组织，使学生在民主生活中学习更进步之民主。

庚：动员广大群众，在真正的民主生活中学习民主。

2. 三民主义一开始就说："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其中的道理，首先是发生思想，思想贯通方生信仰，有了信仰方生力量。"我首先指出"思想统制"与"思想贯通"是不能相容的。其次可以分两方面说。那不得已而受统制的人是越弄越没有追求真理的兴趣，结果不是思想统一而是思想消灭、智慧消灭，统一于愚；那不甘心受统制的人，一部分倒会突破千磨万击，而发展出更高的思想与更大的智慧。

3. 领导一二人，可用豆油灯；领导一二十人，可用火把；领导一国之众及全世界就要太阳，至少要月亮那样的光明。统而言之，无论领导多少人，总是要拿着真理之光、照着人向那正确的道路走去。如果领导的人把火熄了，或把跟随的人的眼睛闭了看不见光，或者甚至把他们的嘴也封起来了，连路上遇着危险也不能喊，那领导的人们不但是费力不讨好，而且大家在半途上难免会出岔子。

夏衍：

1. 起码要承认青年学生是一个有人格、有人权的人。尊重他们的人权，让他们有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头脑来想的自由。

2. 假如这样的思想统制能够收效的话，那不仅希特勒

可以永远地支配世界，秦始皇也不会二世就亡国了。希特勒充分地利用了现代化技术的庞大机构，在德国人民中散布了法西斯思想；可是现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失败之后，德国人民不就开始用同样现代化的机构在反对法西斯主义么？

3. 我以为最好是培养青年人的客观态度。——让青年人和现实社会接触，让他们自由地感觉、自由地思索，然后让他们根据自己实际所感和所想得来的一切，来自由地判断。

茅盾：

家庭是一个圈子，学校是一个圈子，这两个圈子外边又有社会这个大圈子。这是个比喻。。这比喻好像有点机械。但我们姑且这样假设（当然事实上这三个圈子不能彼此各不影响，而且这三个圈子在什么线上交切，交切的角度如何，我们也暂时不谈），一个青年，他的家庭是一塌糊涂的家庭，除了赌和吃，便整天想些损人利己的勾当，甚至损人而并不利己的勾当，他所见的社会又是以贪污为能干、以强横为威风、以欺诈为德行，那么，即使他进了个好的学校，结果他会被教成个什么呢？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此所谓好的学校只是设备差、尚能灌给他一点知识，那么，有了知识的他，将来要贪污、欺诈、强横的时候，其作恶的能力和方法也会大些。然则这“好”学校给人的知识适足以济恶而已。我们又设想：如果这所谓好的学校是不但有好设备、好教师，还有好学风；教师不但教得好，还有好的人格，起熏陶作用，那么，该青年将来的结果，大概是三条路罢：一是家庭与社会对他的“示范”作用，完全抵消了学校中所给他的影响；二是他觉悟了，且有勇气反对家庭与社会对他的“示范”作

用，而成了叛逆者；三是思想矛盾，精神苦闷，悲观厌世。

因此，我相信，要希望能够教育出配作民主国家的公民，教育设施之必须符合民主精神，自不待言；而最重要者，社会上必须真有民主，即国家真是一个民主国家。如果外表与内容不合，决无好结果。由此可知法西斯国家即一套思想统制的办法，乃至领导青年的办法，自然都是不应当有的。而领导青年姑不谈威胁、利诱等手段，单是自己不检而且以言语欺骗，其结果也一定不是不堪设想，便是适得其反的。

沈志远：

民主和法西斯在一切方面都表现为极端对立的姿态。教育方面亦非例外。

法西斯（不论它穿的衫是黑色也罢、褐色也罢，或其他任何颜色也罢，都没有两样）的教育者，首先是把受教育者当作一群木偶看，而自己则充当着耍木偶戏的人；他两手拉住一群木偶头上的线，就可为所欲为了。因此，在法西斯教育政策之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是主与奴的关系。完全相反的，在民主制度之下，民主的教育者首先应当把受教育者看作是人——是和他一样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正因受教育者是独立的人，教育者就得尊重他们的人格，让他们尽量去发挥他们的天才，而自己居于从旁辅导的地位。两者的关系是兄弟般、朋友般的关系。教育者对受教育者不但绝对不能为所欲为，且不容许采取任何强制性的手段（哪怕用意是极善的），而只有用说服、解释、理喻的方法。主与奴的关系，在民主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域内都绝无存在余地，何况乎在神圣的教育园地内？



1940年，作家茅盾赴新疆讲学归途中，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课。

其次，和前一点相连带的，法西斯的教育者对于受教育的青年们的主要“教育”手段是威胁、利诱，一只手手枪（或者棍棒），一只手钞票（或者地位），根本谈不到人格教育，而是十十足足的奴才教育。

极端相反的，民主制下的教育家，最基本的方针恰恰是要发展人格教育，培养青年的独立人格，因而他们的教育方法是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依照最新的集体主义民主制的原则，教育者并且应该和受教育者共同一起生活、共同一起来检讨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民主制度的教育机关内，那种一手

手枪、一手钞票的卑鄙勾当，是绝对没有存在余地的！至于“盖世太保”之类的东西，更不许其混迹于神圣洁白的教育园地之内！

民主主义的教育，却以培养和鼓励青年大众的自由、自觉精神为其神圣的基本方针。它不要青年盲从，而偏要青年怀疑：遇事要问一问为什么？怎么样？以及怎么一回事？它最忌把青年当作木偶，当作奴才；它所努力追求的是受教育者的自由思想、自由活动（包括学术研究、生活训练，以及各种集体活动之自由），培养他们成为高度自觉、精神活泼、极富于自动创造力的一批国家社会之自觉的栋梁。

法西斯的奴才教育即将随法西斯本身之总崩溃走进坟墓；民主主义的教育必将随民主主义在全世界上的总凯旋而得到进一步的昂扬。世界上一切法西斯奴才教育的梦想者啊，赶快让给进步的民主主义吧，不然你们的坟墓也不会比纳粹们远一点的！

黄炎培：

我认为教育的道理是“先知觉后知”。既然如此，年长者应该尽量将自己的知识去告诉后辈。但是有两点应该认识，一是人类的思想和天赋才能、性格很不相同。我曾实验过，以同样一句话，某甲的反应与某乙的可以有很大不同。所以站在教育立场最好要因材施教，对甲应用适合甲的方法，对乙应该用适合乙的方法，决不能笼统用一种方法。其次，青年天赋不同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各色人材。为青年本身想，应懂得他们天赋的不同；从社会需要想，也不应教以同。

讲政治与教育不同，政治应有政策、方针，应该同。把

政治意义施之教育，应该是把政治所要求的最大的统一目标提出，让青年各人去走自己的路，以求达到这目标。具体说，一个国家生存要有民族、国家的观念，这是最高统一要求，不能放松；又如教人知道应该为人服务不自私，这是基本做人的道理，这都要说得透彻；至于怎样去做，那就让每个人自定办法。

最不相宜的是先做一个框子，叫别人进入我的框子，这样一定失败。须知青年最富自尊心，譬如你一定要他如何去做，也许他服从，但绝对不及让他自己选择一条路，施教者施以暗示启发，使他很了解这条路最好、最适当，这比命令式的施教要好得多。

翦伯赞：

翦先生首先说明一国的教育政策，与其政治制度是分不开的。英、美、苏联等国的民主政治，其教育政策自然也是民主的，是能促进青年思想自由地发展的。而德、日法西斯国家的教育政策，则是反民主的，对青年思想是统制的，是屠灭文化思想的。“用武装筑成一条文化思想的狭路，在狭路的这端，写着智识分子从此入口；在狭路的那端，写着智识分子在此领取官吏的委任状。因而一切智识分子为了升官发财，都挤满了这条唯一的狭路。这就是法西斯统制思想的教育政策。”翦先生这样说。

谈到希特勒、墨索里尼那些法西斯所施行的教育政策，能不能达到他们统制思想的效果时，翦先生就说：

“中国有句古话，‘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今欲以教育的方法，强不同之人心而使之同，这又何异强天下之人同其面貌呢？”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傅斯年、左舜生飞抵延安，同中共商谈团结抗战等问题。图为毛泽在设宴欢迎。

“庄子说了一个笑话，他说，人有恶其影而欲去之者，己愈趋而影亦随之，终不能去也。文化思想就是社会的阴影，今日法西斯一方面不能阻止物质社会的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又制止他的阴影停止在指定的地方，这和庄子所说的笑话同样是一个笑话。”

“除非永远站在黑暗之中，则一个人总不能去掉他的影子。而且即使在黑暗之中，影子还是存在的。不过淡薄一点而已。一旦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一根头发，也有他的影子。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文化思想的统制是徒劳而无益的事情。”

最后翦先生说：

"一个皇帝和一个乞丐，他们的思想，用任何方法也统一不起来的。因为皇帝所想的，是国家大事；而乞丐所想的是明天的早饭。我们既无法要皇帝担心明天的早饭，也就无法要乞丐担心国家大事。所以还是让他们各人想各人的。这不过是一个例子。"

"所以，我以为领导青年的方法，最好是让他想他自己所愿意的，研究他自己所愿研究的。这样，他们的天才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因而民主国家的教育政策，是要从青年的身上去掉那副文化思想的枷锁；换言之，要求自由。"

《新华日报》1944年6月25日

民主和自由新论

黄元真

某大学的一位院长在纪念周上公开讲演“民主”，说“校长为政府之代表，有资格谈民主；教授为校长所聘，可以稍谈一点民主；至于学生则根本不能谈民主”。

可惜无法亲聆那位院长先生的“高论”，不知他所说的详细理由是什么。但从这简单的新闻报道中，我们也不难推论一些出来。能够代表政府的校长（不能代表政府的校长并没算在内），当然“有资格谈民主”，而且只要能够代表政府而决不是代表人民的，就都有资格，某院长本人即为实例。因为他们这类的先生们所谈的不过是括号内的“民主”，也可以说是“政府主”或“××主”，与人民利不相关而害相连，大谈之是不妨的。教授又不同了一些，他们的言论不一定都能够代表政府，有的谈到民主就要认真起来（这是每个爱好真理的学者所必有的态度），这样会把事情弄得大不妙。不过他们到底还是校长聘的，双方都应该顾及到一点情面，只要在不大妨碍校长以及校长所代表的政府情形下，是“可以稍谈一点民主”的。至于学生呢？只要不是那些赋有特殊



1947年10月，国统区12城市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罢课大游行”。图为昆明学生上街游行。

使命来挂名读书的人们，都是年少气盛，遇事更其认真，说起话来，不懂得情面，也很少顾忌，若让他们来谈民主，就会要真正地彻底地来谈一下，这是与校长及其所代表的政府要谈的“民主”完全不相符合的，所以他们就“根本不能谈民主”。

在另外一位名人教训青年的文章中，我们又看到这类的话，要我们青年牺牲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来贡献给国家和革命。乍看起来，这是很有道理的。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

题，第一，我们那样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头一个问题暂且不去讨论它，只就第二个来说。要青年牺牲个人的自由，就来看如今的青年有些什么样的自由可拿出来贡献和牺牲的。今天青年有集会结社、读书阅报的自由么？完全没有。有谈话作文、交友通信的自由么？也完全没有。也许可以说，青年不是还有失学、失业、饥饿和死亡的自由么（目前这样的“自由人”真太多了!)？这些“自由”都是青年所乐于“牺牲”而唯恐“牺牲”不掉的，试问教训青年要牺牲的先生有办法让他们“牺牲”这些自由么？否则叫青年贡献什么和如何贡献给国家和革命？说到平等，青年并没有和一切别的人争取到平等的地位，青年群中也有许多等级的不平等，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做牺牲品的。至于所谓“个人的平等”，在我这个笨人看来真太难解，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对自己还有什么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发生，自然更想不到还有“个人的平等”是应该贡献出来的了。

话说到这里可以转回来，我们不要骂那位院长所说的都是屁话，而应该说他所说的正是实情；也不要以为这位名人对青年的要求太过分，其实这也不算什么新的要求，而是“既成事实”。

一而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民主自由”的教育。虽然有时也要牵着某些青年的鼻子，叫他们来唱唱“爱自由、爱民主”的歌调（但紧接在后面的总要露出那些什么第一什么集中之类的狐狸原腔来)，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而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斥“人格教育”

舒　芜

士气怎样败坏，“人格教育”怎样重要，这些呼声，不知由于什么触发，近来又常常出现在时论中了。人们引证“经商易得，人师难求”的古训，对于今之教员，责备他们只作知识的贩卖，而不会建树人格的仪型。似乎有一种企图，要从这些呼叫中把整个教育引导到一个“新的”方向上去。

必须指出，这里面包含了一种阴谋，而这“新的”方向其实是旧的，完全陈旧的。

教育，是社会的、阶级的武器。没有一个社会、一个阶级，不施行它自己的教育。中国的新式教育自清末起，数到现在，历史是很短的。然而，“五千余年古国”，倘要说清末以前就没有教育，那可说不通。我们这些习惯于新式教育的人，对于以前的教育，总觉得格格不入，总觉得那仿佛是全然相异的别一回事。不客气地说，就简直觉得那并非教育。太学、国学，以及州郡府县学之类，不必说了，就是常为论史者所啧啧称羡的书院，倘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过去，也会



解放区农民积极学文化。图为山西阳城县妇女识字班在上课。

感到阴森窒息，一点也没有所谓“春风化雨”的风光。好在眼前就还有什么“复性书院”之类，只要去参观参观，就可以知道的。

封建的教育与民主的教育，具有本质的不同。封建教育是反理智的，要求盲从的；民主教育则是建基于理智主义之上，要启发自由的思考，鼓励自由和意志。二者的目的，都在于受教者的实践，但在怎样使之实践的关键上，就有了决定性的分歧。

柏拉图说：知识即道德。实在的，凡与知识不能相合，不能用理智来阐明，经不起理智的批判的，就是说，没有理智主义的基础的“道德”，都不过是僵死的、教义的武断，

陈腐的、习俗的盲从，统治者打造出来的精神的桎梏。反过来，真正的大哲，亦必是大圣。因为真正的道德不外是现实社会、现实生活的斗争之路，这个路必需深湛刚强的、理智的力，才可以探明，可以遵行。现在说，新式教育错在注重智育，应该转而注重德育了。这话就表明了那所谓道德，是在理智之外，与理智不相容，就证明了那“道德”其实是什么东西。

不过，空言不如实事。即使真正的道德，也应当有一个能实行它的人站在面前作具体的仪型，效果可以大得多。提倡“人格教育”的人，也许会这样解释的吧。只要不是机械论者，当然不会否认，而且充分地尊重人格的力量。然而，第一，这人格也应当是一个合理的存在，也应当能被理智所阐明；第二，效法这仪型，也应当通过深彻的了解，不能只是盲目地习惯地跟从；第三，最重要的，真正具体的仪型，究竟还是社会生活，不是这个或那个的个别的人。而社会生活又就并非不要理智所能认识清楚的。

今天的社会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个不必在这里说。姑且借用一句老话“一方而是庄严的工作者，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大体上还是如此。据说这种荒淫无耻，大大地引诱了青年人，他们看到这条稳当便捷的路，觉得平日接受的知识、所指示的路都迂远艰难，遂纷纷地就彼而舍此。于是，阴谋者也就趁机站出来，说道：由此可见人格教育的重要，知识无用了，有些知识也适足以济恶了。

就这个情形来说，知识可以说是无用的。但绝对不是说一切的知识，而是说今天一般学校里所传授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僵死的，脱离了社会生活；不但不能说明社会生活的真相，反面会掩蔽它的。社会生活的全面，是庄严与荒

淫、光明与黑暗、新生与没落的交织。今天学校里所传授的知识，当然不会公开歌颂那黑暗面；然而，有意或无意地，却严密地掩藏了光明面。新生的光明的东西毕竟不那么显著，不如荒淫无耻之彰彰在人耳目。这样，青年人之易于被荒淫无耻所引诱，就是当然之势；倘不，倒是奇怪的事情。

所以，改革的道路，仍然在于“智育”的加强，以有用的知识代替无用的知识，以现实的知识代替迂远的知识，以知识的自由的探索代替死板的灌输，以社会生活的全面说明代替歪曲的描绘；绝不在于废弃知识，绝灭文化——这是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自有新式教育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我们的民主主义的、理智主义的教育传统，是可珍贵的。尽管它曾经被封建主义的残余所拖累，被半殖民地的精神所阻滞，更曾被东方法西斯主义所强奸，却仍然是——更其是可珍贵的，在青年的启导、斗争的组织、文化的促进这些巨大的任务上，我们的教育起过什么样的无可估价的作用，我们都知道，我们也不允许任何人加以抹煞。别有用心地，拚命地夸张着“教育破产”，想借口提倡“人格教育”，面把青年拖回封建教育的黑暗中，成天去静坐观心，踱方步，记功过，洒扫应时进退；这些，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知识即道德，愚蠢即罪恶。人格，决不是反理智的东西。

《新华日报》1946年7月30日

美国的教育和民主

北美合众国成立的时候，马上就认识了全体人民受教育的基本重要性。奠定美国政治制度的人们很早就开始了解，如果政府的基本决策须由人民通过自己所选的代表们来决定，那么，人民就必须握有了解问题的手段。因此，美国现在实施着的青年教育制度，大约在两百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建立了。

原则虽然很快就被人接受，但自由公共教育制度，使全体人民可以获得基本知识的教育制度真正建立起来的过程，是长久而缓慢的。虽然使全美国青年都受初级教育这一目标已经大部分实现了，确立教育制度的过程却还在继续中。民主国家的教育制度必须经常改变和改进，目前战争环境对于教育的要求，就可以很容易说明这一点。

不论在欧洲战场或太平洋战场，联合国家今天正在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英美的教育制度优于轴心国家的教育制度。那结果，可以在许多方面看到。由于人民教育程度高，美国就能够很快地重新组织全国的生活，从平时生活转入战时生活，美国就可能生产已为全世界知道的令人难于置信的

大量的军需物品，练出一支全世界最大战斗力量之一的部队。要没有民主的民众教育，那是不可能的。

那成为可能，因为在美国的学校里，青年人不但学到基本的语文和科学，学到各国的政治和历史，而且学习如何思想，如何去发现真的和假的，如何组织自己，实行合作的团体活动。美国青年在踏进学校的第一天起，就学习如何负责任，如何独立思考。不论在课程中，在学校生活中，教的都是这些东西。在美国现代化的小学中，教学的进行，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有趣的合作事业。学生学到和自己切身有关的一切材料，这样就对于学习发生兴趣。在教授各科中，经常使用问题法，把学生必须解决的问题放在学生的而前。问题的解决，也许需要参考图书馆里的书本里的一些材料，也许学生们不得不去请教镇市上的某一个商人才有办法；这之后，也许还得运用自己的数学知识计算一下。最后，教师和全体学生把各人所得的材料汇合拢来，开会自由讨论，在会上，判断了各人所得的事实和知识之后，才得出结论，解决问题。美国学校里的教师们帮助孩子们的工作很辛苦，每天都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经验。

这种教育的结果，使美国人民具有十分熟练的才能，而且一方面注重个人的责任，另一方面注重个人和别人合作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

这些本领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美国参战后的二年半中，受训练学习新的工作的人在3000万以上。美国工厂里今天有好几百万人是短短的几个月以前还没有梦想到会在工厂里作工的人。现在美国武装部队有1200余万人。两年以前，这些人之中之大多数还不知道如何使用现代化武器。但现在，他们都学会了。他们都明白为什么要学习作战

所需要的新的技术。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能力已经救了国家。

这种教育制度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小学和中学是战时许多社会活动的中心。美国小学生已经收集了几百万吨的废铁、废橡皮、废纸和废油脂。学校对战争尽了很多的力量，而且卖出战争邮票和公债票，募集了巨额的款项。中学的课程已经改动了，改得更适合于美国青年进入军队或工厂服务。美国青年满了 18 岁的，差不多全部进军队服役。专科学校和大学，没有一所是像平时一样照常开课的。美国教育制度所以能在短时期内作这些变革，因为它是由负责的和受过民主教育的人民所管理的。这些人的思想和工作，是在使教育成为人民生活中的真正的一部分，使学生的知识和品性的发展，成为民族力量的真正的工具。

的确，美国民主的基础是自由和民众化的教育。这次世界大战中，民主国家正在胜利，因为民主国家不仅教育了它的青年，而且教育了全体公民。

《新华日报》1944 年 6 月 25 日

睽睽众目岂容狡辩，屠杀学生罪责难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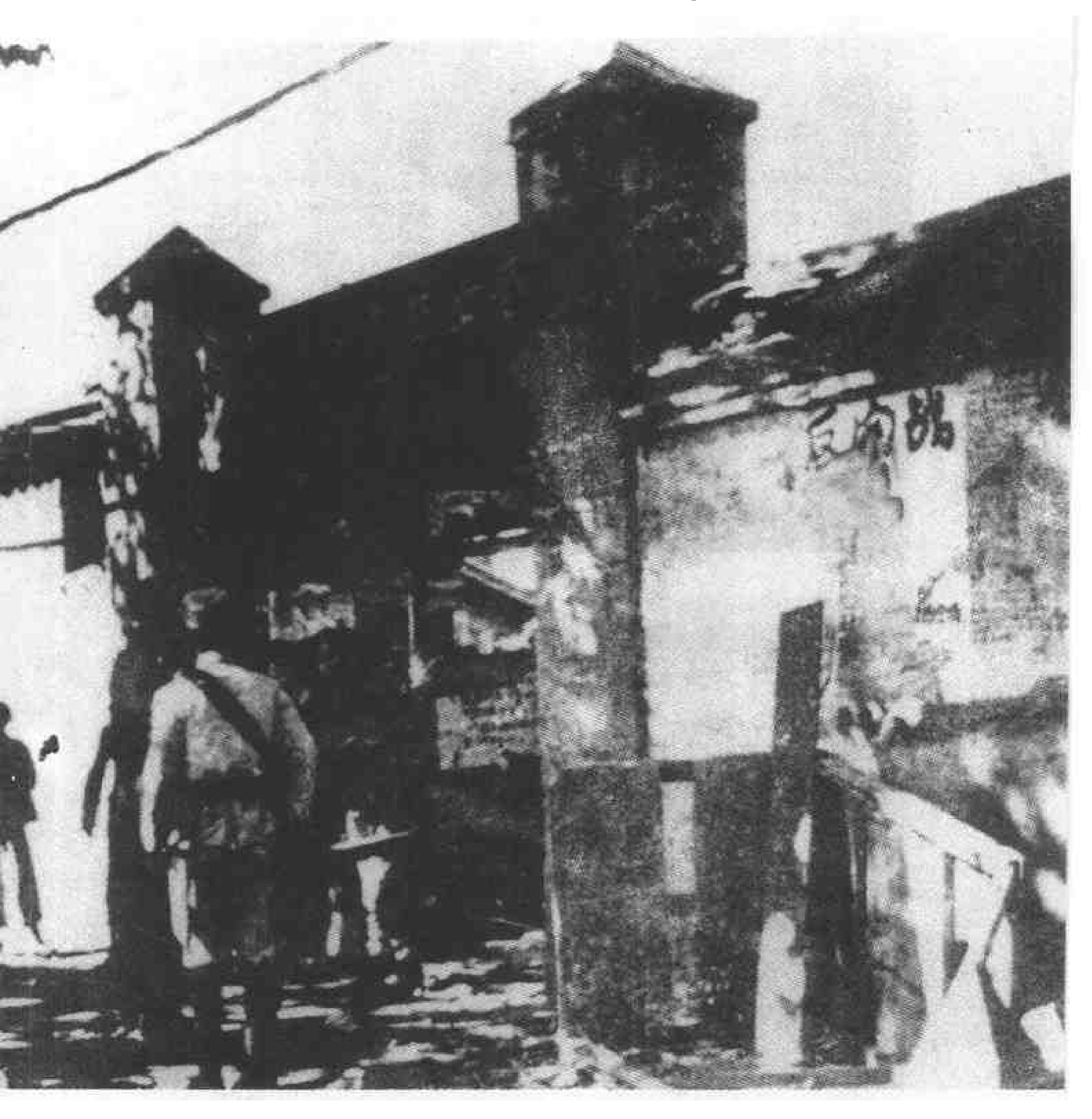
（舆论辑要）

重庆舆论界，对昆明压迫学生爱国运动案的反应，除极少数外，一致同情学生。

当云南省府改组后，就有人预言似地说："人们却更担心作为民主运动的堡垒的昆明，怕也抵挡不了特务的恐怖手段。"（见11月1日昆明民主周刊"重庆风雨"）"一二一"惨案，证实了人们的担心。当局为了掩饰其罪过，已极尽其造谣诬蔑的能事，但所得结果，却是更使正义人士愤慨。到目前为止，已经见于重庆报纸的公开声援，已有八十余个团体，个别捐款慰问的人更难统计。本市舆论界多半都有公正表示，与纯官方言论恰好成一鲜明的对照。

对学生运动的估价——反动者蔑视青年

对此次昆明学生反内战要求民主自由的运动，和平日报认为是青年的"盲目自杀"（见本月1日该报）；恰好相反，时事新报却将它比之"五四"、"五卅"、"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且问道："假使没有自五四以来的历次青年运动，谁



1945年12月1日，昆明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特务，镇压反内战、争民主的西南联合大学和云南大学等校师生，打死4人，打伤20余人，造成“一二一”惨案。图为劫后的西南联大校门。





上图：昆明各界为“一二一”惨案死难者举行葬礼。
下图：闻一多（左3）等教授为死难学生送葬、致哀。

能说中国今日是个什么局面？八年的抗战有没有支持下去的精神力量？”（见4日该报）。7日大公报虽根据与事实不符的报告来说明这件事情，但也从历史上的学生运动来说明“学生的爱国运动，都有其光荣的功绩”。商务日报（6日）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是“历史的推动力量”，认为在“某种政治条件存在”之下，“则这一性质的运动”，今日固可产生于昆明，而明日也可能焕发和蔓延于全国各个地方。”新蜀报（5日）说：“每一次学生运动，都是为了国事，实际上都是一种政潮，……昆明惨剧正是一种以学生为主的政潮。”希望政府当局“应重温过去学生运动的历史教训”，这就是说：历史上哪一次学生运动是被武力压得了的!?

“一二一”惨案的责任——反动者诿过共产党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见中央社电及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社论），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7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却证明基本人权无保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国民公报在7日社论中，也指出，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施以残杀，“云南省地方当局之未能慎为处理应该负责”。

青年有发表政见的自由，反动者却怕青年过问国事

青年应不应过问国事，应不应反对内战呢？大公报7日社论说：“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其中就有学联会的代表，可见学生是可以对国事发言的。”只有从来就蔑视中山先生

主张的人，才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是“无意义的，不正确的”（见5日中央日报社论）。内战是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也只有想以内战“统一”天下的人才怕人民“反内战”，才有“反对内战”便是“助长内乱”的奇妙逻辑（见1日和平日报）。新民报（6日）说：“学生们只不过是‘不要内战’，而阴谋分子却‘不许’学生‘不要内战’，岂不是证明这些人要内战的么？”7日该报又说：“仅仅反对内战就受到这样的迫害，人民如何能够过问国事？……这是测验政府究竟愿否让国民关心国事、批评政治，也可以测验政府对于人民所作的诺言，有没有兑现的勇气？”这些话不知那些自称为最“保障青年们读书、讨论、开会、讲演、学术研究上的自由”（见6日和平日报）的人们听见没有？商务日报简捷地说：要人民不反对内战，只有事实上不从事内战，就是老老实实“实现民主宪政”（见该报6日社论）。如果“国事纷乱，民不聊生，而青年学生犹漠然无动于衷，依旧浑浑噩噩，这可说教育已根本失败，而这个国家的生机也几乎绝矣”（4日时事新报）。“何必惶惶然如临大敌，以致引起更多的纠纷？”（同前）7日的国民公报指出这次昆明学生运动，“正是今日青年对国内政治烦闷的部分暴露”，“试问世界胜利了，我们的胜利在哪里？国际和平了，国内的和平又在哪里？”这正是青年普遍感到的痛苦。为了国家的生存与青年的前途，还不该多说几句话么？不当提出自己的意见么？只有那些一意孤行的反动者才不敢正视青年的苦痛与要求，硬栽污青年是“受了利用”、“诱惑”，说那“不是代表大多数学生的运动”（5日中央日报报论），他们把昆明学生反对内战运动歪曲为“反美”（见中央报5日，和平日报1日），欲以离间中美人民之间的友情。这种阴谋诡计是骗不了人的。“我们相信同

学们反对内战是出乎忠诚，决非一二流言所能诬蔑”（见云大教授告各界书）。名教授张东荪先生也说：“对某些不合理的事……青年学生难免要闹起来，但这种闹，是出于爱国同胞的赤诚，结果竟发生惨剧，是十分遗憾的。”（见7日国民公报）“近日官方电讯，对学潮事实，竟存扭曲，颠倒黑白，似在扩大政治纠纷，使问题无法解决”（见民主同盟发言人谈话）。是非曲直，有目共睹，任你多少空口谎言与滑稽“把戏”，也掩不了血写的丑行！

对青年应有民主态度——不可强加诬蔑，动用武力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除极少官报）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青年，千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并当保障其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7日的大公报说：“今天是民主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治，正应该向民主大路上走，而民主精神，就是要多数人民关心国事，参与国事，在此前提下，政府可不必压制人民关心国事。”时事新报也认为，对待青年“不当心存忌怕”；“不可强行压制”；更“不可强加诬蔑……指为某党某派”。新民报（4日）说：“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我们主张在学校以内应当让我们的学生尽量自由，……我们以为青年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态度，不应躲避隔绝，而应多研究，多辩论，以期真正了解，我们的政府正在实施‘民主’，我们以为这一点思想学术的自由是应当有保证的。”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希特勒的法宝应该收起了

成都各大学学生为声援昆明爱国学生运动，于9日召开追悼昆明遇难师生大会，并在会后举行游行，经过情形，已见昨日本报成都通讯。

这是合情合理的行动。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反对人民的任何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在昆明，采取了“嫁祸”阴谋，制造出一个莫须有的“姜凯”，把屠杀学生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捏造了若干“文件”，说共产党“指示暴动和学潮”，又说民主同盟如何如何，这样地把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放在一起，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扩展其摧残压迫一切为争民主的党派和人民的“根据”。这种阴谋的一演再演，这种阴谋的毒辣阴狠，对民族的危害，真是大到万分！这种阴谋，只是更加在人民面前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恶面目。

我们曾经一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有一套荒谬的逻辑，就是把所有反内战争民主的人士都指为共产党，而把反内战争取民主的任何行动都诬为共产党的“阴谋”。他们企图造成“合法”借口，来实现自己假“戡乱”之名进行内战之实

的反动政策。他们不惜用流血的手段来对付昆明手无寸铁的学生，就把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套逻辑完全揭穿了。现在为了准备又一次用流血手段来对付成都的学生和一切主张民主的人士，所以，他们就又祭起这套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法宝了。真是卑劣无耻到了极点！

奉劝国民党反动派们：希特勒是学不得的，希特勒的一套“栽赃嫁祸”的法宝，已经到了收起来的时候了！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4日

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

近年来，很多大中学校中有“民主墙”的设置，这是一个好现象。但假如只有在这一垛墙上才有民主，那就不能不使人有民主太少之感了。民主墙的精神应该发扬，使整个学校，每一个学校都成为民主的堡垒。

说学校要成为民主的堡垒，这就牵涉到学校是否要和政治牵连，学生是否要过问政治的老问题。但这其实是不成问题的。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并不是要把学校卷进政治的漩涡，让学生成天去做政治的活动。恰恰相反，假如办学校的人及教师和学生不一起努力来使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结果就使得学校完全落到政治上的坏倾向的支配下，也就使得学校既不能好好地教，也不能好好地学。

这几年大后方学校的教育情形可以做最好的证明。据说，有一个大学的负责人自负为“以办党的精神办学，以招兵的办法招生”。又有人说，有的学校拿了国库的经费，却只在培养“升官、发财、造谣、生事”的人才。这话也许言之过分，然有着这种情形，不能不令人痛心。并不是没有认真办学的人，但是他们被当做教育官署的下属，经常要应付



1947年"五二〇"血案，反动军警殴打游行学生。

各方面来的公函训令，一会儿要注意那几个教员，一会儿要严防那一些学生，试问如何能叫他安心办学？也不是没有认真教书的教师，更不是没有认真读书的学生，但是反民主的政治用恶狠狠的面孔高压着他们，监视着他们，威胁着他们，叫他们如何能安心地教书读书？在这种情形下，不学无术的官僚可以主持学校，靠面子有后台的人可以当教授，挂起手枪横行不法的学生可以坐享公费。这简直可以说是斯文扫地。假如不改变这种情形，恢复学府的尊严，后患何堪设想！

很多人慨叹近年来学校国文程度的低落。其实何止国文？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程度的低落。学生试卷上暴露出的对于社会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无知，那决不应该做为笑话来传



北平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

述。应该使人痛心地感到党化教育的贻害。中国现在已进人和平建国时期，没有千千万万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做中坚，谈不到建国。学校的任务太重要。中等学校要培养出大量的有科学知识的初级人才，大学要培养出大量的有科学知识的高级人才。国家要建设，必须要安定；学校要培养人才，更非安定不可。使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意思就是要使学校的内部安定，不受政治外力的干涉、扰乱和破坏，让办学的人能安心办学，教书的人安心教书，学习的人安心学习。

和平建国纲领中在教育项内规定“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又规定，“根据民主与

科学精神，改革各级教学内容”。这规定很切要，也就是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使学校能负起培养建国人才的责任。能够做到这样，学校就成了庄严的民主堡垒。学校行政受外力干涉，教学内容受党化思想的规范都是最有害的事。此后，学校应该让真心从事教育事业的学者去办，西南联大所行教授治校制极值得赞美，教育行政机关只能处于辅助地位，党部、团部更无权干涉。大中学校长成为委任职的官员，是极坏的制度，尤其是大学校长更应是极荣誉的职位，只有教授与学生的公意才能决定其去留。此后，教科书的统制应该取消，让学者根据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而自由地编撰，在党化精神下所订的各级学校课程标准，应该征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的意见进行修改，学校内教师讲学、学生讨论的自由应该做到充分的保障。此外，现行的统一招考，教育官署审定教授、教员资格等制度也是变相干涉学校行政，也没有保留的必要。

有了民主的空气就能有安心教学的环境，就能促进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发展。学校内部情况的变革固有赖于外面的政治社会的进步，但学校是应该做移风易俗的先导的。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够给中国带来民主与科学的福音，首先使学校变成民主的堡垒。

《新华日报》1946年2月6日社论

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

今天是“五四”27周年纪念日。

27年前的“五四”运动，在反帝、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之下，曾经猛烈地反对旧政治、旧文化、旧礼教，实行了空前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民族自觉的新民主主义纪元。从“五四”以后，在中国表现得如此的明显。一方面，新的文化、新的群众政治运动，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首，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在曲折崎岖的道路上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旧的政治与文化被群众强烈的打击之后，买办官僚的代表又从东西洋运进一些法西斯主义的货物，在旧专制主义的基础上，再加上那种法西斯主义，以继续压迫人民，戕害青年，并企图从此完全埋葬民族的智慧。自民国十六年“四·一二”国民党右派举行法西斯政变以来，剥夺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思想自由，新文化战士及青年为之而捐躯的数目，在中外古今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八年抗战，在国民党一党统治区域，为爱国与民主而奋斗的青年，被法西斯派劫杀，依然是无数的。在那里一切讲学、读书、出版、发行的自由，被残酷地摧

残。复古成为时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学校中，秘密侦探、欺诈迫害、武装威胁、金钱收买的特务作风，盛极一时，教育与学术的尊严，扫地以尽。一切知识分子完全失掉做人的自由。无论在街上家内，好好的一个人会被突然抓去。集中营里至今还关禁着数万无辜的青年。然而同时，中国的光明也毕竟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涌现出来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把大片的土地从敌人的魔手下夺回来，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保证了文化方面的彻底改革。造成了新文化发展和大众化的新天地。

一方面是青年人、文化人没有一切的自由，思想有罪，爱国有罪；一方面是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青年思想的活泼发展。这一个对照，已经最好地说明了一切。

它说明了：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

它说明了：法西斯主义与民主、科学，与自由思想永远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万恶的纳粹党徒戈培尔说过一句法西斯主义的格言："当谁在我的面前讲起智力的问题，我立刻就要拔出手枪来。"这句话，实际也正是为中国的法西斯派所从来信守的格言。因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吃人，就是恐怖的统治。所以它们在政治上、文化上极端仇恨思想与理智，而极端歌颂野蛮、独断与盲从。中国法西斯派有一条独断的根本教条，叫做"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按照中国法西斯派的规矩：大家一听到那代表法西斯派的"一个领袖"，就必须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表示愿在这"一个领袖"的叱咤



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开始全国大逮捕，在武汉打死3名学生，制造了“六一”血案。图为6月2日武汉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

之下；只要是少数买办官僚寡头的利益，就要无条件服从，视之为“民族的利益”。多少年来，中国法西斯派拼命把这种罪恶的教条灌输给纯洁的青年，一切不接受这种法西斯主义特制的思想模型的，都是异端，都被认为该杀。拿着枪杆对着中国人民的脑袋，这就是中国法西斯派的政治与所谓“文化”。

"五四"已过去二十七年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仍然是辉煌的。完全推翻中国法西斯派的压迫，争取全国的民主，打碎思想统制，使得中国完全新生，这是一切民主人士、进步人士的严重任务。

今天，中国人民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处在一个严重的历史关头。从昆明血案到南通血案，中国法西斯派公开无所顾忌地犯下了一连串的血污罪行。这一连串的青年被杀被捕的事件，是和当前中国的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之争联结在一起的。历史证明：中国青年是不可征服的。"五四"以来，他们反抗外来的法西斯侵略者，反抗国内的法西斯压迫者，站在英勇斗争的最前线，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今天，中国青年更要再接再励起来。

中国青年纪念这"五四"的伟大历史日子，应该更进一步地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来武装自己的思想，应该用毛泽东这个伟大的人生观来充实"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使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获得更坚实的新内容，更明确的新目标。我们要求的民主，就是人民的民主；我们追求的科学，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中国青年必须培养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才能真正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战士。

各解放区的青年要为人民服务，把中国和平民主堡垒的解放区建设得更好！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要为人民服务，坚决打击中国法西斯派的进攻！全国的青年们团结起来，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旗帜下，消灭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向着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的目标前进啊！

《解放日报》1946年5月4日社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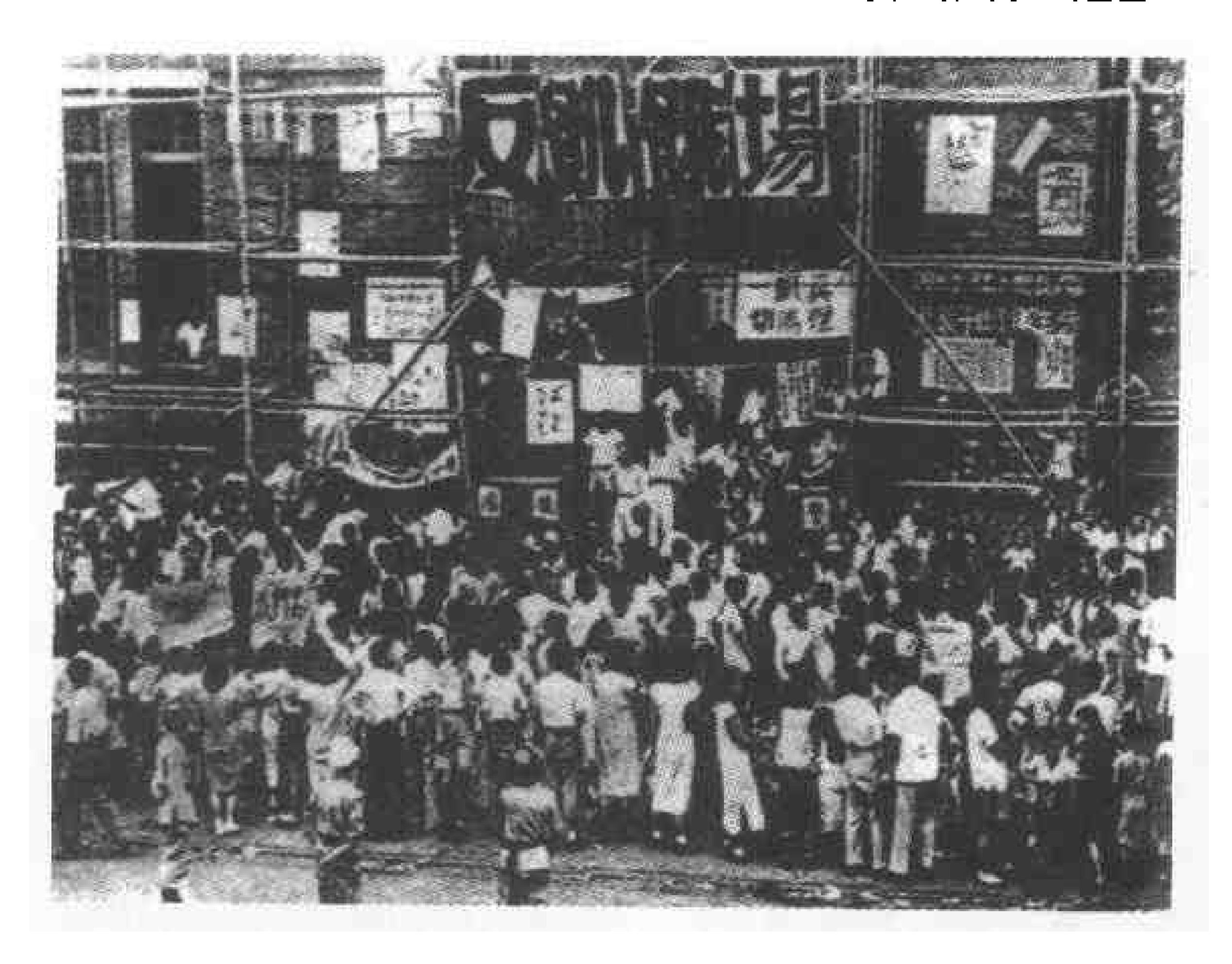
争取自由解放的中国学生

——世界学生日献辞

今天是第五届世界学生日。

1939年的今天，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法西斯匪徒，在捷京屠杀布拉格大学学生九人，教授二人；其他各校的男女学生也遭受到机枪扫射、殴辱和监禁。到1942年今日，世界各国学生代表在华盛顿集会追悼，并决定每年的今天为世界学生日，全世界学生应举行纪念，以警惕法西斯的罪行，肃清法西斯的残余，防止法西斯再起，同时激励全世界学生，永远不忘团结起来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共同为一个和平、民主、进步的世界而努力。

法西斯匪徒为什么要屠杀学生呢？这没有别的，只是因为不甘做法西斯奴隶的学生是每个被侵略国家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勇敢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先锋。因此，学生总是法西斯的眼中钉，而法西斯也是学生和文化的死敌。但是法西斯匪徒是不可能用屠杀的残暴手段，把学生的反抗镇压下去的。捷克学生终究保卫了他们的祖国，而德国法西斯匪徒却被世界人民的联合力量打败了！



1948年5月，上海小学教师举行反饥饿罢教，在市教育局门前示威。

像反法西斯各国的学生一样，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为打倒法西斯侵略者而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在敌人投降之后，美国却又取日本的地位而代之，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内战和独裁的路线，中国学生又被挪入没有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境地中！

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们既过着困苦的生活，又失掉一切自由。例如北平各校学生天天有绝粮之虞，京沪及其他各地学生因为缴不起学费和物价过高而纷纷退学。在校学生多因营养不足而而黄饥瘦，精神颓唐。学校设备简陋，教师待遇菲薄，致使教学无法顺利进行。至于言论、集会、研究、

信仰、人身的自由，莫不受到摧残。任何人都还记得：复旦大学学生因壁报言论触犯忌讳，既被特务抓来罚跪殴打，又被学校当局加以处罚；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在校内集会，竟被关麟征指挥军警开枪干涉，甚至又派兵士冲入学校，用手榴弹打死学生四人，重伤多人，造成有名的“一二一”惨案。此外，迫害学生思想自由、人身权利的事件，真是不胜枚举。在解放区，学生们虽然没有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摧残，但，由于国民党飞机到处轰炸，国民党军队四出侵扰，使得他们不能安坐读书。这一切，就是在法西斯侵略者被击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给予中国学生的报酬。

不仅这样，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卖国，使抗日胜利后的中国民族地位又一落千丈。美国宪兵可以公然在北平街上枪击中国学生；比“二十一条”还要丧失权益的《中美商约》，更重重地打击了中国学生对于民族独立的愿望！特别是在国民党当局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扶助，而片而召开一党国大制造分裂的局势之下，新的民族民主危机又尖锐地提出在中国学生面前了。

中国学生不能驯服地做法西斯统治者的奴隶，也不甘受帝国主义者的践踏，尽管国民党当局为了禁止学生反对他们的卖国、内战、独裁政策，用尽一切方法来愚弄、镇压、欺骗中国学生，但是中国学生的积极战斗性是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的，它是吓不到、压不了的！压力愈大，反抗愈大。“五四”运动以来30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民运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

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国民党当局不但倒行逆施，压迫人民，摧残青年，还更狡猾地，喜欢在自己面孔上抹上一些民主的脂粉、进步的唇膏，装得自己好像不是法西斯，不是反动派似的。所以一方面他要破坏政协决议，大打内战；另一方面，他又要召集一个御用国大来制定一部伪宪法，以使他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同样，他一方面，残害青年学生；另一方面，却又扭扭捏捏地表示重视“世界学生日”，还要假装说点爱护青年、反对法西斯暴行等面子话，以把他打扮成为一个“进步”的“民主”战士！这种两面手法是反动派的惯技。但是在反动派摧残青年、屠杀学生事实的对照之下，它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看着已经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铁蹄下得到彻底民主解放的捷克学生们，看着全世界许多过着和平、民主和幸福生活的学生们，中国学生应该再接再励，击退最后这一个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争取中国青年完全的自由解放！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社论

Ⅶ

天赋人权　不可侵犯

切实保障人民权利

从来的革命运动都是人民争取民主的伟大运动，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只在于要不要民众，给不给民众以民主自由。对于英勇斗争中的中国，民主始终是团结与进步的基础，因为离开了民主，就不能团结全国人民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民主，也就没有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

这是为什么边区施政纲领明确地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责成当选为行政人员的共产党员应坚决执行之，并指出"人民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可以想像得到，在帝国主义借战争的掩护把人民从多年斗争中获得的民主权利剥夺殆尽的时候，在中国大资产阶级实行高压政策，以致人民的人命、财产、自由没有一点保障的时候，在陕甘宁边区从过去的民主传统向新民主主义的路程前

进的时候，这样的尊重民主自由与保证它的彻底实现，是具有怎样伟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对犯过错误而愿走向光明的分子采取宽大的态度，禁止不经过法定手续来逮捕、审问、处罚任何人，反对把人拖到卑鄙无耻的道路上去，用这些事实来使得人权得到充分保证。我们决不空谈保障政权，而是真心诚意地要人民起来参加政权的管理，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提高民意机关的职权与威信，建立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并实行三三制，保证民意机关与行政机关中的人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我们决不空谈保障财权，而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做到保护私有财产，奖励私人企业，严禁随意动员征发，实行合理的统一累进税收制度，维护农民从过去土地革命中获得的利益，保证佃农、债户向地主与债主交租交息，使得一切抗日人民都能安居乐业。这样就不只是给人民带来了美丽的希望，还真正地要他们享受到新民主主义的果实。

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边区过去早已注意保护，今后仍当循此前进。只要是抗日的、有利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言论与出版物，无论是出自任何抗日党派与团体个人，都有发表与出版的自由，政府还给予使用会场与印刷机器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不会有思想的统制，我们鼓励自由研究，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欢迎边区境外愿做抗战工作人士来此开办学校，设立出版机关，组织文化团体，并且给予必要的帮助。人民不仅有



1941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召开第2届参议会。林伯渠（前排左2）被选为边区政府主席，非中共人士李鼎铭（前排右3）被选为副主席。图为全体参议员合影。

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有武装自己的权利，我们不怕人民的组织与活动，只怕他们不能积极动员起来。我们要保障的居住与迁徙的自由不是消极的，因此，我们帮助外来移民解决他们各种困难，保护因革命行动被迫来到边区居住的人民，救济流亡学生与灾民、难民、使得他们不仅能够自由地生活，还可以幸福地生活。只有这样，才真正地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权利。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高举起来的民主旗帜，是飘扬着多么鲜明的色彩！

仅仅政府明令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是不够的，公务人员知道要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还是不够的，必须人民自己珍惜这种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才能获得的权利，要求它在边区得到切实的保障，并把它推到全国的范围里去。

当广大的人民掌握到民主自由的权利时，它不仅成为物质的力量，还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法治与人权

一、立法必须依据人民的公意创制

衡阳《大刚报》："……一般对法治往往有所误解，以为法治之极，只在要求人民守法。其实法治和非法治（人治）之分，初不在法律之有无，亦不在人民之是否守法。真正的法治和非法治的分别，是在于这所谓法，是否最后渊源于民主的公意？这所谓守法，是否执法机关的本身行为也须依照一定的法律？而法治之极，则不在人民是否守法，而在执法机关的政府本身的一举一行，是否悉合法度？""法治的真义，不在人民是否有法为'守'，而在政府官员之是否依法为'治'。然则怎样才算真正的法治？从政治学的一般的观点看来，至少有下列几点：法治状态下的所谓法，最后必依据于人民的公意而创制，故法治必须以民主为其内涵，倘法律最后决定于个人或少数人的意思，则一切依法，便成为毫无意义……。最后而最重要的一点，即在法治之下，一切合法进行的公私行为，非依法律，绝对不能变更之。因为法治的起码要求，在于建立合法的社会秩序，合法的社会秩序之所以能建立，在于一切合法的行为，受到法律的保障。"

二、真法治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

云南《正义报》："所谓法治，即建立一个健全的法度，

这个法度是全国人民所共同议决的，也就是全国上下，都要在这个法度的规范之内行动，任何人不得违反，任何人不得加以变更。”“我们认为今天问题的关键，倒不是要不要法治的问题，而是要哪一种法治的问题。因为法治有真法治和假法治之分，这是我们不能不加以分别清楚的。什么是假法治呢？我们且看封建时代，同样有一套法律，可是这个法律是为了便利控制人民而设的，皇帝及其特权阶级是站在这个法律之上的，他们可以执行法律，也可以抛弃法律；他们可以创造法律，也可以毁灭法律。换言之，法律的执行是他们束缚人民的工具，而他们本身则可以不受法律的支配。”“什么是真法治呢？概言之就是建筑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而作为民主政治之表现形态的法治，它必须具有这几个特征：第一，国家必须有一个真正上下共守的根本法——宪法；而从这个根本法所派生出来的一切法律，也为全国上下所一体共守……。第二，宪法的作用，主要在保障人民的权利，而限制政府的权力，防止其滥用权力。故国父中山先生说：‘宪法者，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在这种原则之下，诚如中山先生所说，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它没有无限制运用法律的权力，它必须受宪法的支配。同时，在宪法的规范之内，它必须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得侵犯。第三，选择保障人民权利的宪法及其所派生的一切法律，其制定权、修改权及废止权，应当掌握在人民手中，或委诸代表人民的民意机关。同时，政府当局不仅要受人民的监督，而且人民应有选举及罢免之权。一句话，要认真实行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要行使直接民权，使人民获有选举、复决、罢免、创制之权。”

三、应有一可守的法

柳州《阵中日报》："厉行法治，先要养成守法的观念及具备完善的法典，人民方能了解法律的重要，然后有所重知所守。惟有法可守而人民能守之，方够得上真正的法治，其所遵守者方为真正有价值的法律。""中国历史辗转于封建专制的束缚之下，政治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部完美的法典。……封建时代，'天下一家'，帝王为一切人的主上，即区区一个县官，也号称'民之父母'；'圣旨'便是法律，'宪谕'尽成典章。民国以来，诸法纷立，可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至今没有正式产生。……欲期法治真正建立，则于逐渐养成法治精神以外，一部为人民共同要求的良好宪法决不能不早日具备。""抑法治和治法互为因果，不是说法律产生于先，法治即必然兴起于后，须知徒法不足以行，法律究竟是死的条文，非另有一种制度，即法治和实行法治所寄托的根本——宪政实行以后，法律固难以发生充分的实效。""官吏的敢于违法，人民莫从检举，就政治的角度视之，又为法治制度的根本——宪政没有实施之故。所以重申法治精神，诚为实施宪法的张本。但最后完成法治，仍有赖于宪政的实现。二者互为结果。也互为前提。"

四．立法精神要大公无私

成都《华西日报》："要想国民虔谨奉法，必须对于立法与执法的各个方面，均须详为考虑，乃能收效。先就立法而论，应当以'立德'作基础。所谓'立德'也者，一种法令精神，应当以最多数的最大幸福为出发，而不能含有任何偏私之用意，同时还应当切实体检国民之实际生活环境，勿使

法令有任何　格难通之处。”“其次谈到执法，政府当首重‘立信’……，假使朝令夕改，假使不能公平贯彻，某甲可以逍遥法外，而某乙却又尽法惩治；或者今日之诺言，明日即成废话，而不能使人民发生坚强之信赖，则人民之玩法恶习，必难根除。”

五、先决的问题是保障人权

成都《新中国日报》：“要变宪政，谈民主，必先要保障人权；要人权得到保障，则必须有一定的法纪，所谓法治轨道是也……。”“要建立法轨，保障人权，行得彻底，行得普遍，不只是一道命令、几番条告便可以成功，便可以使玩法违法者有所畏惧。”“要法轨和人权被尊重，必须人民自己起来监督官吏，必须实现民主的监察制度。人民一日没有权来监察政府，特别是下级机关的行动，则人民身体自由的保障，虽重申、三申、四申其法令也是空话。”“要建立法轨、保障人权，必须先使人民有言论的自由。违法犯纪的事无论大官小官，人民都不能秉笔直书，把他宣布于报纸，则贪顽之徒，不啻得着了保障，而社会舆论便不能表示公是公非……。因之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是不可分开的，我们希望言法轨与人权者同时加以注意。”

《新华日报》1944年7月20日



1949年1月10月31日，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的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图为中共代表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讲话。

保障人民自由的开端

国民政府蒋主席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日，宣布了《政府决定实施的事项》四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关于保障人民自由的。这个宣布深得各方面舆论的欢迎。不过我们也需要指出，政府当局在抗战中和抗战结束后宣布保障人民的自由已经有好几次了。远的不说，较近的如三十三年八月，当局就曾颁布过一次保障人身自由条例，最近的是在三个月前的双十会谈纪要中，当局又一次表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但是政府当局这种诺言并未兑现，其中道理何在，现在我们也不必再来深究。无论如何，这些基本自由本是在一般民主国家中人民所应享受的最低限度的权利，政府无论用什么理由，只要是侵害人民的基本自由，在民主国家中是总不能容许的事情。我们自然希望这回不再落空，当局如果真有与民更始的决心，就不应再行拖延，或另行前提条件，而应立即切实地做到。

政府当局要使人民的自由权利得到保障，其实是不难的

事，无论如何，这比束缚人民的自由权利要容易得多。过去政府当局为了限制和妨碍人民的自由，真可说殚精竭力，用尽了一切办法。既订立种种法令，使得人民动辄得咎；这还不够，又另外想了许多办法，设立许多机构，以补法令之不足。本来，在政府机关中的公务员，都是“公仆”，这些“公仆”都应该为人民服务，可是在中国竟有为数很不少的“公仆”，专门以迫害人民为本领，难道真是中国人民的命运不好么？国家的财政一向都很困难，但在拮据的国库中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却用来残害人民。譬如拿过去大后方的各大城市都有的新闻检查所和图书杂志审查处说吧，每一个这种机关中的人员，都比一个大报馆的编辑部还多。现在这些“公务人员”又纷纷到“收复区”去办同样的事了。而在大后方各地，航空邮电检查员至今还在忙于检查和没收。为了控制纸张、印刷所、会场、出版所，当局所费的人力和财力更是不可胜计。官办的出版所，虽然出版品不受欢迎，但仍无限度地赔钱，无所顾惜；官办的团体，虽然得不到群众拥护，仍大量地给以津贴，这都无非是出于包办一念，要使人民的出版和人民团体活动困难。还有庞大的特务机关及其所属的集中营等等，更不知道每年要从国库中开支多少经费。这一切经费从何而来，还不都是人民的完粮纳税的聚积么？以人民的血汗来养活许多迫害人民自由的人，来创立许多压迫人民自由的机关，天下还有比这更不合理的事么？

当局花了这许多人力、财力，究竟收效如何呢？结果只是证明了一句老话：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民到底是不会在强制的力量下面屈服的，人民的进步意志终究还是缚束不了的。现在政府既已作了改弦易辙的表示，那么第一步做法就应该是立刻放弃一

切害怕人民的想法，取消一切为了束缚人民自由而设的法律、办法和机关。这是最不花钱、最不费力的事。只要当局有决心做，立即就可以做到，决不像束缚人民要费那么多的手脚，花那么多的人力、财力。

蒋主席所宣布的第一条关于"人民之自由"说："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由此可见，政府当局也已承认蹂躏人权的特务机关不应再存在，妨害人民的法令不应再有效了。在这方面，人民也应该帮助当局来考虑，哪些法律条例、哪些措施、哪些机关都是残害人民自由权利的，——公开提出。事实上，人民已经这样做了，如出版界指出现行出版法应该废除，对收复区的民间出版事业的限制法令也应该取消。只要人民的建议的确有事实根据，符合民主的原则，政府就应立即采纳，立即实行。取消过去一切妨害人民自由的镣铐，就是保障人民自由的最切实的开端。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3日社论

平民人身自由
是政治民主的标尺

昨天本报和别的几家报纸都刊载了一段本市新闻，说是朝天门屠户张德操家在本月4日被保安队的几个警士借口捉赌，劫去钱财。事后张德操和他的弟弟及街坊三人（其中有一个是保长），反被拘押毒打。这十几个警士是派驻民食供应处仓库的库警，依理根本没有在夜间侵入民家捉赌的权利。出事时，当地保长签署证明书，证明张家并未聚赌，且有卫戍总部稽查处水上检查所人员到场目击并无赌具，则捉赌之说，显属无稽，但纵然真是赌犯，也绝对不能把本人及其街坊和保长一起关在警察局里，毒打成招，而且还不准其家人探视，比对付江洋大盗还厉害！所以这件事情的是非是很清楚的。无怪乎张德操的家属和该街居民百余人要到卫戍总部王总司令公馆门首伸冤，又拦截汽车、呈述冤状了。

这样的事也许算不了是新奇的事。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受冤屈，被栽诬，遭虐待，简直已习以为常了。但正因为这类事情一向层出不穷，我们更不能不唤起社会的注意。就在同一日《大公报》上又有中一路永新服装店被一群也以抓赌为



国民党政府的监狱“中美合作所”正在被上刑的政治犯。

名的军人冲入，损失了数十万元的消息。军警可以不经过任何手续而冲入民家，人民有什么居住自由可言？人民的财产可以这样地被劫掠，还有什么私有财产的保障之可言？对平民的拘押拷打，如此随便，又有什么人身自由可言？假如政府和法律竟不能保障人民的人身、居住、财产的自由权利，叫平民怎么能安居乐业？

据说，这一案的被害人家属现已聘请律师向法院起诉，卫戍总部王总司令对此事也极为震怒，想来法院与当局对于这样一件事，应该能很好地处理吧。由这一类事件，我们更不能不感到，政治、法律各方面的除旧布新实在不容稍缓

了。假如兵士、警士在平日的生活较有保障，又经常施以卫国爱民的教育，经常督责他们以爱护人民为天责，就不至于发生这种骚扰民间的事情。在张德操家保安队的一个队长曾向到场的卫戍部人员说："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大家不要为难"（《商务日报》所记为"我们军警原是一条阵线"）。这话分明是把军警看做是在一条阵线上共同对付老百姓，岂是卫国爱民的军警说得出口的？又假如现在各方所主张的《损害人民自由治罪法》早日颁布，且根据此法严办几次，则虽有不法之徒，也会有所忌惮，不敢胡作乱为了。再假如政府早就宣布的提审法已经实施，并且法院对平民诉冤给以最大方便，使人民感到法律真是为保障平民而设，那么虽有冤狱发生，也立即可得到法律的保障。保障人权，严禁非法拘捕，实施提审法，改革司法，这都是在《和平建国纲领》中明白规定的，都该快快实现才好。

假如实行民主而不能使普通老百姓个个能安居乐业，免于强暴侵凌的危险，那么民主还是落了空的。所以我们断不能把张德操案以及其他与此类似的事件看做是无足重轻的社会小事。

《新华日报》社论 1946 年 2 月 8 日

集会、结社自由的实现

国防最高委员会在1月28日通过废止的38种法令中，属于集会、结社自由的，有14种之多。其中应由国民政府明令废止的有《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共产党人自首法》《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共3种，规定由原公布机关废止的还有11种。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国府及各原公布机关的废止这些法令的明令。想来总该马上能做到。让我们来看看究竟为什么这些法令要废止，废止了对人民有什么好处。

所讲《共产党人自首法》，自然是在各党派不能取得合法平等地位时的产物，和民主原则根本违背，当然应该废除。至于别的13种法令，也都是对于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加上了一重严格的束缚。所以的确是非废除不可的。我们可以指出这些法令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害的几点内容。

首先，这些法令对于人民的集会、结社加上了极严格的特许制度的束缚。本来集会、结社自由是人民基本权利之一，不能稍加侵犯的。英、美民主国家的人民集会、结社，是无论性质、地点及参加者的职业、性别如何，事前均无须

请求警察许可，亦无须报告警察。假如参加集会、结社者有违犯普通刑法的行为，则亦按普通刑法治罪；否则，听其自便，在所不禁。但是，在我国就与这完全两样："各种人民团体组织之成立，无论下级团体或上级团体，均应先经政府之许可"（《人民团体组织纲领》第四条）。在《人民团体开会规则》第二条也有同样的规定："……每次开会应于会期前将开会事由、时间、地点等呈请该主管官署……"。这就是把人民的基本自由交给行政机关控制，人民要集会、结社，必须去请求"恩准"，反之，就构成"犯法"行为。可是，现在既然废除了这些法令，那么，这种不合理的"特许"制度就不应存在了。人民可以自由集会、结社，不受单行法令的束缚。

其次，这些法令又赋予军警宪兵及行政机关以任意干涉和解散人民集会、结社的权力。所谓《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就是在民国二十九年为此目的而设的。规定警察可以有权随时命令一个集会、一个人的演说中止。又如《非常时期团体组织纲领》第一条上规定："各种人民团体，除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政府主管机关之监督外……并受军事机关之指挥"；同时也有"明令解散"之权。这样，凡主管官署认为不适合的就可任意加以刁难或解散。以如此广泛的权力交给官署，便是给以侵害人民自由的全部权力。所以英美警察在平时就根本没有解散人民集会结社之权的，只有认为某种集会可能发生骚乱时，英国警察才可以禀准内政部，当场宣读骚动法，使会众自动解散；假如警察机关判断错误，还须负一定责任。美国的法律亦大致如此。显然地，两相比较，英美是合理得多了，我国的作法是要不得的。这次政府当局既已通知过废止，当然就是把所谓"主管官署"

的这种权力取消了，不再给军警机关以侵害人民自由的“令法”权利。

最后，由行政官署委派民众团体中重要主持人员的制度，也是在这些法令中规定的。人民集会、结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组织的形式，选举与任用一切负责人员，而不应该遭受外力之牵制与干涉。可是，我国过去就不是这样的，政府硬要指定职位，派遣人员，比如在《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第十条确定：“各种职业团体应设书记一人，以曾经特种训练合格之人员充任，……得由政府指派”，其职权是：“负推进各该团体各种活动之责任”。这一来，纵然除指派职员外，民众团体另外还选出了大家信任的人物，也还是没有用处，因为已给政府指派的“书记”一揽大权，全都包办了，这还说得上什么人民团体呢？这种制度当然也不是应该可保留的了。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法令未废止前，中国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既受到特许制度的束缚，又随时会受军警和“主管官署”的干涉，经常会务也常为官派人员所把持；另一方面，在废止了这些法令以后，一切束缚人民自由的行为已失去法律的根据，那么，人民就应该努力把已失去多年的自由拿到手，而且立即把它运用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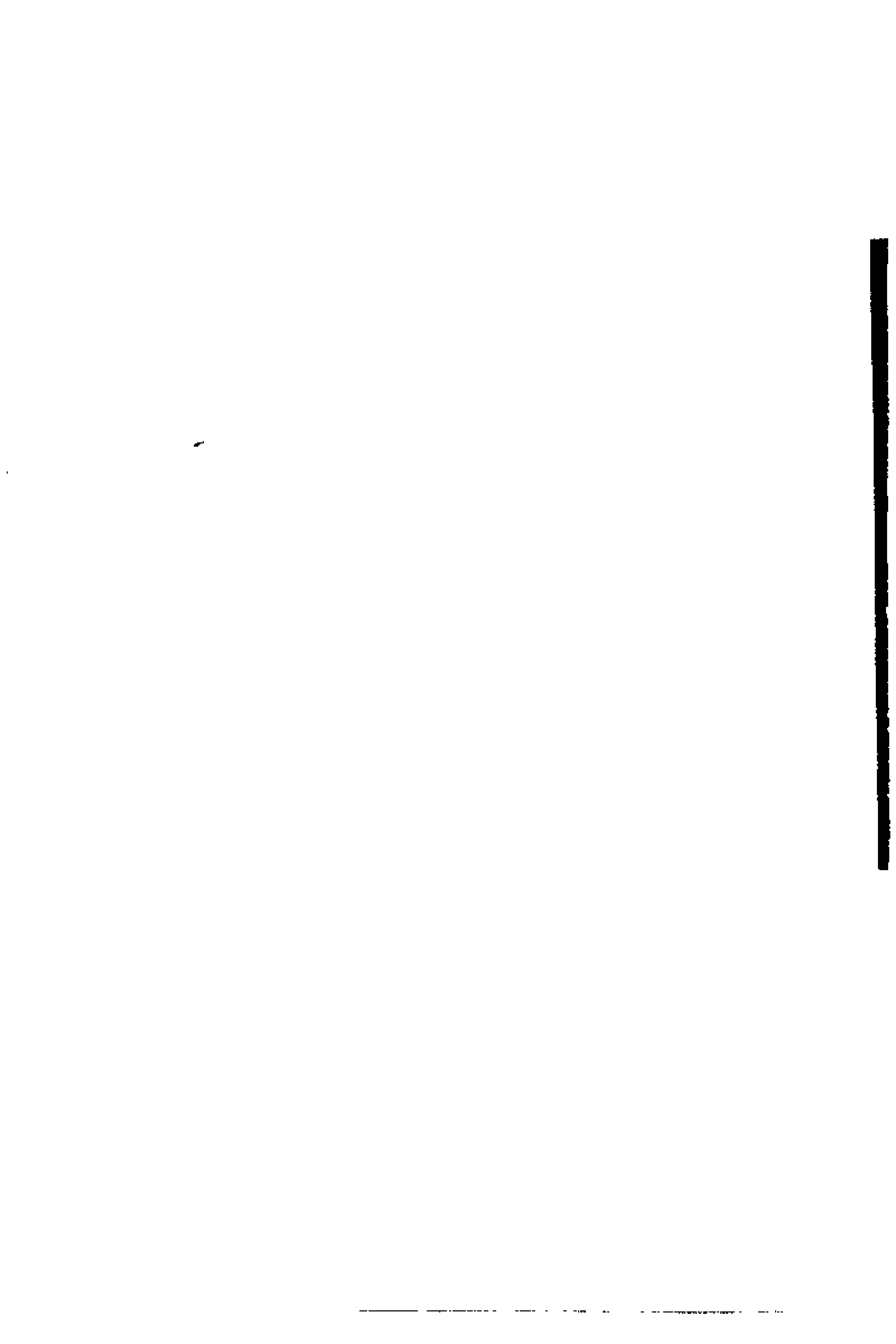
我们希望，政府方面赶快把这些已决定要废除的彻底废除，并且继续审查是否还有别的同类的法令也应废止，在这次决定要修改的法令中，有3种是关于集会、结社的。当局到底准备如何修改，也希望快快公布，因为这3种法令原文也有种种极不合理的定规。如《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中规定“人民团体之组织，应由发起人向主管官署申请许可”（见该法第十条），这和已决定废止的《非常时期人民团

体组织纲领》中的规定也是一样的，也应该废除才好。又如工农组织团体，在《工会法》、《农会法》尚未废除的今天，也照样有法可凭而加以限制的。因此，我们希望彻底废除这些法令的束缚；我们人民也尽量帮助政府，搜集这方面的法令；提供出来，请求政府以明令废止。

在人民方面，在恢复了自由的时候，为了运用这些自由，就应该充分运用起来，因此，就可以成立各种必要的团体会社，并且依法改造和充实原有的人民团体。过去的人民团体，内部的组织与人事，可能有很多地方是不合民主原则的，不适合各该团体会员的要求，就可以根据各该团体会员的意志来加以改造过，使它成为名符其实的人民团体。

集会、结社自由的根本权利，又重新回到人民手里来了，我们应该好好地运用它，发展它，让他在整个民主建设事业中，表现出更辉煌的成果来。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社论



Ⅷ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毛泽东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个会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

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要坚决地彻底地破坏这些东西，而决不有丝毫留情。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与"小八路"交谈

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刚才吴老同志的话，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个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是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所说的新民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

……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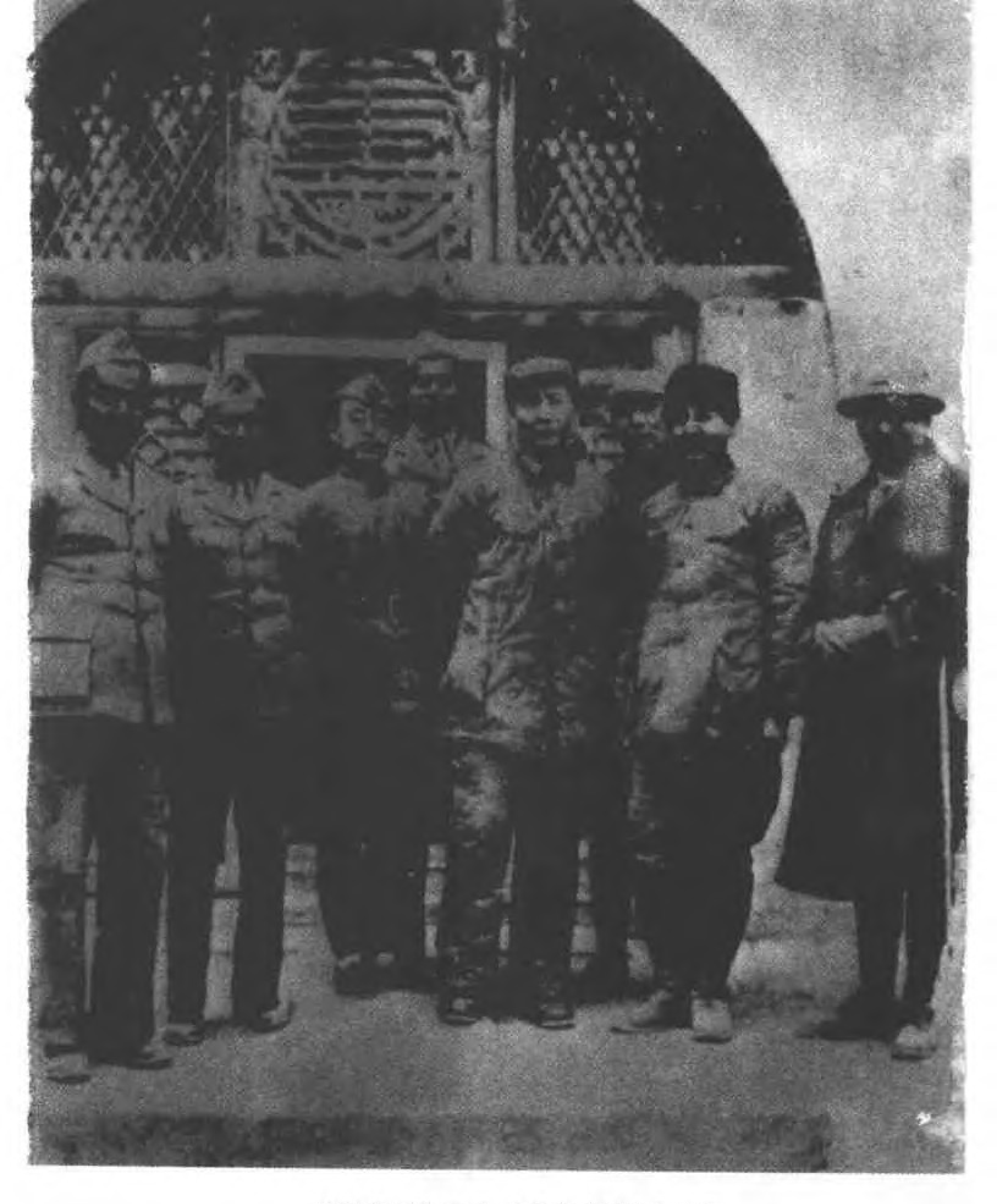
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而且他们还提高嗓子在叫："我们是一贯主张宪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分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得见，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来一个宪法，再来一个大总统。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给你。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是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第四个是冯国璋，第五个是徐世昌，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

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

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同志们，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定，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国民大会，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的。

这样讲来，岂不是“呜呼哀哉”了吗？事情是这样的困难，宪政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宪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大有希望，中国一定要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什么？宪政的困难，就是因为顽固分子作怪；但是顽固分子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的，所以我们还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总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



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成员。左起：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毛泽东、姜各贤、爱德华、卓克华。

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

……

总之，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很好，会后还要写文章，发通电，并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华北、华中、全国各地，到处去开这样的会。这样地做下去，做他几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会亡国。为了避免亡国，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还要懂得，顽固派到底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是可以进步

的。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说，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选自《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第689～698页　人民出版社出版

原文为毛泽东在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召开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的讲话

“共产党员只有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一切、垄断一切的权利”

毛泽东

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顾及着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

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

我们实行这种政策是有成绩的，是得到全国人民赞成的。但是也有缺点。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存在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

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人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我想，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也许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说，如果要和别人合作，我们就不干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人是极少的。我向各位保证，我党绝大多数的党员是一定能够执行我党中央的路线的。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了解我们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各位参议员先生不辞辛勤，来此开会。我很高兴地庆祝这个盛会，庆祝这个盛会的成功。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2日
原题：《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那样的共产党不会模仿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1944年毛泽东与福尔曼的谈话

在延安，毛恰巧并不是一个难以接近的预言家，不是一切智慧与指导的源泉，他的话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法律。当然，毛泽东的观点与建议在形成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它只拿来当为讨论的一个基础，而由该党各领袖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作最后通过，这些领袖们自然不是些橡皮的图章，因此，毛所宣传的演说，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来，再由他的党中同志整理过，最后的形式，因此是党委员会的混合表现，而并非纯粹是毛自己的观点。

……

他对我说，“第一，我们不是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更其愿认为我们现在所在做的，有些像林肯在你们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好几亿的奴隶，为封建社会桎梏着的奴隶。80%以上的我们的人口是依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由于近80%的佃农，须以他们生产品50%～80%偿付地租，它等于实际奴隶所

偿付的。

……

“不过为设法解放这几亿人民与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生计，我们不想像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重行分配于人民。我们承认，我们确然在过去那样做过；但在1937年9月22日，和国民党与政府缔结协定后，我们放弃了这种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个劝告地主减租达到合理的数字，而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些减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户正常地交给他们。在这一点上，就经济的意义上讲，我们是和苏联不同的。

“政治方面，在我们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一点上，我们也和他们是不同的。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我们是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的。并且在一互利的协议之下，我们要准许并且欢迎在我们控制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我们自己能够做的，我们自然要做。但有着好多我们不能做的事，我们将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事。我们是落后的国家，因此，对于外国投资十分需要。

“讲到政府——像你晓得的一样——我们信仰与实行民主政治，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像今天国民党所实行的那种情形。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和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里面，我们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在今天的苏联，却是没有地主、没有商人、没有小市民的。”

“可是你们既不实行共产主义，”我要求说明，“那末为什么叫你们自己为共产党呢？”他的答复是，这一名字是从往日沿袭而来。“你在这儿已经看到很充分的事实来证实我

所说的话，”他说，“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联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

“那末为什么，”我坚持着说，“你们不改名呢——改为属于民主政治范围的‘新民主党’，或其他这样一类名称——任何共产主义以外的名称呢？”

他摇摇头。“我们或别的人所称呼我们的政党的名称，对于我们，或对于我们的天良上，并不关重要。如果我们是突然改了别的名称，在今天的中国——以及外国也是一样——就会有那些人利用它来作资本，要指斥我们想隐蔽某些事实。不，我们不能，我们也不该改换名称。我们也无此必要。所重要的，是内容与实施，不是名称！”

哈里森·福尔曼著《西行漫记》第二十一章摘要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1949年9月1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当选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合影。左起：谭平山、周恩来、章伯钧、黄炎培、林伯渠、朱德、马寅初、蔡畅、毛泽东、张奚若、陈叔通、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李济深、李立三、蔡廷锴、陈嘉庚、乌兰夫、沈雁冰。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选自黄炎培著《延安归来》

一党专政反民主，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

刘少奇

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它只有在平等原则上，采用完全的民主制度，才能组织成功。这也是领导中国抗战与革命到最后胜利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形式。没有这种政权的建立，没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大巩固和扩大，不实行民主政治，抗日战争是不能胜利的。

抗战三年了，本来早就应该在全国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以领导抗战，那样，抗战决不只获得如今天这样的结果和成绩，可能获得比今天大千百倍的胜利与成绩，也不致引起今天抗战中的这许多困难与人民的痛苦。然而，没有这样做，这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只顾其“一党专政”的私利，不顾国家民族危亡造成的。这是国民党最大的错误，这是最违背民意与违反法律的。

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以上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我们不会不尽忠于自己的职责。因

此，凡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区域，只有可能的话，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能不实行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如果不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也就不能长期坚持敌后抗战，最有力地打击敌人，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

这个政权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权利，如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居住、营业、思想的自由。任何人只要没有勾结敌寇和汉奸的行为，没有破坏与反对抗日军队的行动，没有违犯政府法令的行为，不论他是属于何党何派，属于哪一阶级、阶层，政府一律保护。一切党派只要抗日，不反对民主，一律有合法的地位。

这种政权，今天还只在部分的敌后地区建立。在全国，由于国民党不愿意结束"一党专政"，不愿意"还政于民"，这种政权仍然还是不能建立，仍然还只是宣传的口号。因此，这种部分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只是地方政府。它应该属于中央政府，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并依照敌后情形执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同时它也可以在地方自治的原则下，颁布该地区的单行法令。

敌后的抗日民主政府还没有为中央政府正式承认，因此有人说：这种政府是不合法的。很明白，这说法是不对的。

我们问：什么叫合法和不合法？

在目前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日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全国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则。政府的一切法律命令，都应该是为着保护民族的利益，保障抗日的胜利。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就是目前法律的基础。那末，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实行



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1949 年 3 月）。

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民族利益、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这就是最合法的。而不实行的，是不合法的。违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及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的，是违法的。大多数人民承认的，选举的，就是合法的。相反，大多数人民不承认的，反对的，自己把持霸占的就是非法的。抗日民主政权由人民选举，是合法的。其他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就是非法的。如果中央政府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就应该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府，并以它作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予承认，只能证明中央政府人员的违法，违反了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这个法律基础。中央政府不“还政于民”，不改组为抗日民主政府，也是不合法的。在世界各

国的历史上，中央政府违法的事情是很多的。在各国的最高法院中，就有审判这类案件的，在中国还没有过这种审判。但这不是中国就没有这种事情，是有许多这种事情，只是没有人敢于过问罢了。所以，在敌后建立的这种抗日民主政府，在实质上是最合法的。由于国民党中一部分人不愿意实行民主，所以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暂时恐还难于实现。但是，在中国一部分地区，则已实行民主化。这种民主化的地区，应该是新的民主共和国——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地方基础。在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具体的建设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国，可能要经过长期的奋斗过程。因此，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有着推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的模范作用，它实行的结果之好或坏，将给全国以好的或坏的重大的影响。这种政权，今天虽还只在敌后一部分地区建立，但它有着全国的普遍意义。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这种政权，不是一党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处，如果能够建立政权的话，就要建立统一战线的革命各阶级联合的政权。即或因为人民的组织程度不够，而不得不委任临时的地方政府人员的话，那末，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所以共产党很愿

意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和公正的人士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共同管理政府。只有大多数的人民都积极起来参政，积极担负政府的工作，并积极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努力的时候，抗日民主政权才能巩固与发展，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才能推翻，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才能实现。这是共产党的目的，也是全国极大多数人民共同的目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

选自《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72～176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党员犯法应加重治罪

董必武

边区政府是我们党领导群众建立起来的，政府也在党领导下工作。政府所颁布的法令，所定的秩序，我们党员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和遵守。那些法令和秩序是我们公共生活所必须，而且法令和秩序是经过了一定的手续才制定出来的，秩序是经过一定的时间才形成起来的。在制定和形成时已经渗透了我们党和我们自己的意见和活动。我们如果违背了政府的法令，破坏了社会的秩序，我们自己必须负责，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我听说我们边区有些党员同志犯了法，因为他自以为是党员，想不受政府的审判和处罚；而有些地方党组织也觉得党员犯法，是党内的事，让他逃避政府的审判和处罚。这都是不对的。国民党在全中国范围内因为它的党员不遵守它领导的政府所颁布的法令而遭受到国人的痛恶，这是我们应当拿来作为鉴戒的。党员应当自觉地遵守党所领导的政府的法令。如果违犯了这样的法令，除受到党纪制裁外，应比群众犯法加等治罪。为什么呢？因为群众犯法有可能是出于无知，而我们党员是群众中的觉悟分子，觉悟分子犯罪是决不



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南京梅园新村30号驻地合影。左起：李维汉、董必武、邓颖超、周恩来。

能宽恕的，是应当加重处罚的。不然的话，就不能服人。从前封建时代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传说，从这传说中很可以看出人民希望法律上平等的心理。难道说我们共产党不应当主张比封建时代传说下来的一点法律上的平等更前进一步吗？

我请求边区党通过一个决议，警告我们党员必须遵守边区政府的法令。党员犯法，加等治罪。这不是表示我们党的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党决不包庇罪人，党决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党员毫无例外，而且要加重治罪，这更表示党所要求于党员的比起非党员的要严格得多。

选自《董必武选集》第58～59页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政党本身不是权力机关，不能凌驾于群众和政府之上

徐特立

政党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第一是政治上的领导，第二是组织上的领导。前者的任务，第一是政治理论的建立，第二是政纲的制定，第三是政策的决定，第四是正确领导方式的确立。它应当因此而得到群众团体和政府深刻的认识和自动的执行，而不含任何的强迫与命令，这便是平常所说的党的领导权。党是没有强迫执行命令的权力的，所以它没有武装，没有监狱，也没有法律上的制裁；它本身不是一个权力机关，只能靠它的党员在政府机关中、群众团体中普遍的发生核心作用。

政党的每个党员都应该忠实于国家，忠实于民族，忠实于党的政纲和政策的执行，在群众中成为一个最前进的模范人物，然后能在群众中建立自我的信仰，建立党的威信，然后能使群众团聚于党的周围，这就是所谓“起核心作用”。但这里并不是用拉夫式强迫群众拥护党，群众拥护党是出于他们的内心作用。因此，我们领导群众是要靠政纲政策的正确，在事实上要成为广大群众生活意识所反映的要求。党在

群众的意识中要能够使群众认为党是民族的、国家的及自己的救星，这才是真正的领导权。

至于普通所谓争领导权并不是争取政权，而是争取自己所提出的政纲政策的实现。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用党来代替议会，也不是以党来代替政府，包办一切政治，成为党的专政。把领导作用与政权混合起来，这在实际上便等于取消了党。

其次，党的领导作用不单纯是提出一些政治主张去取得群众的接受，却是经过各种组织而使它实现起来。因此，除经过党本身的核心组织之外，还要经过政府的组织（当权的党）及各种群众团体的组织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假若政府的组织及群众团体的组织不健全，虽然有党的组织，也就徒然成为一个空洞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在组织方面必须有政府、政党及群众团体三种组织。

党的任务是在领导；政府的任务是在行政、司法和立法；群众团体的任务是在使群众自治。三者的任务各有差别和范围，而且互相联系着，缺一不可，两两侵犯也不可。政府有强迫作用，拿孔子的话来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即是政府的强迫作用；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深入群众的内心，却是今日政党的作用。在政府有上下级官阶之分，对于群众有官民之分，这里便含着名分的差别。可是在党内，一切党员都是同志，无所谓官阶，也无所谓名分，更无所谓同乡和同姓，一致统一在相同的政治主张下，没有任何猜疑，而只有平等的批判和说服；就是党内的处罚也只有劝告与警告，到了开除党籍已是无以复加了，同时自己也可以自由退出所入的党。因为党不是权力机关，而只是领导机关，用通俗的话来说，假若我们认为政府是父亲的话，那

末，党便是母亲。

党的专政只能说是党的政治主张透过政府而达到实现，并不是用党来代替政府执行政权。而透过政府也是由自己的党员在政府中起核心作用，而不是党对政府下命令和强迫政府执行。更不是政党驾乎政府之上，而是各别的独立机关，各有各的上下级关系。即党被群众和政府所推重，也不是认为党是他们的上级，在组织应该服从，而是为着党纲及政策的正确，是一种救国救民以及救自己的主张，同时党员也是群众所推崇的模范；因此，党的“党德”和党的政纲不是在群众和政府机关之上。倘若认为“党”是组织上在群众和政府之上，那就必然会走到强迫群众和命令群众的路上去，而使一个国家形成两重政府的形态。如果党的命令和政府的命令是一致的，则成为屋上架屋；如果党的命令与政府的命令是岐异的，则群众无所适从。故此政党必须集中精神于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而决定正确的政纲和政策；不可降低自己的工作重心，而替代政府执行一切政务。

政党以政治为它的生命，每一个时期的政治转变，必须竭尽全力发动全党来迎接这一转变，把国家社会乃至把整个国际转危为安。在这种严重潮流之中，某一个政党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那么它自己本身也就安如磐石，谁也不愿意推翻它，同时也就不能推翻它，而且还会拥护它。因此，稍有历史的政党，不会用争权夺利去代替救国救民的任务，也不会把党的专政看作是党的权利，而不看做是党的义务。如果以争权利来代替专政，那么，就会使党员变成党官，政治家变为政客，政党变为政客的集团。专政的意义弄错了，结果国家遭到灭亡，自己的党也会被敌人毁灭。同时一切政党都应该拥护自己阶级的利益，但是只见近利而不见远利，及只

见狭隘的阶级利益而忽视朋友的利益，也是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在以党专政的口号下，变为以党专利，更为严重。因为他不顾到朋友的利益，就得不到朋友的帮助，孤军独战，结果就变为此路不通。例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马克思是他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说："共产党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同时另一处地方又说："共产党主张废止私有财产，而不是废止小农民的财产和小职工的财产。"列宁也是共产党的首领，他认为农民大众和殖民地国家都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殖民地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利益，间接就等于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进攻时，全民族都陷在水深火热中，如果离开了整个民族的利益，而只站在狭隘的阶级利益上，使得国家灭亡，而自己的阶级也会同归于尽。在这种情况之下，还不爱惜朋友，帮助朋友，以致牺牲了朋友的利益，结果牺牲了整个民族利益，也就是等于牺牲了自己阶级的利益。目前法国及中国的天主教也和共产党合作，因为他们都知道目前共同的敌人是世界的侵略阵线，威胁了一切人类。这并不是说，朋友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绝对相等，但是在一定范围内，共同的利益是绝对相等的。因为政党自己本身不是等于朋友，所以不能和朋友合并为一党，也不能够随便拉朋友进自己的党里来。

党的专政是保证政纲政策的实现，而实现的是大多数的朋友，却不是单纯的自己的党员，如果一切都要自己的党员来执行，那就无须要领导了。所谓"领导"也就是政党对友军起核心作用。怎样才能起核心作用？就是站在共同的利害上竭力帮助友军，使友军健全起来，以便达到共同的目的。苏联只有一个政党，而政府中负责人不一定全是共产党员；



1947年12月，毛泽东与陆定一（左2）、徐特立（左9）、王明（右4）等在陕西米脂杨家沟

1930年，苏联联邦中的日尔曼共和国的劳动部长便不是党员。而苏维埃的代表，只能保证党员占多数；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时教育部就有许多非共产党员，其中科长如赖子玉君、冯观潮君都不是党员，师范学校校长罗欣然也不是党员。目前边区政府柯柏年任编审科长，董纯才任科员，均不是党员。不久以前，孙铭勋由边区政府主席团委任他为教育委员，而孙是延安师范的教员，亦非党员（延安师范是西安省政府办的）。社会教育科长杨其华，同样不是党员。因为有许多人才，有专门学识和经验，他们自己不愿意加入党，却愿替政府工作。或者有些人条件不够入党，但在政府负责却有余；因为政党和政府不是完全无差别的。如果行政人员不问他们愿意不愿意而强迫他们加入党，那末，党的组织就会不能巩固起来。如果没有入党资格的人就不许在政府负责，那么就要遗弃许多有用的人才。在过去苏联红军中的军长师长，不一定是党员，但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必须是党员。因为司令员是由政府委任指挥军队的，政治委员是由党委任指挥党员，保证党和政府决议案执行的。现在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有许多非国民党员，可见以党"专政"不是政府机关都用党员，而只有保证党的政策和政纲能够实现。怎样实现是要经过广泛非党员的群众，而自己的党员，只是群众的核心。

在一个国家内的组织力量，是政党政府及群众团体。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尽领导责任，而不干涉行政和命令群众。政府用他的最高权力在党的领导下保卫国家，他的威权是用来对敌人，而不是用来对友邦及对自己的群众。群众团体拥护政府，拥护当权的党，在不妨碍整个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条件下，而保障自己特殊的自治权利。以上三种组织互

相为用，缺一不可。三者均健全，则天下无敌，缺一就要削弱，缺二就是幸存，走到灭亡是必然的。

选自《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原题《政党与政府》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标题为编者所加）

政权开放才有利于党的领导

让我们设想，有这样三个不同的县参议会和县政府：其一、县政府和县参议会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其二、议会议员、政府委员会中，党外人士都在半数以下；其三、真正实行了三三制。这三种县政府在政策掌握上、工作方法方式上、工作作风上，会有什么差异呢？在共产党员思想意识的锻炼上、工作能力的培植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让我们看第一种。

议会、县府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党员的第一个任务是服从组织决定，因此当一个任务到来时，他们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如何完成这一个任务？”关于这一任务本身的政治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个根本问题，却不会发生争论。对于党外人士的心理如何看这一问题也很少考虑，因此对于政策的理解也就不会深刻，甚至对于政策的研究与把握失掉兴趣。大家统都以“完成任务”为满足，逐渐发展的结果，是政治上的迟钝，以至麻痹。

在工作制度上，极容易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方面议

会和政府不能发挥其独立的机能，在人民面前减低了它们的威信，同时也使党委纷纷忙于日常的政务，反而疏忽了政治上的领导。大家都是党员，做的是一件事情，讨论的是一个题目，又何必挪移三个地方（县党委、县议会、县政府）开三次同样的会？在工作方法方式上，因为对于党外少了解、全是自己人、因而就容易对于领导群众也常应用党内的领导方式，强迫命令偏偏多于解释说服；而党员或干部在群众间起的“模范作用”往往也十分勉强或过于突出。

结果是：党的政策不能变为广大人民的主张，人民看到的只是“公家”加到自己身上的负担；县委、参议会、县政府、以至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在人民眼里多变成了“公家人”，不再是与他们血肉相关的“自家人”。

第二种怎样呢？

因为县议会、县政府都只有少数的党外人士，党外人士来时勉强，进门不敢讲话，或少讲话，办事则敷衍表面。因而我们也就容易不把党外人士当数，或误以党外人士当真没有跟我们不同的意见，于是多数人已经讨论决定了的东西，回头来再特为少数人开一次会，把原案照样通过一番，日子一久，又感到太麻烦。党外人士自己知趣，也就懒得参加这种党政不分的会议了。于是一切事情仍旧习惯地进行起来：照样地不研究政策，照样地没有结论，照样地“完成任务”……。我们主观上也许当真想跟党外人士合作，但是实际上变成了“请客”，党外人士也许当真打算到议会里来发抒他们的意见，到政府里来施展他的抱负，但实际上却做了“不愉快的客人”。

这种情形，对于共产党员毫无好处；对于县党委的工作，依旧是个累赘，而县议会则容易变成一个空洞的形式

——甚至连形式也很难得保持。

在第三种情形下，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党外人士一多，大家就敢讲话，他们或者根本就不同意我们的主张，或者是同意我们的主张而不赞同我们的办法，或者同意主张办法，面反对我们提出来的人选。在这种情形下而，共产党员——首先是被选到议会里和政府里去的共产党员，就不能不细心地、深入地去研究并把握党的政策，如果依旧是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就不行了；另一方面，他就不能不注意研究别人的立场和意见，而想出种种的对策，使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同时也接受人家意见的好处。如果依旧是自高自大，目无旁人，他们就会被孤立、受打击，以至一事无成了。同时，他们也就不能不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共产党员，牢固地站稳自己的立场，为抗战和革命打先锋，做模范。如果再马马虎虎，吊儿郎当，连群众都会公开指责你不配做共产党员了。

于是党的政策当更为广大人民所理解，党员行动当更为广大人民所拥护，这便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其次在工作制度上也就不能不实行转变了。党已经不能代政，它就不能不在主张与办法上多用心思，不能不考虑通过政治领导争取大多数以实现党的主张的办法，关于实际政务上的琐细项目，它就只好放弃，也不能不放弃了。议会里既然有了不同意见的辩驳和斗争，它也就有了它的作用，再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形式；即使我们每一项主张能够在议会上毫无异议地全体通过，这些主张本质上和以前也已经根本上有了差异，因为它们已由党的主张变为人民的主张了。县政府再根据议会的决定，负责制定详细的、具体的执行方案和步骤，县政府也就有了自己一定的责任和独立的工作。

只有党与政在工作上的明确分开，才适合于民主制度的体例；也只有各自独立工作的建立，才能更泼辣、更有生气地实现对于广大人民的领导。

最后，在新的情况下，工作方法、工作方式以及整个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不从头到尾来个彻底转变了：关着的门，必须打开；别人的意见，必须倾听；强迫命令，必须取消；一意孤行也要“此路不通”了。

所谓掌握与贯彻党的政策，所谓了解情况，学习并运用策略，只有跟党外的主张与党外的人士相接触、相比较时，才有其实际的意义；所谓党政分开，所谓改变作风，也只有在议会里、政府里当真有了二分之一以上的党外人士时，才更容易实现这一个转变。

三三制不仅是符合于全体抗日人民的利益的政权形式，三三制还是锻炼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党的组织，使之真正成为全体抗日人民、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代表者，成为引导他们走向胜利之路的带路人的必须的途径。

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毫无犹豫地实行三三制！

《解放日报》1942 年 3 月 13 日

论延安学校中支部对群众团体的关系

在群众性学校中，党的支部与群众团体，是并行的。假如说支部是从党的系统来保证教育计划的完成，则群众团体是以群众组织的力量来进行学生自治，各种课外活动及文化娱乐等辅助教育使教育内容更丰富、更生动（如果我们不把教育仅限于书本上的知识的话）。因此在完成教育作业的意义上，支部与群众团体是没有任何分歧的理由的。

因此，支部应该鼓励党员积极参加群众团体的活动，同时对这些团体必须采取团结、帮助和提携的方针，只要这些团体是符合于抗战、团结、进步的原则并向学校履行一定的手续而且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的。

群众性学校的学生，是来自各阶层各地域的知识分子，一般说，除抗日救亡的目标是比较一致外，其观点、其立场必然有所分歧。就是加入群众团体，也在某种程度内各怀有不同的动机。唯其如此，他们对民主作风格外重视，支部工作者应该掌握住这一特点，不仅宣布、而且实际上尊重其思想的自由（包括信仰），学术研究的自由，和作风上充分发

扬民主的精神。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延安是共产党员占优势的地方，学校里也如此。所以支部工作者更须具有恢宏的胸襟和宽容的器度，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得住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党中央曾有正确的对群众团体的政策，但如果在下面执行不善，手法拘谨，也会影响到这种民主作风的实质的。所以党员在群众团体中也只有以互相商量的、互相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去求得各种不同意见之渐趋于一致，性急也是没用的。

党内同志一方面尊重别人批评的权利，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接受别人正确的批评，另一方面也要阐明自己的信仰与理想，批评别人错误的意见，二者不可缺一。在党外同志来说，批评别人，被别人批评，这不等于思想上压迫。在党内同志来说，如果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则不是民主而是尾巴，就永远不会把错误的意见转变到正确方向上去。只有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在纷纭庞杂的意见中，以曲折的道路，使其一致，使其走向正确，这才看出领导的必要与党的意义。

但是上面所说的领导，自然不是支部对群众团体直接的命令、指示，或在组织上的把持，而是要通过党员提出积极的意见，使党的主张贯彻到这些团体中去。领导的中心环节，就在于主张正确与别人相信这些主张的正确。而不是倚恃人多势大。这里的区别，就是“以德服人”与“以力假人”的区别。

过去学校中由于个别党内同志存在狭隘的观点和拘谨的手法，致使党员与党外同志之间，涂上一层不和谐的气氛，而某些党外同志也固执于自己是“群众”，因此对某些党员

有过高的要求。后来党内同志和党外同志一齐积极参加与自己兴趣所近的群众组织，建立直接的、正面的交往关系，这不惟冲淡彼此间存在着的隔阂，而且在团结上起了组织的作用。“共产党员有义务与党外同志合作，无权利排斥党外人士。”这就是党员对党外同志所采取的原则。

学校中支部对群众的问题，就是现实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问题。因为来延安的青年有各阶层、各政党的前进分子，有不同的社会关系，有不同的政治认识，有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因此在群众团体的选举上，必须广泛地容纳这些人。就是说，这些团体的组成分子中，党员与非党员的比率，与这团体的领导部门中党员与非党员的比率应成正比例。这就是说，假如组成分子中党员占百分之三十，则领导部门中党员也只能占三分之一。后者随前者的变动而变动。这可使保持各种观点的人，都有其真正的代表到领导机构中去。这对这些团体是有好处的……

假如党员被选到领导机构中，则民主作风、宽宏气量，就有更高的要求了。一个工作上问题的决定，尽可能经过协商，倾听党外同志的意见，取决于多数，明知解决问题失策，亦须以解释说服的办法纠正。刚愎自用、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等不良习惯，都应该反对。万一有原则上的分歧，解释无效，则申明保留自己的意见，追将来事实证明看。假如党外同志被选到领导机关，则党员须自觉地忠实于自己的工作，以减少领导者的困难。并进而设法协助领导者解决其发生的疑难问题，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全校性的人数较多的团体中的党员，加以适当的组织，由支部领导使其多少具有党团的形式，这在延安的学校中还是必要。

因为党员重视其所参加的群众团体，远不如重视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这组织的任务应该着重在督促这些团体中的党员执行决议、遵守纪律、积极工作以保证这些团体的巩固和发展。显然这与一般的党团是有区别的。

为要加强支部与群众团体间之联系，支部有关会议欢迎这些团体的代表参加互相交换意见，使得彼此依靠得更紧密。

教育计划的完成，在学校范围说来是很大的组织工作。假如支部不把学生中半数的党外同志团结起来，步调一致，这对教育工作将是很大的损失！从此目的出发，则团结群众团体，团结党外同志，应当作为支部“保证学校教育计划完成”的主要工作之一。

《解放日报》1942年8月2日

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

什么是主权在民？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人民对政府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了民主国家的基本条件；如果这种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建设。

因此，建设一个国家的民主，第一个标志，第一个步骤，就是把上述四权交给人民，不作一丝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负责官员，由人民来选举，从人民中间产生；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由人民来决定，由人民来创制；政府官员的失职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违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罢免他或撤废他。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并且对于人民实行这几种权利，是不

是毫无保留地加以尊重。

根据这种标准来衡量我们当前的政治局势，就可以知道，我们要完成民主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还政于民，就是把人民应有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真正交还给人民。如果离开这四种人民权利，甚至任何人民应有权利都不交给人民，而高唱实施民主宪政，还政于民，那就未免是空谈了。

实现民主，完成民主建设，在一切主权还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区，问题是立刻使人民有权，立刻把人民的权利交还给人民，而且是毫无保留条件地实行还政于民，产生民选的政府，建立民主的体制，颁布人民决定的政令法律。至于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广大的解放区，已经建立了人民选举的政权，组织了服务于人民的军队，解除了人民的痛苦，改善人民的生活与教育，就是说，人民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已实现了充分的民主，在这些地方，问题就是要在法律上予以承认和保障。只有这样才能显出还政于民的诚意。

民主的正轨是人民有权选举政府，有权决定法律。合于这正轨的就是民主，不合于这正轨的就是不民主。前者应该得到发扬光大，而后者应该立即改途易撤，真正还政于民，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么？然而有些不愿意中国实现民主的人，不愿意中国从落后进展到民主进步的人，他们空谈实现民主，却不把任何一点自由交给人民；不但如此，对于人民已经得到自由权利的地方，他们还要加以取消，说是取消了这些民主，才能够实现民主。这样一来，倒好像政府不由民选，法令不由民立，才叫做民主；而人民选举的政府，人民决定的法令，反而是不民主了。言论、出版、集会和人身自

由是民主的起码条件，但他们认为要求这些条件，是阻挠民主。没有党派的合法地位，没有取消一切限制人民的法律和组织，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但他们认为提出这些要求，就是反对还政于民。在他们的世界里，简直一切都是颠倒的了。

民主的正轨是人民有权，人民作主，这是全国人民无不知晓的事。抗战八年来，人民的要求就是要得到应得的权利。边区和解放区一万万以上的人民已经得到的民主权利应该保持，不能保持就是取消民主；大后方和敌占区人民是没有得到民主的，现在应该得到，如果不让他们得到，就是阻挠民主。世界是民主的世界，中国也应该是民主的中国；在民主的中国，取消民主和阻挠民主的做法是不能成功的。

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三三制：一党专政的天敌

老百姓在解放区做了主人，就是说，解放区实行了民主。解放区实行了哪些民主呢？解放区实行的民主有好几方面，比如今天要说的“三三制”，就是政治上实行民主的一种办法，一种制度，用这种办法、这种制度，好让各阶级、各党派大家都有机会来参加政府，管理国事。

要知道什么叫三三制政策，我们看一看解放区的老大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情形，就可以明白个大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完全是由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民主选举出来的。主席是林伯渠，大家称他林主席，林主席本来是老同盟会员，革命几十年，现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副主席呢？副主席是李鼎铭，大家称他李副主席，李副主席曾经服务教育界好多年，精通国医，是陕北的公正绅士，不是共产党员。边区政府的厅长，比如教育厅柳厅长，是救国会派人士；比如教育厅副厅长霍连果，还有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都是地方名流，也都不是共产党员。政府委员会，18 个人中间，只有 6 个人是共产党员。

在陕甘宁边区，除去边区政府有非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

务以外，县长、科长，以及乡长、乡文书以上的各级行政人员，也有很多是非共产党员，统计起来，共有 3580；参加经济文化工作的，也有 2210 人不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与其他党派、无党无派的人在一起办事，互相商量问题，实行民主合作，共同建设边区，大家一样，在政府中间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只要你所提出的意见在讨论的时候，得到多数人的同意，那就能够实行。比如，在 1942 年冬季开始，陕甘宁实行“精简政策”，最初提出这个政策的，还是非共产党员李副主席。

边区政府是由边区参议会，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出来的。边区参议员，当中也有许多非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地主绅商的代表，有回族、蒙族少数民族的代表等等，他们又是从边区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党派，以及各种不同信仰的人民当中，经过由下而上的普选运动，选举出来的。

在参议会上，参议员们和衷共济，不仅批评政府的工作，并且通过了许多议案，交给政府去做，还选举出参议会常驻委员，在参议会闭会的时候来监督政府。常驻委员有 9 个人，其中只有 3 个人是共产党员。

各位听众！18 个政府委员当中，只有 6 个是共产党员，参议会 9 个常驻委员当中，只有 3 个是共产党员，可见得，共产党员在里面所占比例，都只占三分之一。

为什么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呢？这就是因为实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三三制政策”，这个政策规定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好让更多的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士参加到政府里面来。

过去，解放区里的老百姓熟悉共产党，常常选出许多共



山西五台山地区的“妇救会”会员在做军鞋。妇救会是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爱国组织。

产党员来为他们管事，自从共产党规定无党无派的人占得更多一些；如果共产党员当选的不够三分之一，怎么办呢？那当然是选了多少，就算多少。

解放区为什么采取三三制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共产党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广大人民及爱国党派、民主人士都来管理政权。中国人口很多，共产党员占一小部分，为了要使党外的广大人民都有他们的代表来共同管理国事，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政权机关里，自己约束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

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党专政，反对像国民党那样，由一个党的少数人来包办政府，主张各党派、各阶级都有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现在都在努力争取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现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还没有实现，只有解放区实行了三三制政府，这就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

《解放日报》1945 年 12 月 7 日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打开我国的地图，睁开眼睛一看，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地区，哪里没有灾荒？单就报纸上发表的材料来看，可以看出灾荒是异常严重的。如湖南、河南、安徽、广东、广西、江苏、湖北、江西、四川，以及陕、甘、青、滇等省，真是遍地是灾，尤其是湖南等地，实在是惨不忍闻。

固然，大部分灾区是经过敌伪占领的地区，但有许多地区都是从来没有沦陷过的。现在的严重现象，是耕地荒芜，副业凋落，耕牛尽失，农具俱毁，疾病蔓延，难民流离失所。总之一句话，农村的生产几乎已完全破产，农民的生活已陷于绝境。举例来说，湖南本是产米之区，现在却以草根树皮为食；衡阳附近，每家饿死三分之二。豫西23县，遭敌伪破坏，至今损失粮食800多万担，房屋300多万间，牲畜30多万头，农具7000多万件。养蚕本为副业，但是饲养用具损失了一半以上。安徽全省60余县中，受灾县份竟达50多，损失耕牛近100万头，农具300多万件。江西、广西、广东等省，情形相似。至于各省因疾病而死亡的，难民



饑民乞食的慘狀

流浪在外的，更是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即以广西一省而言，难民就有314.4万人，伤病的，就有168万余人。江西伤病的350万，流离失所的达160多万。至于川、陕、甘、青、滇等省的旱、水、风、蝗、雹等灾，更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之下的人民所熟知的了。“以农立国”的中国，立在这样的农村大破产当中，还说中国没有经济危机，简直是骗人，那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毫无办法解决的自欺欺人的手法！

怎么会有这样严重的灾荒呢？敌伪破坏固是一个重大原因；然而，为什么抗战期中，没有能够阻遏敌寇的前进；这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应该负责的吗？敌寇投降以后，至今已有7个多月，灾荒却还在扩大和严重化起来，这又是谁负责呢？比如：湖南老百姓在吃树皮草根，却还有11万日本俘虏“吃着从老百姓那里‘征’来的米”，这种情形又何止湖南？现在待遣的日俘，不是都在吃着老百姓的米，而且还在受“优待”吗？而且像山西阎锡山那里，不是还有收编了的日军在吃老百姓辛苦耕耘而自己吃不到的米麦吗？此外，不是还有待遣返的日侨300万人，也在吃米，迟迟不遣送日俘日侨回国，好好供奉着他们的，不也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其次，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并没有立即真正进行整军复员，还继续保存许多正规部队和各种名目的队伍，不久以前，且有在重庆取缔“衣冠不整，拉去当兵”的事情发生。这些也都是只有消费民粮，丝毫也不从事生产的。由于上述原因，更由于日寇投降以后，内战再起，至今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仍炽；内战的进行，以东北尤烈，所以征军粮始终未减未停。以已经破产之农村，负无法负担的军粮；加之原有苛杂，原封未动，而物价高涨，竟达无法捉摸的速度，怎能不造成遍地灾荒呢？叫人民怎能不奔

走呼号，到处求救呢？湖南人士提出“迅予有效赈济，并豁免摊派，缓征军粮280万袋”，提出“应停止摊派军粮，并速调撤别动队及遣派俘虏”。湖北人士呼吁：“军粮俘粮负担太重，县乡两级人员随意建立名目，苛扰人民，望当局赶快解救。”安徽代表跪请减免军粮等，都是身受其苦而发出的衷心呼吁。这也证明灾荒之原因，实在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人为的原因，而不是其他。

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一面否认经济危机之存在；一面对救灾则完全依靠外国，本身却什么也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人民没有事实证明政府是真能为人民的，救灾如救火，决不是拖延敷衍所能混过。现在，应该赶快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入手。赶快进行赈济，免征军粮俘粮，抑制物价等，以稍纾民困；同时，须用大力迅速遣送日俘日侨，整编军队，并用一切办法使灾区灾民能够开始从事生产，安定生活。老实说，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内战及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1946年3月30日社论



Ⅸ

谁使中国不能安定？

奴才见解

田家英

读史记《秦始皇本纪》，觉得奴才的见解常有其独特的地方。

秦并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天下是咱家的了，于是忙煞了一批帮闲、帮凶、走狗之类，浩浩荡荡。除了三呼“陛下神灵圣明”，扬着鞭子，监督奴隶刻石歌颂功德，这些唯唯诺诺或者贼贼喳喳的奴才，便忙着“使天下无异议”，策划“安宁之术”，改官制，严刑罚，强化特务基层活动，运用喽罗监察网。这里，最有名的自然是“焚书”与“坑儒”。

焚书，这在中国“书缺有简”算是最早了吧，非秦书，皆烧之，诗书百家语钦定不准读，准读的是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这是要把天下士子都造成“博士”，“方士”。等因奉此，大家都读核准的书，又是要大家都做奴才。不过，虽然用意如此，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又岂非显出奴才身份并不高贵了么？所以站在奴才立场最好的不是奴化诸生思想，倒是直接了当掘一个大坑，推他下去。

于是便有异议了，秦时当有言论，可惜不及详考，好在

目前就有近似主张，那宏文是：

> ……始皇何曾坑儒……所坑诸生不是所谓“真儒”，而是当时干犯禁令的人，所谓禁令现在虽无当时什么《出版法》或《检察条例》可资考证，但“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必然是“乱党和反动分子”，乱党和反动分子不坑，那还有国家纲纪吗？

进一步来讲，所谓“儒”……应该是明大势，识大体——了解始皇从分割中求统一之心，最少是洁身自爱，奉公守法，不造谣言攻势“宣传反动思想”……（《民意》一六八期）

这篇话，给我们活画出横眉怒目，一张吃人血口，这些“乱党和反动分子”为什么不“明大势，识大体”呢？我们看到一种基本的精神，那就是他们仰视光明，要挣扎，不安于眼看沦为奴隶。

这种奴才在秦始皇当时是很多的。单看秦的刑名就有榜掠、鬼薪、镝、弃市、戮车裂、抽胁、磔等等二十余种，应有尽有，污蔑人类的刑罚，兽性与淫虐，不是完全打失人类天性了吗？其实这是不足怪的，古今中外均同一例，鸣鞭自傲的奴才，他会觉得残酷就是道德，谄媚就是学问，屠杀是他的本能，没有人供他们杀戮，他们会失业的。这些人就是伏在主子胯下，舐着他人血迹，使自己发肥的总管。

然而站在主子立场又不尽是这样。杀一人而安天下，统治者自然要为，但是屠戮净尽谁又来作奴隶呢？所以主要的办法还需别来一套，这样，另一种奴才就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了。

李斯就是一个。“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中侈君而张吾之宠，是以尽舍其师荀卿之学，而为商鞅之学”，这是一种只知助虐固宠、毫无原则的人，他的办法不同的，“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吕、金人十二”，对于诸生不是以“坑”，而是以“制”，用现代话说是“整饬学风”，方法是：统制教授“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特务横行，暗探林立，有言诗书百家语者“随时报请撤惩”，“士学习法令辟禁”，是要做到“永除学生干涉行政之风”。总之一切设施不过为着使诸生与真理相远，与现实相离，将来，理想社会自然是不准想，就是“不师今而学古”，恋着过去也为法令不容，“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非愚儒所知”，如果诸生为要多少“知”一点去想呢？当然不准。同时还准备着一套万一要想，也得依着自己的逻辑，避免想出毛病来。

自然也有一味瞎想，这就用着第一种奴才作为补充，开除，思想测验，失踪，偶语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始皇用着这两种奴才，是成功了的，诸生在欺骗、压制之下，触不到新的现实，听不到新的声音“由聋而哑”，缄口结舌，最多也不过偷偷在石上刻一句“始皇帝死而地分”，天下文人士子的心是被皇帝丞相之类征服下来了。

但是李斯之流却没有看到另外还有力量。

这决不是国治天下不平了。事实的功德圆满却是与原意相反，统制是为了“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可是还来不及“把‘诸生’改为新的名词”，偏偏二世即亡。“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焚书、坑儒是做得有魄力的，偏偏起事的却并不是儒——亭长，走卒，翁牖绳枢之子，田亡隶之徒，根本不读诗书的人。没有武器，他们会斩木为兵，揭竿

为旗。

若问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武功之盛是空前的，为什么被一批乌合之众，一群死囚，几根木竿，乱者四应，秦的政权摧枯拉朽，统治立摧？

贾谊说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仁义不施”：防制异己，压迫文化，束缚思想，箝制舆论，以刑杀为威，以收括为务，践踏，奴役，纳贿，贪婪……天下大乱，更加甚的常常是这些谋筹划策，唯唯诺诺，或者叽叽喳喳的奴才。

《解放日报》1941年12月8日

今 与 昔

田家英

"能忏悔的人"，据说"精神是极其崇高的"。最透底的忏悔是从新的做人，斩犯绑赴刑场，为了表示不甘屈服，总得大叫几声"20年后，又是一条汉子!"快刀从头颈飞过，而新的生命仍在一年年成长，20年后依旧是钢筋铁骨，依旧是一条好汉。

这方法在中国，流传是颇广的，而且越来越高明。不甘落后的人加以研究，觉得20年毕竟太长，麻烦得很，于是另有新法：赶紧"贷款"，赶紧入党，赶紧做好汉。

然而，精神崇高的好汉们，也自有其内心的苦闷在。"反动"已经变为"革命"，旧英雄已经装成新英雄，"名缰利锁之中"，"鼓舞喧闹之境"，耍猴儿戏的最怕人揭开面具，望着他毛茸茸的脸皮，问起如何前后不符，直弄到腾挪不得，触及隐处，只好扭扭捏捏地表白一句"那是昔日的我，莫当今天的看"。

这就是今与昔的差异。

自然，消极地表白终究不算善法，一来为了体面尊严，一来为了证明自己从"不知道'转变'"，聪明人往往就会把过去

说得含混模糊，或者把旧帐陈迹扮饰得雪白莹净，甚而抹上一大片出奇的色彩。

这类作法，例子是很多的，单看每临纪念，报纸期刊上总常有许多自我表白的文章。比如前年“五四”，就有过领饷作事的编辑，诉说他一直就为新文化战斗，但弯子一绕，又在另起炉灶，从新做人。今年“五四”，也有几位教授文人在作“光荣的回忆”。甚至连郑学稼、梁实秋之流也大吹自己曾“游行示威，宣传讲演，制旗帜，贴标语”，使用过“唤醒沉醉的大众的手段”！结论如何？不过从“五四”证明“学风”的亟待整顿，学生不应过问政治（引文均见《中央周刊》四卷，三十八期）。

原形也正在这里躲闪不开。战士同将与吃肉吸血的帮闲之间隔一条多宽的鸿沟，但事情却偏会作弄，在同一个人身上，就使人分明地看到：今与昔有着如此的差异。

“觉今是而昨非”，因而“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这精神是不错的。但却必须是大体上能明是非，辨黑白，至少也本着良心奔赴去路，倘若仅随势力旋转，为了津贴领足，好官到手，不妨自打两下嘴巴，淌几滴眼泪，用歪曲来证明内心的忠诚，用一套出奇的幻想、险恶的构陷，把世事涂饰得漆黑一团，以之骗人，兼骗自己，这就比之简单抹煞历史，更卑劣得多。

不过，这卑劣中却仍然存有点“古道”在，因为究竟还承认有过那篇帐目。照情形看，“做人”的方法愈来愈为精进，恐将不久，好汉们连“改帐”也嫌麻烦，干脆算盘一响，帐簿一翻，就把两眉一横：“那是我？——我一直就在这边。”

在好汉们身上，今与昔是难于弄清的：昨天是正人，是君子；今天是教授，是文人；明天也不妨作狗，作鹰，作虫类。

《解放日报》1942年7月10日

“守法精神不够”论

磊 落

14日本市《新民晚报》载：“市政府鉴于各阶层人士守法精神不够，拟于最近召集各有关机关商讨、研究‘守法运动’具体办法……。”

打风在重庆流行，实在是守法精神太不够了，但这些违法犯法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检查一下：一连串杀人行凶的事件，哪一件不是有枪杆子的特殊人物，或是身负维持治安责任的人干出来的？干了之后，个个都逍遥法外，而且很多人升官！那末，守法精神不够的不是别人，正是这批踏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的家伙！

要谁守法呢？请老爷们说明白点！

《新华日报》1946年5月26日

“黑名单”

纪　懿

最近有人偶尔看见了一份后方各大学的“黑名单”，印得很精致，硬壳，封面是全黑色，里面的字，当然也是黑的了。

被列入的“黑名人物”，据说很少，每个名字下面注有“共”或“民”的字样，推其意，大概是“共产党”、“民主同盟”之谓。可见这份“黑名单”不但印得精致，在他们做“调检工作”的时候，也着实下了一番工夫。

可惜的是，它虽精致却不精确，据说依看见的人所知来断，被列入的大都是无党派的纯洁青年。只是他们平时也关心时事，希望和平民主。于是红帽子一顶就给硬带在他们头上了。

民主同盟原是国共两党之外的党派人士及民主人士的同盟组织，因为主张民主，也就被人加上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荣冠”。共产党是“赤”，那么，民主同盟即使不“赤”，至少也是“红”的了。于是，凡是要求民主、要求停止内战、要求改组政府的，就一律归划“左倾分子”，非“赤”即“红”，非“共产党”即“民主同盟”了。



国民党军警枪杀政治犯。

黑名单上的“共”、“民”小注，想来他们也找不出真凭实据来。只不过把不顺眼的、不跟着自己摇尾狂吠的人古脑儿写上去，再照“不顺眼”的程度分了一下。最不顺眼的当然是“共”，其次就是“民”了。它们这样做，未始不知是胡扯，然而为了表示自己“效主”有功，并非干拿津贴，于是就煞有介事似的来了一个分别。

黑名单“史”的考证，无法做到；因非“个中”人，不明“个中”事。可是记得离打国仗前还很久，就听到这个在小孩子听来十分神秘可怖的名词了。抗战前列人黑名单的是为了他们要求“抗日”，要求“救国”；抗战中列人的是为了要求“民主”、要求“坚持抗战”；胜利后列人的是为了要求“停止内战”、要求“民主”。这样看来，战前不肯抗日救国、抗战中实施一手独裁打算跟敌人妥协，胜利后要继续独裁下去打内战的，不言而喻，就是那些制名单、要一手杀尽“黑名人物”的人们了。

18年来，被压死在这只黑魔手下的青年，真是不可计数，黑名单也不知烧毁多少次又新制多少次。无数优秀青年的性命，就在这“烧毁”与“新制”之间被儿戏般地断送了。可怪的是，“黑名人物”被枪杀、被毒害、被活埋，却像死了又复活一样，永远杀不尽埋不完，一批又一批，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

黑色象征死亡，可是它也是“铁”的表象。“黑名人物”正是锤炼中的黑铁，这些铁块，将要在千锤百炼中成为坚韧的纯钢，屹立在世界上。黑名单的制造者，终归要被层垒高堆的黑名单压死。不见俄国的沙皇？又不见希特勒正在忙着印黑名单的时候，自己首先垮了下来？

《新华日报》1946年7月2日

民不畏死

黎　望

一个全世界知名的学人、诲人不倦的长者、坚贞不屈的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在李公朴先生的血迹未干、全国人民创痛犹新的时候，又被法西斯特务反动派暗杀死了。

这是中国反动派千百次罪行中，又一次最无耻、最卑劣的暴行；这是反动派千百种罪恶中又一次滔天的罪恶。这样一位千百万人民爱慕的长者，这样一位学行优异的学者，仅仅是为了执着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就不能见容于中国法西斯反动派。最后是出于这种最卑劣、最险狠的暗杀行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反动派对于和平、民主的人民怨毒之深不难想见。

由于李公朴、闻一多先生之被暗杀，已经完全暴露出法西斯特务狰狞险凶的面目，已经使全中国的人民警觉到，反动派已经不惜与全国人民为敌，要实施血腥的屠杀政策！

一切法西斯暴君的衣钵，已经反动派一手继承下来；一切专制暴君所不敢做的，中国的法西斯反动派已经完全做了。反动派已经集一切横暴、险狠、卑劣、无耻的大成。



民主斗士李公朴（1902～1946）



民主斗士闻一多（1899～1946）

反动派也许在得意的狞笑吧。可是，别忙，血泊中倒下去的是一个李公朴，是一个闻一多，然而继续起的将是千千万万的李公朴、闻一多，千千万万争取和平、民主的人民是镇压不了、也是屠杀不了的；要不，一切暴君的统治就该永不会动摇了。米兰街头墨索里尼的尸身、柏林城下的希特勒尸灰，该就是殷鉴不远的。

在反动派的眼里看来，大概以为这种血腥的恐怖政策，将会镇压住人民的要求和平、民主运动，封堵住一切人民的口吧！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切专制暴君的防堵水流的行为，最终是逃不掉灭顶的命运的。要想这样来屠杀尽一切要和平、民主的人民，更是梦想。人民的力量正如像勒纳湖里的水蛇样，是会在切夫头的颈上，重新生长起一个头来的。至于反动派这种自绝于国人的行为，正如像汉朝的郎中主父偃所说："吾日暮，故倒行逆施"而已。

反动派要想用这样的屠杀来恐吓、来镇压住人民，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如果，中国人民在这种血腥的暴行前，对于横逆的忍受到了极度的时候，中国人民将会表示自己的意志："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反动派也就会临到入墓的时候了。

在生者的创伤、死者的血痕前，虽然会使一些善良者叹息、怯懦者却步，然而更多的是使迷茫者辨清是非，犹疑者坚定脚步，而千千万万被死者的血浸渍的战士，将会跨过死者的血迹，奋然前行。

七·一六晨五时欲哭无泪中写成

《新华日报》1946年7月18日

合法的罪恶

门　纳

有史以来，中国没有一天没有法律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自戊戌政变以至于今日，虽然有了若干次的斗争，但依然还是没有一部“人民的宪法”出现。在“非人民”的法律之前，一切人民都不会有什么权利与方便，而青年学生，更是只有被窒息、奴化、诬蔑、屠杀的义务。

中山先生在广州改组国民党的时候，标明了联俄、联共、拥护农工的三大政策，认真执行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当时国民党所统治的地区之内，一切爱护苏联、爱护共产党、爱护农工，以及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言语行动，都是合法的。中山先生检讨了若干年来革命失败的教训，又接受了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所以要建立党军，因而开办黄埔，号召青年人学，培植革命的军事干部，虽然中山先生不久就与人间别离了，但是他所遗留下来的血液，还不会被他的徒子徒孙们排泄出去。中间经过五卅惨案，汹涌于全国各大都市的罢课、罢市罢工的爱国运动，只有香港和广州得到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支持，其他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阻挠、破坏、

摧残。所以当时一般的青年，都视黄埔为革命圣地。尤其是两次东征，青年们用热血头颅打陈杨刘，巩固了革命的根据地以后，风声所播，全国各地青年，涌出了奔赴黄埔的浪潮，当时的黄埔当局，对于这些青年，也可以说是“来者不拒”。以后的北伐军之所以势如破竹，也就是得力于这些青年的踊跃牺牲。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辉煌殿堂，可以说是用这些青年们的头颅来建筑成的。

可是，那时广东的国民政府，在世界以及中国的广大地区，是被认为不合法的。因为国民党执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策，世界上的帝国主义与国内的封建军阀，当然不会承认它为合法，在那时非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要想到黄埔去，也实在是困难而危险的，稍一不慎而被发觉了，就会走上被拘禁或屠杀的恶运。封建军阀当然认为他自己的这种行动是合法的，因为他自己是被帝国主义者承认为合法的政府。然而，民不畏死，青年尤不畏死，当时的青年们要从死里逃生，逃到可以求生的地方，用他们的热血头颅来求得民族与人民的生，在他们的踊跃牺牲的精神下，那些所谓合法的封建军阀们，不久之后，一齐都望风披靡。而从前所谓不合法的广东国民政府，现在也屹立于紫金山前，一变而为合法的了。

这个从不合法到合法的政府，是怎么样的一个转变过程呢？一方面，是这些不惜为国家民族而洒热血抛头颅的青年们替他打出了血路；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炮轰下关，血洗济南，他不敢反抗；散布在各地的封建军阀官僚，只要旗帜一换，就可以加官晋爵。他是跪在帝国主义胯下，伏在封建势力的怀中，才取得他的合法地位的。他所合的法完全是反人民非人民的法。因而，从前在广东时认为合法的青年们的种种言语行动，如今又转变为不合法的了。如果这些青年还

不识相，还要保存着中山先生的革命的血液，还要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的话，那就会立刻被送入枉死城。1927年的清党大屠杀，枉死城里的冤鬼立刻增加了千百万。靠青年起家的黄埔帝王，如今高坐在紫金山上的龙庭上，发出狰狞的狂笑了。

可是，算盘又还打得并不怎么如意。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的队伍，又在江西开辟了根据地。半途握手的李白阎冯之流，又随时要设法分庭抗礼，“天下”还没有完全成为“一家”，又靠什么去替他征讨挞伐呢？当然又还是要靠青年。但是，他现在的号召青年，并不像从前在广东时那样光明正大了，而是要鬼鬼祟祟地玩魔术了。

从黄埔演变而来的军事学校，四面八方去开展，用种种方法引诱大量的青年进入这座学校，灌注一些“命令重于生命”的迷魂汤之后，再替他到沙场去送死。而在一般的普通学校中，则党义、军训、纪念周，就是一些麻醉剂。周考、月考、期考、会考、文凭，就是重重枷锁。党权高于一切，盲从领袖，听到“领袖”二字就要立刻起立致敬。一个天真活泼的青年，受了这样党化的几年教育之后，就会变成死板板的没有灵魂的奴才。如果有不愿意替他做炮灰、或不愿意做奴才的青年，稍稍表现了一点自由的意志的，那就立刻被诬蔑为“共产党”。被加上这一名词的青年，他就叫你枉死。可以说，自从黄埔帝王登上了紫金山前的龙庭以后，在他所控制下的全国青年，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被窒息奴化成为奴才、便要被诬蔑屠杀而成为冤鬼，当中没有别的路，如果还有别的路的话，那就是死里逃生，被逼而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梁山上去。

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到一二九，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

大踏步向中国前进，国亡无日，全国青年奋勇起来的爱国浪潮，在这个合法政府的法律面前，是不合法的，“爱国有罪”。木棍、石块、水龙头，以及“自行失足落水”，是合法政府招待青年们的礼物。“攘外必先安内”，这些，就是他在他的魔掌所能控制的区域内的“安内”的良方，而这些良方又是他自己和他的主人以为合法的。

经过西安事变的当头一棒到芦沟桥的炮声，全国青年如疯如狂地涌上抗战前线，参加了各种抗战工作，这才大大的舒展了一口气，认为“自由”来到了。然而，昙花一现，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他不曾负担起他应该负担的团结全国青年的神圣任务，反而造成了使全国青年大分裂的局面。流弊所及，先生当特务，同学如寇仇，制造摩擦，酿成惨案，不一而足。在所谓合法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合法的。反之，那些执行严肃工作而使他们看得不顺眼的人们，都被认为不合法而送入集中营。集中营如雨后春笋地建立起来，成为大规模的陷害青年的魔窟。这就是高坐在重庆小龙庭的帝王在抗战期内对青年们所树的德政。

日寇投降后，这个合法政府已经无外可攘，就可以一心一意地来进行“安内”的工作。在抗日战场上令敌人望风披靡的英雄们，现在一变而成为枕戈待旦的勇往直前，再加上杜鲁门、赫尔利、马歇尔等的助纣为虐，内战英雄们得意忘形。然而全国青年是不甘心让这些英雄们置民族国家于死地，一齐怒吼起来了。从昆明的“一二一”惨案到重庆的“二五”、“二八”惨案，中间经过不知多少汹涌澎湃的浪潮，在所谓合法政府的心目中，这些浪潮是不合法的。从黄埔出身的关麟徵、杜聿明，在“你们有开会的自由，我就有开枪的自由”的党义下，进行了合法的、杀人不眨眼的罪行。而

在重庆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学生们的组织与行动也被当局宣布为“不合法组织……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缔。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组织，是有益治安，而应力加保护。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

让我们在这个不合法的罪名下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的宪法”出现的一天吧！

《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



蒋介石退往台湾登机时的情形

谁使中国不能安定?

中国人民的灾难实在太深重了。在国民党反动派将近20年的长期专政中，中国的混乱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前10年，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内战。结果，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在抗战的八年中，越到后来，国民党反动派越是抗战消极，反共反人民积极。日本一投降，他们就把他们在抗日战争中保存的实力大量派出，全国大打。……

长期的灾难折磨着中国的人民，但同时也教育了他们。20年来的历史事实，他们深深地懂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专政不改变，中国就永远不可能安定，中国人民就永远不可能有好日子。这个真理，不但中国的人民懂得，而且许多远隔重洋的外国人，也都逐渐清楚地了解了。现在，只有那些舐刀口上的血来养肥自己的奴才们，才还在那里厚颜无耻地讲他们那个臭不可闻的“法统”。而三国会议的决议，却不但要国民党停止内战，并且要它放弃一党专政，放弃它那个“法统”。

然而站在人民的头上、吸人民的血过活的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是轻易地就放弃他们的专政的。恰相反，他们要用

各种方法来继续维持他们的专政。内战是一种方法，制造暴行与血案也是一种方法。今天，中国还不能安定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曾经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要变不要乱"。仿佛谁要把中国变得更乱似的。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其实，"要变又要乱"的人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和它的利益的忠实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而且知道只有变方能止乱。与这相反，"要乱不要变"的人却是有的，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企图"以乱止变"，他们正在用各种可怕的乱来阻止他们的专政被改变。自然，他们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安定"就是全中国人民的祸乱，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与全中国的利益根本矛盾的。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而且，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少数人的"安定"也不过是主观幻想而已，老百姓太多了，他们杀不完，他们抓不完，他们关不完，因此他们就难于"安定"。他们最恨共产党，说什么共产党一天不消灭，他们就死不瞑目。他们大概认为是共产党破坏了他们专制独裁的"美"梦。其实，就是没有共产党，他们的梦也是不能实现的。袁世凯时代，中国没有共产党，但是袁世凯的专制宝座还是没有坐稳。满清时代，中国更没有共产党，但是满清皇帝的家天下也不能万世不变。

自然，今天中国人民有了共产党，而且是这样成熟与强大的共产党，对于反人民分子的倒行逆施，是一个重大的阻力。保卫中国人民的利益就像保护自己的眼珠子一样，这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神圣的天职。……英美盟邦记者在亲身访问了解放区之后，或者说："一切证据使我们相信：共产党的行政是中国最好的（格尔德：《关于中国的近况》）；"或者说："在各个游击区和边区里面，民主方式的政府已经实行起来（费尔特：《中国内部的危机》）。"这些神奇的创造不是由于别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无时无地不是在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奋斗。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特点，这种精神，就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曾说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与人民同甘共苦。人民没有饭吃，他们情愿自己不吃，先使人民吃；不好的地方，人民不能建设，他们替人民建设；遇有艰难危险的事情，他们能够为人民的先锋"。而对于国民党人，则蒋介石先生也不得不这样承认，即："在我个人感觉到，我们什么都不行，如果有点行，我们的国就不会如此。我们不行的地方，第一是道德不好，不足为人民的表率，所以我们的党员不但不受人民的尊敬，并且受人民的厌恶……"（以上均见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总理纪念周讲演词》）。这的确是两党的根本差别点。这也同时是两党许多争论的分歧点。一个（共产党），一切为人民；一个（国民党，主要是其统治集团），它的目的却是为了维持少数人的独裁，因此它的政策与办法，就是内战、特务、屠杀、逮捕、抓壮丁、加重赋税、滥发钞票，等等，因此，它使中国极端混乱，它使人民极端痛苦。

国民党的论客们，你们说你们是真的希望全中国的安定吗？那么你们为什么要东拉西扯，信口胡说，不敢把真正的

乱之源说出来呢？中国人民早已知道什么是拨乱反治的办法了，那就是——

停止内战！

取消特务！

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略有删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作者＝
页数＝３５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